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 对话录

目录

赵晓 VS. 林毅夫、樊纲

2004：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1

赵晓 VS. 张维迎

管制和放松管制

21

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 25

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 27

管制者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31

管制导致最坏的垄断 35

信誉依赖于稳定预期 36

竞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39

中国股市为什么骗子奇多？骗的和受骗的都得到好处 45

管制像抽鸦片，会上瘾 49

赵晓 VS. 樊纲

“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与

58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赵晓 VS. 茅于轼

产权、平等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68

赵晓 VS. 陈锡文

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82

农民问题 83

1

BCG68/01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 对话录

目录

农业问题 96

农 村 104

赵晓 VS. 迪帕克

全球经济前景与中国经济发展 116

赵晓 VS. 刘遵义、胡鞍钢、海闻等

SARS 考验中国 123

SARS 经济增长、宏观政策与公共卫生 123

SARS 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143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改革 166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改革浪潮 174

“一流大学”与大学发展目标 175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智慧 177

大学改革的理据：发展才是硬道理 177

原则、妥协与公平：大学改革的智慧 179

大学改革与学术自主 184

通例与特例：大学改革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185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 对话录

目 录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理念 188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188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193

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人的大学理念争执 195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治理 200

也谈“中国建设一流大学” 200

大学配套改革及中国大学集体崛起问题 204

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 208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改革的方向 213

大学改革：先改教授还是先改行政人员？ 213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公共理性问题 217

中国大学改革之前景 222

2004：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1

2003年岁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和国际金融报共同举办了“中国经济展望”网络论坛。龙永图、林毅夫、张维迎、易纲、樊纲、海闻、宋国青等20余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陆续在新浪网嘉宾视频访谈中心展开对话，回顾2003年的经济焦点问题，展望2004年经济和政策走势，引起网民和众多有兴趣者的密切关注。

其中，最后一场压轴戏特邀赵晓博士担任主持，林毅夫教授和樊纲教授联袂对话，讨论的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内容涉及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及面临的问题。

赵 晓 VS. 林毅夫、樊 纲

赵 晓：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最后一场，随后就将举行闭幕式。由于今天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所以我想，今天这场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介绍一下现场的嘉宾，两位都是我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

樊 纲：我是不过圣诞节的，所以平安夜不平安也与我没有关系。但是在 2003 年末了，想到这一年的经济表现不俗，我想再祝大家新的一年快乐。

林毅夫：现在确实是年末了，再过七天就是新的一年。回顾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首先是神州五号上天展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速。过去大家老在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变成了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其次，中国已换了新的一届政府，新政府对突发其来的“非典”处理得非常好。原以为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今年确实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年底的时候，跟各位网友一起探讨我们过去一年是怎么过来的，以及在来年我们如何继续取得经济更快速的增长。

2

赵 晓：谢谢两位教授，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今年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表现不俗，但是也有人马上提出来，会不会过热呢？两位教授有什么观点？

今年投资增长过快是导致中国经济局部过热原因

樊 纲：我个人比较早地谈论过中国经济过热苗头、过热趋势问题。要说现在的经济就已经全面过热了，也不见得，但是，过热的趋势还是存在的，而且这几个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趋势导致的问题也越来越暴露。

我想，今年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投资增长过快。应该说，今年的投资实际增长率是改革开放 20 几年来最高的一年，比 1992、1993 年都高，那时候，如果不扣物价指数按名义值来算是百分之五十几，扣除

了生产资料价值指数是百分之二十几，而我们现在是百分之三十几的实际增长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说年初、一季度、二季度比较高，是因为去年的GDP较低，而到了第二、第三季度，在下半年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还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长，应该说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了。

由于投资的快速增长，这几个月来的情况显示，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生产资料产品要么短缺，要么价格上涨。夏天是电力短缺，9月份以后是油品短缺，现在是煤炭短缺、煤炭、钢材、水泥、钢材、化工产品价格都上涨，特别是11月份以来的价格上涨幅度到了20%、30%，应该说，这种过热趋势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好，我个人相信中国经济8%~9%的增长速度是可持续的，这在经济学叫潜在增长率的速度。但是，如果增长趋势再高，像年初已经到了9.9%，现在有些大的金融机构测算我们中国经济的活动指数实际已经到了11%、13%，而且还在往上涨的趋势，这就有问题了。我们的希望是增长速度高一点，但是稳定的高、持续的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下子12%、13%、14%的增长，然后一下子掉到5%、6%的增长。这样大的波动，对企业的损失也比较大。

年初的时候我们谈经济过热的时候，有些企业界的朋友说我们刚过两天好日子，就说经济过热，你们让我们过几天好日子好不好？我说希望大家过好日子，但应该是什么好日子呢？不是你今年200%、300%的利润，而明年一下子掉下去，而是希望持续有好的增长，这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经济过热不过热的一个目标。

林毅夫：我基本同意樊纲的看法。也就是我们今年投资的基本的真实增长率是1990年以来最快的一年，比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大增长的那一年还快。从这么快确实有过热的趋向。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过热其实是局限在某些领域。我们知道，房地产领域增长很快，汽车领域增长很快，导致钢材、建材投资很快的增长，进而导致像电力不足等等。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国民经济的另外一部分，一直到11月份，商品零售的领域，绝大部分商品的价值还在下降。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产业在大多数的领域里，除了建材和它相关的，再加上少数食品领域之外，价格还在调整，生产力过剩的情形还没有消除。所以我们说，今年中国经济，一部分是过热，一部分却还在持续1998年以来的生产力过剩的情形。所以，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一方面确实看到经济增长比较快，但也不能太乐观。对来年，我想，我们

赵 晓 VS. 林毅夫、樊 纲

必须在今年经济增长的态势下，仔细的分析，提出一个比较好的对策。

赵 晓：谢谢两位教授，刚才两位教授都同意，中国经济尽管表现很好，但出现了过热的迹象，两位教授并指出了一些现象。请问，对于这些现象的判断在宏观政策上是什么含义？或者说在政策上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应有什么样的调整？

樊 纲：谈论政策，首先要搞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能使政策起到效果。

在这儿我想多少再讨论两句关于今年总体经济情况和结构的一些问题。消费相对来讲依然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因素，而且，由于我们失业的压力比较大，农民的收入提不高，因此，从总体来讲，消费一直比较平稳。今年需求的扩大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扩大，而且中国历次经济波动都是因为投资的波动而产生波动，但这个投资波动最终会涉及消费者消费的领域，当然会比较晚，可能要到后期，到投资热到很高的程度、增长到很高的程度，一系列的投资支出导致各行各业开始复苏起来以后，这时候消费价格就开始要上涨了。那时，消费的总量也会有所上涨。

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工资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消费实际上不可能有快的增长。但是，从宏观的角度讲，只要有一部分稳定的增长、总需求就会增长。因此，我认为，首先要采取宏观的经济政策，有的时候部门的政策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首先应该是宏观政策。比如，钢材投资过热、过猛，钢材的投资今年增长了150%，去年是百分之六十几，而钢材部门今年还专门开了一个会，说我们投资不多，因为我们投资了这么多，还有需求。这个事情说明，不能就钢材论钢材，就钢铁论钢铁，钢铁现在增长的需求是全社会增长的30%的需求。这对他来讲，肯定意味着很好的市场投资的前景。但是，如果你的投资到了30%，降下来了，你的新型投资一下子就变成了过热的投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采取一些经济政策，当然也包括金融政策。比如，过去几年我们为了弥补民间的投资不足，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民间的投资已经过高了，我们就应该把它降下来，另外还要想办法使民间投资的盘子缩小一点。这件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做，明年肯定会做，我是希望做多一点。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考虑，首先不应该是针对哪个部门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从整个货币供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使货币总量的扩张得到

抑制，然后再谈部门问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投向效率高的地区，比减少或者是淡出更重要

林毅夫：我同意樊纲的看法。我记得1993、1994年投资过快、过热，比如到首钢去买钢材的话，必须带着现金，交了现金以后排队才算数，才给你发。那时候对钢材的需求非常大，但是之后，局势变了，很多的钢材卖不出去了。这次钢材投资增长很快，目前是19000亿的钢铁生产能力，周期完了以后，可能会达到30000亿。今后如果不是持续30%的投资增长，就不能消化这么快的增长。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可能钢铁生产能力的过剩会重新出现，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投资过热背后的动机是什么。1998年以来，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还没有走出去，为什么出现这一轮的投资过热？其实，本轮投资过热和过去的投资过热有一个共性，就是基本上是以信贷的积极扩张造成的。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的货币政策目标，其中信贷增长目标是15.2%，但实际上达到了21%多，远远超过当初设定的目标。货币量增长这么快，并不是因为整个经济的需求突然增加，导致投资的增强，而是信贷的扩张导致投资的增强，这是相当大的危险。

另外，我们现在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怎么看待。我个人的看法是，也许还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原因是这轮扩张固然是投资拉动，而且很多是民间投资拉动，是民间银行的借贷，但估计银行通过信贷扩张支持投资的过速扩张是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调整。信贷的政策一定要调整，当这个调整以后，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就会下降，而且会有比较显著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年我们有可能整个的投资需求还是疲软的。在生产过剩与投资需求相对疲软的形势下，政府还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已经用了5年，一方面确有必要，另外一方面则是怎么改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力的问题。前几年我一直谈，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比较高的地方应该是在农村地区，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往这方面投向的话，效果会比较好，比减少或者是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重要。

赵 晓 VS. 林毅夫、樊 纲

赵 晓：对于林教授所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持续一段时间，樊教授怎么看？

樊 纲：关于财政政策，有几个方面永远要讨论，一个是规模、一个是结构，一个是效率。林教授讲的比较侧重消费，特别是农村的消费，这块起来的话，对经济的结构比较平稳。关键是看政府有限的财力怎么用才能使整个经济更加平衡，我刚才说，我比较倾向财政政策首先作为一个短期政策，作为宏观调节政策，基本的运作方式是相机抉择，作为经济增长的补充，作为市场力量拾遗补缺的力量。当整个投资少的时候，它多投一点，支出少的时候，它多支出一点，市场的需求比较大的时候，它就少一点。所以我希望：第一，规模要小一点，并不是完全取消，现在是投资已经太多了，不要再去搞那些大的投资项目；另外，在支出结构上有利于消费、有利于支出的要多一点。

民营经济投资如果控制不好 也会出现泡沫

赵 晓：刚才，我们在投资结构上谈到了政府方面的投资额支出的问题。前几场的嘉宾也谈到，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必须发挥民营经济或者是民间投资的重要的作用。两位以为，在中国现在经济的过热趋势中，民营经济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林毅夫：我想，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比如我们在十六大的时候就提出两个有利于，一方面要利于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5年的改革，中国改革比较成功，其实是这两块经济发挥了作用。国有经济继续改变、维持稳定，没有造成大的下滑。比较大的，不管是从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是效率来看，很大的一块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更是这样。

第二，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并不是说民营经济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完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私营经济里面，很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东南亚危机里面，韩国的问题其实和我们的民营经济的问题是相似的。有人说投资增长和国民经济过热没有关系，因为大多数是民营的投资。今年的情况，投资载体的确是民营经济，但它的潜能来源

却是国有的，而且这里面可能有相当大的软因素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一方面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更重要的，要注意贷款的增长。

樊 纲：统计局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数字，从现在的投资看，60%以上都是民营投资、而不是国营投资了。我在林教授刚才说的这一点上再往后退一步，即使民营经济是花自己的钱，像西方国家一样，一样会出泡沫，一样会出经济周期。天下的经济周期不是计划经济首创的，马克思已经分析了几百年了，经济周期都是私营经济，尤其是大家都有预期错误的时候，所谓市场的情绪，所谓人气是互相传染的。凯恩斯解释经济波动的原由，就是私人企业家的动力精神，心情好了，大家都投资，经济就高涨；心情都不好，都不去投资，经济就不好了，就会出现衰退、出现失业。所以我们要警惕经济学家中有一种说法，现在民营经济投资了，不会出问题，其实一样会出现问题。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汽车工业过热了。南方某个省，最近几个月里新提出了40几个新建汽车项目的申请，80%都是民营企业家，都不是国有企业。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做很好的市场分析，预期发生错误，都是盲目性，好的时候都好，不好的时候都不好，市场一样会出现波动。所以我提醒大家，市场经济一样会出现问题，即使是花自己的钱，如果判断错误，一窝蜂地上，也会出现泡沫。

大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形成了今后 两年的通货紧缩的压力

赵 晓：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不俗，在出现SARS的情况下，也没有拖住增长的步伐。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新一轮增长周期。如果是的话，这个经济增长周期的特征是怎么样的，会持续多长？

樊 纲：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走出了最低的低谷，2002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持续多长呢？你大概问的是高涨期持续多长。我们讨论过热不过热，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实际搞得长一点，刚才说了，如果中国的经济年增长8%、9%，增长30-40年就更好了。这其中是我们做微调的时期，不要出现大问题才去调整，这样会使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应该

说，中国经济还是有可能的，从增长潜力，从长期的增长前景看，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以前我们很多的过剩生产能力还没有消化完，现在一下子过度投资，持续的高增长，又将形成新的过剩的生产能力。中国经济如果不能很快地抑制住这个增长趋势的话，一两年后就会又陷入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不用担心，中国有点通货膨胀还是好事，现在如果有5%、6%的通货膨胀，对中国各种事情的解决都有好处，现在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投资过度，又形成大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将形成今后两年通货紧缩的压力，很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在增长比较快的两年后进入通货紧缩。中国经济防止过热真正要防的是又陷入大量生产能力过剩增长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林毅夫：中国经济有一个现象：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缩、一缩就死。中国的经济在1996、1997年以后好象是停止了，停止的原因主要在几个方面：过去一放就火，一放投资需求就会非常的旺盛，但这一次因市场过剩没有投资旺盛，这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在1997、1998年以后，利率还相当低，但我们在1998年以后，贷款的约束加强，导致银行出现信贷收缩等等。再加上前一段过度的投资扩张，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就导致了大家看到的通货紧缩的情形。

目前这一轮投资过热，其实并不是来自我们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这种投资快速扩张和经济的过热，很明显的是来自于贷款的急剧增加，这点从2002年就开始看得出来。贷款为什么急剧增加，一方面是我们投资的利率还低，另一方面，跟银行急于把存款贷出去有关。我们加入WTO之后，银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改变它的公司治理，改善资本金，我们把银行上市作为一个很好的改善手段。但是，要上市的话，就必须满足上市的要求，必须把银行的呆、坏账的比例，从2002年年底的23%降低到15%的水平。这有两种办法，一是把现在贷出去的钱改善质量，这个比较难。比较容易的是分股制，即贷更多的钱出去。贷更多的钱出去，在项目没有完成之前，在钱没有收回之前，至少看不出是坏账。

我觉得这两年的经济增长过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这个有关，一方面企业家贷款是积极的，同时银行也积极地把钱贷出去。我觉得这有点像过去所讲的，一放就活。投资增加以后，经济过快，就容易出现瓶颈，比如钢材、电力，前两年还是过剩的，投资增长以后，当

然会导致钢材、电力价格的上升。在投资上出现瓶颈，就会导致一快就乱的情形。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把这种趋势遏制在苗头上……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苗头了，已经是开始出现了……不解决的话，由于我们其他领域的生产过剩还存在，再加上这一轮的生产过剩，很可能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说，当前我们一方面看到经济增长这么快，国有企业的利润提高了，原来亏损的企业变成了盈利的企业，快速增长是好的，但我们也必须在快速的增长中看出它的因由。宏观政策和学术界、决策界对这个问题要有很清醒的头脑，很快把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就中国经济来讲，因为我们消费每年是7%左右的增长，基本上不会有很大问题，投资增长维持在10%也不难，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维持在8%左右应该不是难事。我们希望在比较长的时间里，维持在8、9%之间，又不会有局部的、快速的过热，这是最好的。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的判断，不会有大规模的过热，因此也就不会出现我们担心的紧缩。

赵晓：请两位教授总结一下，在防止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在哪些方面更加注意呢？

政府政策要在银行贷款上 给予一些指导和软约束

樊纲：首先是政府政策。刚才已经谈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尤其是林教授谈到银行贷款的问题。至于说政府在有些国有部门的一些行政干预，在目前也是起作用的，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还占主导的部门，政府的适当干预作用更加明显。

刚才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这一轮的投资增长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地方政府的城市化项目导致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柱。这是不能否认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否认基础设施建设不好，政府的基础投资不对，这应该辩证地看。中国公共物品短缺，基础设施不足，这是我们增长的一个大的机遇。但是从这一轮的增长情况来看，又有点一窝蜂的性质。大家都搞城市化，都要建大城市，沿海地区人口密集程度高，建一些大城市，一些偏远的地区也要搞城市，而且这些项目一上来都

赵 晓 VS. 林毅夫、樊 纲

是没有实效的项目，装饰性的，都是涂脂抹粉性质的一些东西，这也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也有一些贷款的问题，政府毕竟还有很多干涉的权力，使银行的贷款向它倾斜，这种贷款更具有软约束的性质，这也是值得重视的，在地方政府的假设的角度要加以约束。

民营经济领域，严格来说，你不应该管，国有企业还要管，但民营经济不应该管。民营企业，一个是政府的政策会波及它，另外一方面，政府传出的信号民营企业也会有所警觉。中国的企业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西方国家的企业都是经历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波动过来的，到了今天，中国的企业也开始经历这方面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讲，学者和政府的一个职能就是做一些经济分析，使大家能更多地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

林毅夫：如果单就过热来讲，中国有一句话，不是扬长避短就是釜底抽薪。从釜底抽薪来讲，我们知道，相当大的经济过热和银行的贷款有关系，所以很重要的是在银行的监管和治理方面下工夫。我们不能为了上市，就把呆、坏账的比例下降，作为银行所有贷款政策的考虑。我们当然希望，如果银行在贷款上面能够比较谨慎，这样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二，扬长避短，要在贷款上给予一些指导。当然我们不应该用管企业的政策。但不管是在经济过热还是过冷的时候，企业对一些要求还是必须遵守的。这两方面都做的话，我们目前的投资过热的情形就会有所缓解，将来经济发展的质量会提高，民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更审慎一点，银行在做贷款的时候，也会更审慎一些。

赵 晓：银行在对待具体的贷款方面，好像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他认为对房地产的贷款，其实是他收益比较好的一块，可是我们打压的恰是这一块，总量政策变成了产业政策，这种打压真的有道理吗？

林毅夫：我们看国外，房地产也曾是最好的贷款。但是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价格下跌通常会下跌得非常快。日本为什么从1991年以后出现泡沫经济破灭，出现通货紧缩，到现在都走不出去，有人说这是银行的问题，其实银行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以前的房地产贷款，现在大部分是呆坏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光从现在来看。房地产在上涨时，贷款会很好，可是将来房地产价格下跌的话，可能银行的贷款会变成不良贷款。

樊纲：房地产有多少会变成不良贷款，会变成呆坏账，这还是有争议的。至少和房地产有关的是两种贷款，一种是到消费者手中的按揭贷款，一种是银行给房地产商的贷款。首先，到消费者手中的按揭贷款还是比较好还，给房地产商的贷款却是容易出问题的。有些房地产商拿着银行的贷款去圈地，又不做项目，所以容易出现坏账。所以，银行在这方面要考虑，即使是同样给房地产的贷款，也要考虑哪个更稳妥一点，哪个更容易出现坏账，哪个更理性，这更符合我们的经济规律。

林毅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年的政策只是重申过去的严格的政策必须执行，所谓过去的政策现在必须真正落实，也就关系到前年和去年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扩张是没有把原来的政策真正执行，因此，房地产并不是重新出台了一个政策。

赵晓：是不是房地产重新出台一个好的政策，情况就会好一些呢？

林毅夫：是这样的。

完全避免泡沫风险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使它缩小

赵晓：回到经济的本质，泡沫风险是不是可以真正有效地避免？为什么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东南亚危机各国，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没有能够完全有效地避免泡沫危险？在中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避免房地产等带来的泡沫危险。政府重申以前政策这种方式是不是真的有效？

林毅夫：泡沫在快速增长的国家都不可避免。泡沫产生的原因，是在快速增长的时候，总需求迅速扩张，供给弹性越小的产品泡沫增长越快。所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房地产和股票的上涨特别厉害，而且比其他的投资手段，比如把钱放在银行里，或者是直接投资价格上涨更快、利润更高的话，会引诱更多的人去投机，这样价格上涨得会更厉害，从而背离经济基本面形成的真实价格，形成泡沫。

我同意在任何的增长过程中，泡沫都不可避免的看法。但有些国家泡沫破灭了以后，没有导致金融危机、银行危机，有些国家泡沫扩

赵 晓 VS. 林毅夫、樊 纲

破灭了以后却导致了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现在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当然不可避免地有人在银行、房地产、股票投机，但我们要避免这种投机变成危机。

樊 纲：你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能不能避免泡沫，一个是银行的产业政策有没有作用？我想接着林教授说的谈谈泡沫的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完全防止泡沫，但是人类已经做到能够使泡沫的程度减小，不出现大泡沫或者大波动。我们先不说东方，先把亚洲的事情放在一边，应该说西方经济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后，到现在，基本上泡沫还是不断，波动不断，但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最近的一次泡沫是 IT 泡沫，崩盘了，但如果 IT 泡沫没有美国联储，早早的开始微调、升息的话，泡沫不知道要大到什么程度。因此说，能不能完全避免泡沫，可能避免不了，但可以使它缩小。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使它缩小，不能说我们做不到防止泡沫，就不讨论防止泡沫、让它涨吧。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让它缩小的问题。

谈到亚洲的国家，日本、东南亚、韩国的泡沫问题，有一个背景，就是亚洲战后几年没有出现过大的危机，不像欧洲，欧洲 18、19 世纪，是几十年来一次，大家对经济危机的意识已经比较强了，到后来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波动了，如此导致了日本人有一种自大的心理，觉得我们就是不一样，历史经验、经济规律和我们都没有关系，因此，泡沫会大一点。

中国现在能不能防止特别大的泡沫呢，我说还是有一些好的条件。一个是宏观经济学发展了，一个日本泡沫的破裂为中国人提供了现实的好的教训。我记得 1995 年墨西哥出现危机的时候，大家觉得和自己无关，那是遥远的墨西哥的事。后来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发现，原来这就是阁下的事情，我们自己也会发生。

应该说，现在业界的意识还是比较强，中央银行在那时候出台这么一个政策，也反应我们这个社会中防范风险的意识加强了。政策出台以后，业界这么讨论，那么讨论，也反应这种意识加强了。

说到产业政策有没有用，我个人赞成以宏观政策为主，少搞产业政策。但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到这个过渡时期，恐怕针对某些产业的特殊政策还是有它的作用，不能过早的一概否定。我们过渡到长远的，政府不管的、国家也不管的阶段，那是长远的事情。现在我们的政府还是要做一些事情，政府即使做了一些坏事也是做好事的成本。这个问题恐怕要现实、客观地考虑。

金融行业上管制还是需要的， 这是中国过去所欠缺的

林毅夫：我想说，确实不应该由政府决定哪个项目搞不搞，哪个行业搞不搞。但是，在某些行业尤其是在金融行业上，管制还是需要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大家也知道，华尔街也是全世界监管最严的地方。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地方、政府的监管机构在不断的监管。同样是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香港就没有变成金融危机，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就变成了很大的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最后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最大的区别是香港在房地产贷款的政策上有很的多的管制，比如银行里有多少钱可以贷给房地产发展商，有多少钱可以作为业主的抵押贷款，业主在抵押贷款中，可以借多少钱，自己借的比重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比较需要，即使是有宏观政策来调整，但是针对每一个行业的特性，有针对性地提出对这个行业的管理政策，还是有必要的。在将来的政策下，哪些企业要做房地产发展商，哪个消费者要贷款，可以自己决定，但并不是政府完全放开不管。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市场经济。

樊纲：从银行角度讲，如果是一个银行，一定有这个商业银行的一定的产业政策，它要分析这个产业现在的风险大小，它要每天不断地给下面的信贷员下指示，这是银行的商业行为。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在一块儿是一个大的国有商业银行。所以，国家从政府的角度，出台一定的政策也是有道理的。

林教授刚才讲得更进一步，实际上是银行监管部门要通过一定的规则来防范和监管这个行业，监管这个特殊行业有关的特殊风险。这是中国过去所欠缺的，应该逐步完善起来。

明年的投资增长如果在 15% 左右， GDP 肯定会有 8% 左右的增长

赵 晓：给定我们目前的制度条件，这一轮的增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换句话说，我们的泡沫风险，估计会在什么时候形成和爆发？

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是明年会有比较好的增长。今年 30.5% 的真实投资增长，这是史无前例的，是无法继续下去的。而且还是集中在几个少数的领域里，更容易出问题。你今年 30% 的增长，造成明年的增长是 40、50%，那我们的需求没有那么快的增加。刚才我分析过，15% 的增长比较合适。

赵 晓：如果从 30% 急剧地下降到 15% 的增长，会不会有下滑太快的风险？

林毅夫：如果消费维持 7%、8% 的增长，投资维持 15% 的增长，明年的 GDP 肯定会在 8% 左右的增长。你想，如果它是 15% 的增长，占 40% 的 GDP，对 GDP 的贡献是 6%，如果 15% 的增长，对 GDP 的贡献是 3% 左右。维持 15% 的增长，明年还是有把握的。从 30% 降到 15%，我们的经济应该不会马上萧条。

赵 晓：看来增长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果真如此，我们经济发展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樊 纲：短期看泡沫增长是问题。我赞成 8%—9% 都是可以持续的。我们第一季度是 9.9%，没有非典，第二季度上升到 10%、11% 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你想会有多高？我的意见是如果这样下去，明年很可能通货紧缩就来了，而且是急剧的。所以我认为，维持在 8%、9% 的水平最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就更理想了。所以对短期的经济波动来讲，这是一个问题。

赵 晓：换句话说，短期是要让过热的经济稳定下来。

樊 纲：是，平稳地增长一段时间。

赵 晓：除了这个问题，林老师认为，我们经济增长中重要的问题还有哪些？

林毅夫：是长远的结构性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比如大家都在谈论的金融体系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三农”问题、地区差异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一方面我也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对解决这些问题，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乐观。我说过中国可维持 30 年的高速增长，过去我们已经持续了 20 年，还可以再持续 10 年。

樊 纲：我插一句话，有的报纸说我说过中国经济还可以维持 40 年的高速增长。其实我说中国经济可以维持 40 年的增长，是把过去的 20 年加上将来的 20 年。从理论上讲，至少还有 20 年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成的

赵 晓：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提到了很多问题。两位认为，这样一个文件阐述的未来变革的制度创新内容，是否足够保证实现未来 30—40 年的增长？

林毅夫：成功不断出现，问题的焦点也会随之不断出现，所以政策和制度的创新是长期的。我们说最早的英国的市场经济也是在不断扩充、完善它的体系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它把改革的思路做了一个调整：过去比较强调速度、现在强调速度和质量要协调，要协调平衡地发展；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弱势群体，包括农村、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要照顾，包括法制要完善等等。这是个很好的文件，这个文件对我们未来 5—10 年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不能说到底为止，我们的改革就完善了。我觉得这些文件提到的这些如果全部都落实，我们还会有 10 个、20 个新的问题出现，从社会的进步来讲，只有不断的出现问题，社会才会进步。

樊 纲：你的假定是十六届三中全会能够管全部的市场经济的实现的

话，但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一定会有更新的问题要解决。现在我们文件的起草，很多的时候甚至还看不到5年以后经济中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比如这次对产权保护、产权改革提到了很高的角度，基本上解决了过去20年提到的很多问题，但是，其他一些方面比如法制改革、政府的改革等等很多问题还没有涉及，很多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还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所以我把它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乍可悲观一点。罗马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成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人的认识也要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问题的出现，不断的加深认识。

中国的崛起要克服的困难 比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要难得多

赵 晓：现在我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的讨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讨论，那就是外部环境。我们前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假定外部环境是和平的认识下展开的。但是，如果外部环境出现紧张怎么办？其实我们看到2003年已经出现了一些紧张的局势，台湾局势也出现了一点的紧张。我想请问，未来国际局势的紧张会不会对我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6

林毅夫：我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从外部局势来讲，可能会有不利的地方，也会有有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最近，不少人在讨论，21世纪和20世纪之交，跟20世纪和19世纪之交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就是20世纪和19世纪之交是美国的崛起，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是中国的崛起。这是相似的。

但是，中国的崛起要克服的困难比作为世界强国美国要难得多。

比如，当美国崛起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收入是英国的75%，而中国经济的相对状况却比当时的美国差得多。第二，从总量上看，美国要崛起的时候，GDP其实已经超过了英国，所以在18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一个霸权国家。1853年，美国的舰队就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国，绝对没有扩张的愿望，只是发展自己而已。第三，当时英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强国，所以这种替换对英国自身的冲击不会太大。而且，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传统一样，所以英国人不会把美国的崛起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但是，从中国来看，我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人均收入比美国低得多，只

有美国的 1/8，而且现在美国惟一超强。另外，中国的文化、制度和美国不一样。所以，中国要是崛起的话，对美国的心理的不平衡是最大的。所以，中国怎么处理好对美关系，是我们将来要处理的一个最大的课题。从内部完成改革，从外部要争取处理好对美关系，这是我们真正要致力的地方。

但是，也有有利的地方。19、20 世纪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产品贸易，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自己生产，一国的贸易增加了，其他国家的产品生产就减少了。而现在中国的外贸增加，从美国看来，我们是超出很多了，但是从其他的国家来看，我们同样是创造了其他国家超出的机会。所以跟美国来比，我们是损害了一些他的利益，但是同样我们可以争得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帮助，来支持中国的崛起。所以，对中国来说，21 世纪的崛起，很重要的是怎么处理和美国的关系，让美国人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他也可以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对美国的整体来讲，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要谨记，我们只是增量的强国，比如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可以维持 8%—10% 之间，而我们的存量是一个大国，按排名是世界第六，但是我们人均量比较低，如果要真正的现代化，必须是人均量达到现代化。所以我们不能有太高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认为我们已经崛起了，这是不能的。我们要摆一个比较低的姿态，才有办法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第二，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多争取人家对中国的理解，争取让他们多了解中国快速的崛起是中国的人的机会，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的机会。这里面，WTO 的框架，我们的贸易自由化，我们的经济制度改革，中国的透明化，都有利于让大家增强对我们的了解，这是更重要的。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中性的发展 中国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典型问题

樊纲：2003 年中国在国际上是多事之秋，这些事今后还会不断出现。一些外部压力，特别是人民币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这次对人民币反应最强烈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日本反应强烈还有点道理，美元在贬值，我们跟着美元走，人民币相对于日元贬值了，他要求人民币升值还有点道理。但我们跟美元，我们没变，他却叫得很凶，要求我们升值，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是美元出了问题，是因为他的双逆差出了问题。

赵 晓 VS. 林毅夫、樊 纲

而因为他是基准货币，是世界货币，因此他出了问题要贬值，反应出的问题却是要人民币升值。这种情况和日本一模一样，日本当年也不是日本出问题，是美国出了问题。第一次石油危机，日元升值了一次。第二次也是双逆差，美元要贬值，但是因为他是国际货币，所以他逼着日元升值。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中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典型问题，而崛起的问题往往通过强国已有的自身的问题反映出来，要求你来做这些事情。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的事情切实是反映了今后会不断的有事情。你中国在增长，有人说中国是一头大象，我们说中国是一头小的大象，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会对周边地区有一些压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要认识到自己还比较弱，美元还是一个基准货币。现在我们的情况和当年日元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国际货币，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当你改变不了美元是世界基准货币的事实的情况下，你要做一些调整。第二，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态，不需要情绪化。天下的道理从来如此。天下有几个道理？第一，从来都是弱肉强食，你不要指望着人家慈悲你。第二，你要想发展，你要想强大，就要在缝隙中面对已有的经济大国的打压，而且要有各种思想准备，贸易摩擦、经济摩擦等等，这些是经济中的正常的情况，就像我们出门就要挤车，想买东西便宜点人家却不卖给你一样，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第三，正是因为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准备，要想到明年哪个国家要对我们的行业、对我们的产品实行打压。我们要琢磨好这个事情，要提前做好准备。你要想到这个事情，不能当成一种惊讶。

赵 晓：转眼就是2004年，请两位用一分钟时间对2004年作一个展望。

樊 纲：这个展望取决于一些条件，如果明年及时采取一些宏观调整政策，相信明年经济能够稳定在8%—9%的经济增长状态下，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物价大概会到5%以上，仍然在可控范围之内，利率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关于贷款的问题会有一些调整，包括货币政策会有一些调整。总体上，希望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年，希望增长速度不要再高了。

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经济的增长速度在8%或者高一点，是完全可能的。物价，我个人的看法，总体水平会超过零增长。但应该讲，

从结构上还有一些不平衡，有不少领域的物价还会下降，但是有几个领域物价的增长比较快，导致总体的物价水平上涨。我倒是希望明年，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颁布后的关键一年，把制度性的建设逐项落实，包括法制建设、国有企业的改革、城乡差距的改善、农村问题的落实等等。希望政府进一步取得发展实绩。

对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成立十周年说几句话

赵 晓：我们知道，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十周年，在它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里，请两位说几句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1992年12月第一次筹备会议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当中，我作为参与者，对社会和这么多朋友对我们中心研究的参与和支持，非常地感动。我们当初提出的目标，是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做点贡献，希望对中国的政策的科研以及经济学政策的研究做点贡献。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在北大领导的支持下，在全体落实和同学的努力下，有许多方面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想，有许多方面基本实现了我们的当时的预想，当然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我首先是感谢过去10年中国提供这样的舞台，让我们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有做出贡献的机会。我们希望在未来10年、20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够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学、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做点贡献。

樊 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在确实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一个中心，不仅仅是北大的一个中心，而且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一个中心，在10年当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不仅是我们中国内部，我想，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研究机构中最有名的也应该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了。这里聚集了一批确实非常有造诣的经济学家，我想，也为民办的、非政府、非官方的研究机构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都是搞经济研究的，也在进行各方面的尝试，像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中国经济改革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国的研究体制也在不断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体制也要不断的发展，在这方面北大经济中心也是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性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下一阶段的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研究体制的进一步改

赵 晓 VS. 林毅夫、樊 纲

革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我在此表示祝贺。我个人也是中心的一员，对中心的发展也感到非常的自豪。谢谢！

赵 晓：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管制和放松管制

政府与企业 有什么不同

赵 晓：政府作为一种组织，与一般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组织有什么不同？

张维迎：政府是具有暴力权力的垄断组织，它可以强制性征税，其他组织谁也没有这个权力。

你到饭馆吃饭，有菜谱，但是没有价格。你问菜价多少，老板说，吃完再说，那你准会跑了，选择另一家饭馆吃饭。谁能够将价格写清楚，谁的服务好，你就吃谁的。

但政府不是这样，它是惟一的一家饭馆，你饿了必须去吃饭，就算它价格不合理，服务质量差，你也得吃，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政府与一般社会组织非常不同的一点。

当我们研究企业的激励机制——譬如说，老板应该如何给工人设计激励合同，股东怎样给经理设计报酬制度时，一定要考虑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如果股东设计的激励机制不能保证经理得到的大于经理可以在市场上得到的保留效用，经理就不跟股东玩了。

但是，对于具有垄断力量的政府，在为代理人设计激励机制时，参与约束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你不跟政府玩跟谁玩？你一定得跟政府



赵 晓 VS. 张维迎

玩，因为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样，政府在设计这个机制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任意的权力。

市场中企业给员工如果施加的规则太多，不合理，员工就跑了；但是，一个政府给他的国民施加的规则太多，不合理，他的国民通常没有办法逃跑。

正是因为政府的垄断性，好多政策就可能变得非常的模糊。实际上，政策越模糊，权力就越大。政府官员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时故意将政策制定得含糊不清，因为政策越模糊，官员的权力越大，越可以胡作非为。

另外，与企业相比，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并且更难以测度。任何一个组织、个人，你要对他进行有效的监督，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目标必须比较单一，容易度量。

市场为什么能够监督企业？因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赢利。市场上的生存竞争就建立在你能不能赢利的竞争基础上。如果你这个企业干得不好，就会被市场淘汰。

但作为政府，它的目标函数是非常多元化的。当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时候，你很难去监督它。好比说，企业老总没赚钱，我们就说他无能；但你不能说政府没赚钱就是无能，因为它还有好多其他的工作要做。你说我生产没搞好，但我计划生育、环境卫生抓得还不错呢！你是该罚我呢还是该奖我？所以，目标多元、任意活动空间大、难于监督，也是政府与众不同的地方。

政府管制的一般成因

赵 晓：什么是管制？政府管制与政府干预有什么区别？

张维迎：管制是西方的一个概念，英文是“regulation”，也就是使你按照某种规则行事。比如，一个企业的定价高于正常的边际成本，可能对社会造成效率损害，于是通过价格管制使得企业行为接近理想性竞争所能达到的行为，避免社会福利损失。通常，西方的管制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市场竞争的框架。也就是说，它制定一种规则，你只能在这种规则下运转。

相比之下，政府干预走得更远，它是让政府行政部门而不是让你自己去决策的一种博弈规则。另外，政府之所以直接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往往为的是达到政府想要达到的非经济目标。这个目的可能与

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

赵 晓：经典管制理论所分析的管制成因有哪些？

张维迎：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奉行的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原则，人们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完善地引导着经济运行，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优。

后来，政府也好，消费者也好，经济学家也好，认识到市场本身可能存在着不完善，这个不完善使得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生产者可能损害消费者，或者对社会中交易的第三方造成损害。

一类情况是信息不对称。比如说卖者坑蒙拐骗，买者不知底细。这在药品市场最典型，所以美国成立了专门针对食品和药品市场进行管制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另一类情况是外部性。企业得到了全部的好处但有一部分成本它没有承担，像企业排放污染就是这样，政府为此制定各类标准来限制企业排污。

再就是企业的市场运作，可能会采取一些反竞争的行为。比如说，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搞“卡特尔”定价，或者垄断企业制定垄断价格剥削消费者。

从根本上讲，西方的管制是对他们所认为的正常的市场运转出了问题后的一种纠正，西方人心中的基本理念仍然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怎么使市场更加有效地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出现。只有在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时，才需要有政府管制。

赵 晓：管制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是不是？

张维迎：我们不能否认管制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但要进一步问，你管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你的管制建立在什么样的管制动机基础上？另外，你的管制究竟能不能达到效果？

我们讲市场可能会不完善，交易当事人可能会对第三者造成损害，而他本人不顾及这种损害，这只是指出了市场本身有不完备的地方。

赵 晓 VS. 张维迎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地推断管制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过去简单地推论，只要市场有毛病，政府就应该管制。但国外几十年管制的经验、大量的案例已经证明，管制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我们必须清楚，并不存在一个最优（first-best）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次优（second best）。

赵 晓：也就是说，市场固然会因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等出现一些问题，但如果管制造成的问题更大，还不如随它自己去。

张维迎：我想这是二三十年来经济学家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不能看到市场有毛病，就简单地认为政府应该去管制。

管制在中国的特殊成因

赵 晓：显然，西方社会管制的形成就像凯恩斯主义之实施，都是针对“市场失败”。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否符合经典管制理论的分析？

张维迎：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中国管制的成因与经典管制理论的分析相去甚远，很难在教科书中找到现成的解释。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为了消灭市场。

这里要讲得稍为远一点。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过程，我们一开始就全盘否定了市场。我们之所以否定市场，不是因为市场中谁对谁形成了损害，我们的目的是“赶超”，希望比其他的国家发展得更快。

我们不相信市场能做到这一点，不相信市场中的企业家能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惧，我们当时认定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代企业家精神。

所以说，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在以后长期的计划体制运行当中，不是“竞争”而是“垄断”成了非常褒义的词，列宁讲苏维埃要搞“国家托拉斯”就是这样。

在我们消灭了市场，消灭了所有的企业，消灭了企业家精神之后，政府集所有功能于一身。在转轨时期，这些功能之间的冲突就最

露出来了，政府借助于行政垄断权来保护它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管制。

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

赵 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管制不是因为“市场失败”，而是源自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

张维迎：好比你是一个运动员，平时锻炼身体的时候，你会想如何才能让身体更好。但如果你的目的是去赛跑，要比别人跑得快，那你可能会想，我最好吃些药，注射一些激素、兴奋剂，我就可以比别人跑得快了。无奈，激素吃了后有依赖作用，以后激素老得吃，缺少一点身体马上就支撑不住。

这也就是说，为了短期利益目标，我们形成了整个经济运转机制的常态，国有企业已经离不开给它输送激素的管制了。

不过，大量的管制在中国出现，更主要的根源还在于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

在西方，企业赚不赚钱是企业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政府要管制的是企业损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在我国家，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当国有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不能坐视不管。

一个西方企业无论什么原因亏损，它都没有能力来形成一个价格联盟，因为那样做是不合法的。即使违法地做，由于“囚徒困境”的原因，也很难达成价格联盟的协议，达成了协议也很难被执行。那么，最后竞争的结果一定会淘汰那些落后的、成本高的企业，形成一个均衡的企业数量。

但是，在中国，如果政府本身是企业的所有者，承担着亏损的责任，它自然不希望亏损。为此，它可以利用政府社会管理者的职能，利用其特有的垄断权力，来保护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利益。

所以，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就可能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我想这是我们目前各种各样的管制不断出现的深刻原因。

可以讲，我们的管制其实是垄断政策，是一种反竞争的政策，而不是为了让竞争更好地发挥作用。当然，西方的管制在后来的发展中

赵 晓 VS. 张维迎

也产生了一种反竞争的、消灭竞争的趋势，但这里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演变的过程。

赵 晓：前一段时间彩电行业发生亏损，政府有关部门把板子打在“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上，为此出台新的价格管制，规定以后谁降价，要先报告并讲明理由。

张维迎：在你说的这个例子中，就反映出国家身兼政府行政管理者与企业所有者双重身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的管制好多都是这样形成的。

赵 晓：我们的政府其实有三重角色，一是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二是作为市场管理者的角色，三是作为企业所有者或者说是生产者的角色。这三重角色之间想不冲突也难。

张维迎：我想你这个总结很好。政府的三重角色，第一就是一般的行政系统，第二它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的管制者，同时它又是一个所有者。这三重身份结合在一起以后，权力使用的自由度就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它很难承担好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

26

管制造成大量成本

赵 晓：管制都有哪些成本？

张维迎：管制本身需要大量成本。管制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管制规则以及实施管制，无不需成本。

除了这些大家都能看到的摆在桌面上的成本，管制还有其他许多成本。首先，它会带来收入的再分配。有许多权力，像创业的权力，本来是普通老百姓的，但在以审批制的形式交给管制者以后，它会带来收入转移。

好比说，我原本可以自由地办这个企业，只要注册就行了；但现在必须先得到批准。我办这个企业一年可以赚 100 万元，得到你批准还是赚 100 万元。但是，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所以我还得额外“投资”50 万元。这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会带来效率损失。如果创业的权力是我的，我 100%

的时间都花在怎样做好这个企业上；但现在权力到你手里了，我必须贿赂你，我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这里面的交易成本太高了。如果我可以直接用钱买你这个权力，还算是好的，但贿赂你，你还怕人家抓住，所以我还得做好多名堂来掩盖贿赂行为。

好比说，我是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但我用汽车零部件怎么贿赂你啊？给现金你又害怕，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办个桑拿浴吧。然后经常请你去洗桑拿，像这样创造出各种各样变相的贿赂手段，成本进一步增大了，我用在事业上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们可以将政府管制后造成的这些成本分为两类——一类叫“固定成本”，是一次性的费用。另外一类，是管制者每年都要“年检”，因此是每年都得交的成本，类似于可变成本。这两部分成本一部分表现为资源、现金的方式，另一部分是时间的形式。两部分的损失都很大，其中时间的损失可能更大。

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

张维迎：管制会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包括事前的防范成本，事中的监督、制约成本和事后的处理成本。

为了防范管制中的腐败，政府事先一般都会制定若干规章制度。好比说审批，不能在一家转，而要经过几道关口，涉及更多部门，免得权力集中，有人容易滥用这个权力。据说，深圳海关的工作人员上哪一个岗要抓阄决定。因为固定上一个岗，你可能事先跟不法分子约好，搞走私，另外还规定上岗以后不能打电话等等。

第二是事中的监督成本，如查账啊什么的。第三是事后的处理成本。发现了腐败嫌疑分子，政府要去弄清来龙去脉，搞清楚贪污多少，受贿多少，挪用多少。

这些成本落在两部分人身上。一部分是“消费”管制规则的人，另一部分是社会公众。无论哪一部分，都是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

张维迎：另外，管制导致信誉机制丧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信誉问题），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如果有信誉，本来我们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管制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

赵 晓 VS. 张维迎

同，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的诉讼成本、交易成本一下子增加不少。

宝洁公司谈到，在其他国家做生意，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开拓市场；但在中国，他们不得不成立一个非常庞大的“打假队”，由一名副总亲自主管，专门用于对付假冒伪劣。

由此导致国家声誉受损的成本也不可忽视。类似宝洁公司的情况，假如国外公司知道了，本来准备到中国来投资的，现在可能不投了。

管制还使得国家税收流失。其中有一部分税收被作为“租金”转移了，甚至更多地是永远消失了。

值得警戒的是，管制太多并消灭了信誉机制后，往往要靠不断地强化管制来维持经济运行，因此管制成本有可能呈现几何级数式地扩大。从长远来看，这势必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现实中管制成本究竟多高？有一个事例可见一斑。北京市科委确定了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北京的投资环境，课题经费 80 万块钱。研究部主任把这件事交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注册完公司你们就知道北京的投资环境如何了。然后这两个人就去注册公司，结果忙了半年下来，报告主任说 80 万元已经花完了，公司还没注册下来。由此可见创业的成本有多高。我还听香港投资家讲，他们来内地如果投资 500 万元，大概要准备 200—300 万元打通关系，真正用于投资企业的钱就少多了。

管制越多 腐败越多

赵 晓：管制与腐败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

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身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这对贿赂者和管制者来讲是个帕累托改

进。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 1000 万，我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 2000 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 2000 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 1000 万。

权钱交易对贿赂者和被贿赂者来讲是帕累托改进，但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 3000 万、4000 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净损失。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

第一，权力具有互补性（Complementary），也就是说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另外一种权力的使用价值。比如你只有批准左鞋的权力，也许没人贿赂你，因为只生产左鞋没有什么用。但如果你既有批准生产左鞋的权力，又有批准生产右鞋的权力，那你受贿的几率就大多了，因为从你这里拿到的权力更值钱了，这就是权力之间的互补性、交叉性。左鞋右鞋，胶卷相机，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第二，权力越大，监督的成本就越大，对权力的监督就越难，管制者腐败的积极性就越高。好比说管制者只有审批土地的权力，那么大家都盯着土地的审批。但如果管制者同时又有审批出租车的权力，还有合资项目的权力，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就眼花缭乱了，人们很难弄清楚管制者这么多权力使用得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

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

赵 晓：管制还有哪些弊病？

张维迎：管制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病，就是它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越管制，管制就越多，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为什么越管制，管制就越多？一个原因是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它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

赵 晓 VS. 张维迎

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地不完善，管制是多么地好、多么地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

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是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好。

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的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如果说地方政府保护的真是地方利益，那么地方老百姓愿意将棉花、粮食卖给别的地方时，它为什么不让？武汉市人买桑塔纳车要多付几万元，据说是保护地方利益。其实是保护了地方一部分生产者的利益，并以损害了地方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capture theory）”，证明好多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仅这一条就使得管制完全变了味。

管制失败的原因

赵 晓：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为什么？

张维迎：这是因为，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求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

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的原因，还在于认识到管制的失效性。我们原来假定：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大公无私的，仁慈的（benevolent）；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omniscience），拥有完全信息，譬如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知道企业的生产成本，知道需求弹性，知道最优的价格订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pre-commitment），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

不过，经济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这几个条件根本不存在。

管制者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张维迎：首先，政府的任何一项管制政策，都要通过具体的政府官员来实施，但是现实中的管制者并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有自己的效用。

政府官员既不比普通人更坏，也不比普通人更好。也许政府官员的平均素质比普通人还要高一些，至少文化水平可能高一些，但在“理性人”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所谓“仁慈的政府”是没有根据的。

管制以后自然会有一个政府官员责任增加的问题，但情况与市场上企业家责任的增加不一样。市场上当企业家的责任增加，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最优的成本—收益平衡，而这个平衡恰恰可能也符合企业的最优经济效益。

但官员在增加了大量的责任之后，一般不会相应地增加收益。这样就会形成官员成本—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官员就有可能作出许多非常没有效率的决策。除非我们能够设计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员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能满足社会的利益（incentive compatible），否则管制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但是，我们很难设定一个标准，让官员追求社会的福利化。

这里面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与前边谈到的政府特性有关系，也就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是非常多元化的，要想给管制者提供一个合适的激励机制是很难的。

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考核管制者。如果我是股东，我可以对经理定一个指标；但我们没有办法给政府规定这样的指标。好比我们对政府做一规定，你经济增长一定要达到8%，而政府造假，你凭什么来证实？

前几年有人推测，我们的能源消耗增长不多，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高，一定有假。但是别人可以解释，这些年搞了多少多少节能工程，上了多少多少高新技术，消耗能源相对减少是正常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

有人说他身高一米八，你不信可以用尺子量；但要是政府说中国13亿人口平均身高达到了一米八，你用尺子量一遍试试看？

更何况，管制者有可能套利（arbitrage）。什么叫“套利”？就是管制者为了某一方面的任务，可以把其他方面的资源都挪用过来。

赵 晓 VS. 张维迎

Milgrom 和 Holmstrom 分析过，当存在着许多工作任务的时候，哪个任务的激励最强，代理人就会把资源调度到这个任务上来。

具体到我们国家的情况，哪一个指标激励最大，官员们就会不惜牺牲其他方面，来把这个指标搞上去。比如，计划生有一票否决。官员们怎么办？全部资源都用于抓计划生育，公检法全上，其他办案全停。结果计划生育搞上去了，可是其他方面呢？

管制者的信息严重不足

张维迎：其次，管制者常常是无知的。这里面的原因，一是像哈耶克所说的，由于市场的分散化，每个人只能了解他所能了解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信息是分散的，分散的信息只有市场才能汇集和反映。但管制之后，市场传递信息的渠道就不存在了，管制者怎么还能知道呢？

二是管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得这些信息，因为获得这些信息对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退一步讲，就算管制者有很好的积极性去了解真实的成本。但是，管制者的时间、精力有限，怎么可能对那么多的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呢？管制者也许可以考虑雇用独立的审计部门来帮助审计，但是，独立的审计部门也可能与企业合谋，管制者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再就是被管制的对象有更大的积极性欺骗管制者，或者收买管制者。在一个市场上，想要收买消费者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收买管制者就要容易得多。这样，尽管管制者知道被管制者报的成本是不真实的，却没有积极性去审计或更正。

打个比方，你说要搞价格自律，说人家企业订的价格不合适，那你能知道什么价格是合适的？你要知道什么价格是合适的，你必须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生产者的成本，你还要知道替代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的替代弹性，等等。所有这些，管制者怎么可能知道？如果管制者不具有有关价格的这些信息，你怎么能知道他作出的决策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有利还是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呢？

管制者经常被被管制者俘虏，也与信息有关。最近 Holmstrom 和 Tirole 的一篇文章讲到“正式的权威”与“非正式的权威”，认为无论是“正式的权威”还是“非正式的权威”，获得权威都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之一是要花时间去获得必要的信息。如果管制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企业，事实上他就不可能有权威说这个企业报的情况是

假的，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接受它。

管制者可能言而无信

张维迎：第三，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客观上有些政策会形成事先和事后的效率冲突，这样使得事先最优的政策在事后证明是不可行的。好比说，你是垄断企业，我来管制你。我规定一个价格，你不能超过这个价格，你要不断降低成本；如果你不降低成本，到时候亏损了我不承担损失。

但如果管制的结果只允许这么一家企业存在，好比说航空公司，那它亏损以后，你能让它倒闭吗？你不可能让它倒闭。当你消灭了这家企业的竞争对手后，你其实也就消灭了竞争的压力，消灭了这家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因为你所有约束它的政策都变得不可信，就像通常所说的“大马不死（Too big to fail）”的情况那样。

另外一方面，就算不存在客观上的障碍，管制者有没有积极性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呢？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前面提到，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并受到各个利益群体的制约，这已足以妨碍政府的政策一以贯之。

如果政府批准你建一个水厂，并给你一个利润空间，譬如说5%，同时承诺如果你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多赚的钱都是你的。现在我们设想，这个企业真的这样做了，多赚了钱，会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企业的高利润会引起其他的消费者、选民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个企业的利润不合理，太高了，一定要降下来。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收回成命。这样，如果企业预期到政府会将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所带来的好处收走，它为什么还要提高效率？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设，即政府是一个无所不知、大公无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这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都进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对原来的管制重新考虑的原因。

管制失败的具体事例

赵 晓：请举出一个管制失败的具体例子。

赵 晓 VS. 张维迎

张维迎：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医药管制的实例，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们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是假的，那是有责任的；但是，药卖了多少钱，他们并没有收益。这样，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的申请报告压在抽屉里，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只要不批准，就不会有新药，当然也就不会有假药。

因此，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

许多管制其实都是这样。有一个教堂馆所失火了，我们马上去追究消防队员的责任，问你们当初是怎么审批的。那么这样一种做法的效果会是什么呢？消防部门最好的决策就是我不批准搞教堂馆所。对吧？不批准、你就没法失火。

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也是管制失败的例子。银行家在市场中放出贷款，他知道有风险，与此同时他也有一个预期的收益。他与借款人谈判，设法达到最好的风险收益比。而我们的金融体制呢？以往贷款没有责任的话，大家就乱贷款，刹都刹不住；现在是谁贷出去、谁就要终身负责。那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贷或少贷。我贷出去我要终身负责，但贷得好了我又能享受多少收益呢？

34

企业信誉在竞争中自发形成

赵 晓：你说过“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互补的基本机制”，市场秩序必须以信誉为基础，同时强调“对信誉的挑战来自政府”，管制与信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总的来说，信誉机制靠市场竞争形成，而管制常常会阻碍这一机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坏这一机制。

对于市场的运作，我相信大多数批评市场的人远远低估了市场本身维护其运转的力量，特别是低估了市场本身维护信誉机制的力量。

好比说我们谈垄断，有自然垄断、行为垄断和法定垄断等不同类型，好多西方的管制针对的都是卡特尔垄断——几个人合起来，然后定一个高的价格。这样的垄断是不是要管制呢？现在经济学家们大多持否定立场！

你不要以为有人一举起拳头来，就会打死你；更不能因为有人举起拳头来，你就一枪把他打死。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人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信誉机制会约束一个具有主导市场能力的企业行为。比如，如果这个企业销售产品的价格持续地达到最优的垄断价格，消费者就可能对它进行惩罚，如寻求替代产品——尽管是不完美的替代，即比消费者本来要买的量要少，但毕竟可以以此作为惩罚。所以就算是一个具有市场强力（market power）的垄断企业，它也会注意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也会自我约束。

可以这么讲，如果企业只是凭一己之力而形成的市场垄断，所能达到的效果非常有限。鲍莫尔提出了“可竞争理论 contestable market”，认为市场上即使只有一个企业，但如果进入的成本不太高，这个企业的行为就会表现得相当于有一个竞争对手一样。否则，企业追求垄断行为，就会有新的进入者进入，这对它威胁更大。这也许就是西方在航空等领域放松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理论不难理解。我们看家庭中一夫一妻制其实也是一种垄断，夫妻双方彼此垄断对方。但是，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面临着第三者插足的危险，所以“垄断”的约束并不真的那么可怕。

管制导致最坏的垄断

张维迎：垄断者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情况只有在政府管制所给予的“法定垄断”下才有可能出现。因此，真正可怕的是一般的行为垄断变成了法定垄断，这时候再没有人能够挑战它。

管制正是法定垄断的根源。事实上，管制的初衷可能是限制垄断，最后的结果却是将行为垄断变成了法定垄断。这种法定垄断形成后，因为没有挑战，就成为最坏的垄断，和其他垄断不一样、没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够限制它。

我有两个判断，一是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第二就是管制越多，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贿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赚钱，而老实巴交、诚实守法的商人，他们或者受自我约束，或者没有额外的资金去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市场。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难进去，骗子更容易出现。

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觉到是因为它不该管或管得太

多，反而误认为它管得还太少。这样，管制会自我强化、变本加厉，最后令信誉机制赖以形成的市场竞争无立足之地，企业信誉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不要让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

赵 晓：许多著名大公司都有“召回制度”，譬如英特尔；发现新推出的芯片有问题，马上全部召回。这里边不是政府管制而是信誉机制在起作用。一个药厂是生产假药对它更有利，还是建立信誉对它更有利，我想从长远看，答案应该是后者。

张维迎：是这样。如果没有政府管制，靠市场竞争及其信誉机制，更多更有高效率的新药完全有可能及时推出，减少的死亡人数有可能更多。

所以我这里想强调，我们经常赋予政府太大的责任，这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在市场当中你应该是让直接的行为者去承担责任，而不要让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

赵 晓：是不是取消了管制就一定会有信誉呢？西方放松管制，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我们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张维迎：我们现在的麻烦就在于，由于这么多年的计划经济、政府管制，市场啊信誉啊这些都被消灭了，一旦放开的确有可能更乱。

好比这么多年，猫都杀绝了，让人再抓老鼠，现在老鼠很猖獗，你说让人回家休息，人们就担心，短期内猫也没有人也没有，会不会全是耗子？但如果老这么拖下去的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选择。如果着眼于眼下，那就维持这个状态；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逐渐放开，信誉机制就不会建立起来。

信誉依赖于稳定预期

张维迎：信誉的建立依赖于稳定的预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像我曾经举过的栽树的例子，不是说今天这树的

产权归你，你就有积极性栽树了。如果你预期明天会不稳定，你仍然没有栽树的积极性，相反你会先砍了树再说。因此，稳定预期的形成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在这个过渡阶段可能会有好多困难。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企业搞技术改造的情况。好多企业为了提高当年的利润指标，不提或少提折旧，不大搞技术改造，光靠拼设备。这样，当年利润可能上去了，但一代产品卖完后，就没有新的产品了，终究败下阵来。

国外企业的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卖第一代产品的时候，第二代产品就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同时着手研制第三代产品。市场秩序的建立与此类似，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考虑：谁是我们后续的市场秩序建立的生力军，谁将是我们这个市场的运营主体。

政府信誉与权力体制相关

赵 晓：企业要讲信誉，政府要不要讲信誉呢？

张维迎：政府当然也要讲信誉。但是，政府是不是讲信誉与政府的权力体制很有关系。比如，地方行政长官调动频繁，那他就不会讲信誉，或者讲信誉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大。如果地方官员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命运跟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他就会比较讲信誉。

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外来的投资者没来之前，地方官员曾许诺许多优惠条件，可是一旦进来之后，就关起门来打狗。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只管他任期内的事，我把钱花完了，以后没人来是后任的事。下一届别人当市长、书记，投资者不来不关我的事。

甚至不乏这样极端的心理考虑，也就是说，前任希望在他退下来后，下一任不如他，以显示出自己更能干，让大家怀念他，这样他故意把钱花完。这跟私营企业不一样，你从企业退下来后，你还有股份在里边，你当然希望企业更好。

在国外，做一个好总统，在任时讲信誉的一个约束还在于，如果你是一个好总统，你到大学等场所讲演的机会就会很多，讲课费也会更高。但如果你总统当得很糟糕，那你退休之后再赚钱的机会就少多了。政府的信誉只有政府的官员有积极性去讲，才有可能逐步建立。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是可以随便调动的，那么这时候行长们就很难考虑信誉问题。我花很大的努力为银行建立起信誉，但是过几天把我调到另一个银行，我创造的信誉反而给了我的竞争对手，我何

赵 晓 VS. 张维迎

善呢？

为什么贷款要抵押？它其实是可以进行事后惩罚、从而迫使你讲信誉的措施之一。如果你欺骗我，那你的抵押品就没了。在古代，国王或者诸侯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对方去做抵押，表明自己决不侵犯对方。结婚交财礼也是这样，如果你悔婚约，你的财礼就白交了，这也是让你讲信誉的一个手段。

在政府这方面，它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资源做抵押，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法律、通过制度规则来限制自己的行为。

政府的人事制度，包括领导的任期、选人方式都会影响到政府信誉的建立。在西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政党内部的制衡以及政府内部的人事制度、任期，都对政府产生制约作用，迫使政府不得不讲信誉。

经济全球化导致政府间的竞争

赵 晓：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对于政府放松管制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张维迎：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以及发展互联网的意义非常大。网络化的一个作用是大大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加入WTO则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步。

对政府而言，全球化的最大涵义是使得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成为全球市场中的一个“企业”，面临竞争的考验。当然它是个超级性的企业，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在国际市场上它开始有了“面对面”的竞争对手。

这样，产品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人员也会更自由地流动。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参与约束变得重要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的竞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变得有点像市场竞争中的饭馆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政府的行为变化很大？这与国际竞争不断强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关。在全球化时代，你这个政府没有信誉，人们就会往其他的国家跑。原来我们说肉烂在锅里边，现在肉可以不烂在锅里了，肉会跑到大海里，会烂到人家锅里。

对外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市场知识的扩散，让我们大开眼界。

让大家认识到市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原来的许多市场概念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但教科书上说这些东西时，已经把好多复杂的东西抽象掉了。现在外国人进来了，外资进来了，人家提出国际惯例的问题，我们才知道，活生生的市场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些在其他地方玩过的人，那些美国、欧洲的大玩家，特别是跨国公司大量地跑到中国来，西方市场经济的文化必然会带到中国来，这些人对完善的市场经济要求很高，对投资环境尤其是政府行为很敏感，这对政府也会形成压力。

一个良好的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竞争出来的，过去中央政府缺乏竞争，这一点在加入WTO后定会有重大改观。

竞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赵 晓：地方政府好像变得更快一些？

张维迎：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早已开始了。我们原来的计划体制没有竞争对手，地方政府因为没分权也没有竞争对手。后来地方分权之后，地方政府有了竞争对手，所以地方政府的行为会逐步地规范起来，哪个地方不规范的话，它就会失去竞争力。

地方政府竞争，一开始想到的是保护地方利益；到后来它发现，真正要发展，就得保护投资者，这时候它就想到要修改它的规则。否则，投资环境不好，资本、人才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像西部的一些地方，“一江春水向东流”，优秀人才都跑到广东、深圳去了，资本也进不来，经济怎么搞？这个时候，就逐渐形成了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发现，政府讲信誉，不干预企业，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最为重要。

警惕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垄断系统 战略储备可能加剧供求矛盾

赵 晓：针对国际油价的波动，有人提出要搞“石油战略储备”，这也是管制的一环。你的看法如何？

赵 晓 VS. 张维迎

张维迎：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政府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已经消灭了石油企业家，不得不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设想平抑物价、保障石油供给的目的究竟能不能实现？

根据中国过去的经验，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比如，政府本来想通过粮食进出口来平衡国内市场，结果分析发现：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在出口，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在进口。不仅没有起到平抑的作用，反倒加剧了供求矛盾。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涉及政府本身决策障碍问题。好比说今年粮食歉收了，应该进口粮食。但进口粮食要审批，要签订合同，中间有许多环节和渠道；另外，粮食也不是个简单的现货市场，今天去买就买了，往往真买的时候已是第二年的事了。结果等到第二年粮食到岸的时候，情况可能变了，粮食丰收了。

粮食丰收了，赶快又出口。然后又是报审批，跟人家签合同，再运出去。可是等到出口粮食的时候说不定粮食又歉收了。

搞石油战略储备也是这样，我想这个东西可能比较危险。

政府无法对市场快速反应

赵 晓：这里还假设政府官员没有私心杂念，真想平衡市场。

张维迎：就算政府官员一心为公，也还是有问题。因为政府的决策程序跟企业不一样。企业可以快速对市场作出反应；政府却不能，一定比企业慢一拍两拍，这样就会经常地出现反调节。

为什么政府的节奏慢？一是政府对于信息的接收比较慢。在市场当中，每一个企业家都要预期未来，但政府要想预期未来比较难，它不太容易做到前瞻（forward looking）。政府一般都是问题来了，最紧迫的问题需要它去解决，它才会去做，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是这样。

二是政府花的是公家的钱、国库的钱，它要考虑一下，怎么让这些国库的钱不被乱花。为此采取一个官僚化的程序是必要的，否则政府像私人决策那样快，腐败就会出现。

然而，这个官僚化的程序在防范腐败的同时，也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反应迟钝。政府为此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比防范腐败的损失还要大。但是，在市场上的损失没有人去追究责任，也没有办法去追究责

任，而腐败则要被追究。

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政府必须对市场快速反应，最后的办法是将这些官僚程序都取消，根本不去搞什么管制。

警惕外国公司进入垄断系统

赵 晓：几年来，国际油价最低时我们拼命打击走私，而国际油价最高的时候，我们却进口了历史上最多的石油。这与粮食进出口情况颇为相似。

张维迎：这又涉及另外一个矛盾，即政府作为管理者与产权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与政府企图平衡市场的功能之间是有矛盾的。

国际油价很低，自然诱惑人去走私，这时候就会对国内石油企业形成很大的冲击，但政府是国内石油企业的所有者啊，这怎么行？政府要保护国内的石油企业，当然就要减少进口、打击走私。

石油的问题我还想讲一点。中石油上市了，中国石化也上市了。在上市当中，政府作为最大的股东，为了顺利地募集资金，它对国外的公司作出好多承诺，而这样的承诺对长期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是有损害的，至少不会有积极作用。

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情况，中石化要BP（英国石油）、壳牌入股，作战略投资者。这些跨国公司入股，当然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求对它们开放一定的中国的成品油市场。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同意为他们分割蛋糕：比如说BP在A省、壳牌在B省卖油。

这是一个很坏的做法。我们本来搞开放、引入外国公司，为的是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而现在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什么？等于是说我们使得外国公司进入了我们自己的垄断系统，有步骤地瓜分中国市场。

那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公司本来在国外不可能拿到的东西，现在借助于我们中国自己的石油公司拿到了。这样一来，石油公司上市过程中就带来了外国公司垄断和瓜分中国市场的严重后果。

出卖垄断暴露管制的不合理性

赵 晓：类似的问题在其他领域也屡屡发生，周其仁教授就曾在《21

赵 晓 VS. 张维迎

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上为文分析中国电信在香港市场“出卖垄断”的行为

张维迎：“出卖垄断”的做法彻底暴露了管制的不合理性。在国外，政府作为管制者，法律规定要保护的是消费者，而我们的管制者保护的却是投资者。像电信管制，不是保护消费者，而是保护投资者。难道中国几千万的手机用户以及和手机用户相关的几亿人，他们的利益在天平上还抵不过香港的几家基金公司吗？

所以我认为，这时候政府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政府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管制者的行为，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所有者的行为，并掺杂进了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

金融业应允许和提倡竞争

赵 晓：你对金融管制怎么看？

张维迎：金融行业比较特殊。一是金融行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为严重，债务人作出承诺到兑现这种承诺的时间更长，这样的话，机会主义、欺骗行为可能会产生。

另一方面，金融业有较强的外部性，涉及整个货币体系，一个金融机构倒闭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这些特性使得人们通常认为有必要对金融业加以管制。

但就现在来讲，我想我们国家金融业的管制远远多于它应该管的。因此，金融业更多的应该是允许和提倡竞争。我们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标竿，比如说资产必须在多少以上才可以开银行。但是，只要达到这个标竿就一定不能有歧视，不可以批张三不批李四。谁先符合这个条件，谁先进入。

对金融业的管制并非越多，欺诈行为就越少。现在我们的管制很多，但坏账更多。我们看看当年山西票号的情况，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100多年里，它并没有什么欺诈行为啊！那时候，办银行不需要审批，也没有中央银行的监管。它靠什么呢？靠的是信誉。

管制太多，信誉就没有了。在政府管制下，已经进入的银行拥有垄断权，可以坐享丰厚的垄断利润，干嘛还要建立信誉？

在利率自由化的情况下，信誉好的银行可以给存款人付低的利息，不好的银行则要付高的利息，因此银行都有积极性建立良好的信

誉，但如果实行利率管制，我信誉再好，我和别人的利率都是一样的，那我何必建立信誉？

还有个产权问题，也就是说，因为金融机构是国家的，就更不会有信誉机制了。既然是国家的银行，老百姓知道反正有政府兜着，把钱存在哪一个银行都是一样，他就不会有积极性去选择银行，或者去惩罚信誉不好的银行。

金融管制已经影响了中国的银行提高效率、建立信誉，所以金融业迟早要开放竞争。我再重复一下，可以设一个进入标竿，但只要达到这个标竿，任何人都可以办银行。

未来一定是民营银行的天下

赵晓：现在发展民营银行的呼声渐高，但是国有银行人士认为没有操作性。

张维迎：任何法定垄断领域，如果有别人想进入，垄断者一定会游说政府，找出无数的说垄断好的理由，这可说是本能的反应。垄断者很清楚，就谋取最大利益来说，没有什么比法定垄断更好的手段，至少他可以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过一种清闲的生活”。所以国有银行的反对是很自然的。

但实际上，未来更应该搞的是民营银行。国有银行由政府兜着，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激励去提高效率，效率不高怎么和外资银行竞争？所以未来一定是民营银行的天下。只有民营银行才会有积极性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

如果说国家一定要办银行，办商业银行还马马虎虎，投资银行绝对不能办。投资银行要求非常灵活的体制，非常强的激励机制，这些政府根本办不到。

投资银行也好，商业银行也好，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对信用的需求。

以投资银行为例，为什么卖股票的企业不直接去市场摆摊，而要通过投资银行来间接地卖呢？因为前一种情况投资者更容易受欺骗，企业也就更不容易得到别人的信赖，所以投资者不愿意出高的价格。而投资银行以自己的信誉担保企业的价值，投资者就愿意出高价。但如果投资银行本身不讲信用，其存在的意义也就没了。

在国外，投资银行一定要靠说真话、讲信誉来赚钱。现在，国内

赵 晓 VS. 张维迎

的银行为什么说假话还能赚钱？当然是因为垄断地位和政府管制。所以，放松管制和发展民营银行是国内银行建立信誉机制的出路所在。从股份制和银行民营化开始。

赵 晓：在你看来，民营银行放开是早点好还是晚点好呢？

张维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应该这么想：如果我们在 10 年前就有计划地放开民营银行，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产生一批非常大、非常强的民营银行了，但我们没有。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放开，那么 5 年、10 年后放开，中国的金融业一定会更加被动。

民营银行的发展有一定风险，但可能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大。因为现在发展民营银行，不会从一个人先卖土豆赚了钱再开始。中国已经有大量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股份制银行也起步了。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从股份制银行开始呢？另外，国有银行也可以搞民营化的试点。产权不变机会主义将泛滥。

赵 晓：难道国有银行就一定贷不好款？

张维迎：国有银行贷不好款事出有因。当市场上企业的信誉建立起来时，你愿意把钱贷给谁？你肯定愿意找信誉好的企业。但现在信誉好的企业特别少，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找好的企业？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如果这个企业是政府圈定的重点企业，企业老总当过全国劳模，所有的银行就都有积极性去找它，这个企业的钱就会花不完。

当自由现金（free cash—flow）多的时候，管理人员就开始胡闹。这样，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好的企业，由于银行拼命给它授信、放贷，最后变成了一个坏企业。

国有银行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譬如，贷款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一旦垮了，钱还不上，人家可能怀疑你吃了回扣。而国有银行贷款给好的国有企业，尽管到时候它也可能出事，但贷款的时候它毕竟是好的啊，大家都是同意给它贷的，贷款人的责任就轻多了。

因此，贷款人的机会主义，谁也不愿承担贷款责任和风险的做法，其结果肯定是集体性地创造出一批坏企业来。除非通过产权变革，使银行自身能够承担责任，否则贷不好款是很自然的。

最后我想，如果国家在放松银行管制上有比较大的动作的话，可以给社会一个信号，表明政府有一个承诺，会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

换，从而产生一个额外的“信誉”收益。

中国股市为什么骗子奇多？ 骗的和受骗的都得到好处

赵 晓：有关中国股市“基金黑幕”、“庄家操纵股市”的报道接连不断，你对股市的管制怎么看？

张维迎：且闻与管制有关，也与产权有关。在中国股市，缺少真正的长期投资者，政府随意地管制，大家没有稳定的预期，不出问题才怪呢。

“自己搞不死自己”。如果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是政府的企业，政府就很难下手。这跟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业要是名声坏了，它也就完蛋了。但如果是国有企业，市场要你死，政府还想让你活呢。这种产权结构必然对市场产生破坏作用。

如果股市出现了很多骗子，那么一定有受害者。受害者呢，不一定有办法用法律手段来起诉欺骗他的人，但他还有一招，那就是不再买你的股票，不再跟你做交易。这是他对你最后的惩罚。你因为担心这一点，行为就会变得规范起来，就会讲信誉。

现在我们的股市，有那么多骗子，相应就有更多的受害者。那些受害者，比如说散户，没有多大的力量，但他们可以选择“退出”，结果可能就是市场交易的急剧萎缩。

但是，中国的股市并没有出现急剧萎缩，相反，股民们还是奋不顾身地往里冲。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如果政府承担了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的责任，那么这个股市现在是不能萎缩的，它必须不断地发展，而政府可以想方设法使得受骗的人不退出这个市场。

政府如何能让受骗的人不退出这个市场呢？一个办法就是给受骗的人进行补偿。由于政府给了受骗人补偿，所以受骗人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受到损害。总体上可能就是这样。这样，他们才有可能继续在市场交易。这样一来，那些骗子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继续行骗。

我一直在想，中国这么一个股市，明明上市公司没有收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小股民一个劲儿地往里冲？他一定是有好的预期！他必然觉得他可能得到的好处比他可能受到的欺骗加上其他成本还要大，他才会往里冲。

我发现事情可能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股

赵 晓 VS. 张维迎

市，所有冲进股市的人，除非你运气特别不好，否则都会得到一些好处。好处是股市外的人支付的。

张维迎：那么，骗子们拿走的钱是谁支付的呢？是那些在股市外的人支付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好比说琼民源，做假账垮了，买它股票的人受骗上当。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股民就会受损，就会学乖，他以后会更加小心地去了解一个企业，慎重买股票。

但是我们采取什么办法？琼民源垮了，股民有意见，说这个市场不规范，他们要闹事，政府就把“中关村科技”这个名称给了琼民源，而琼民源原来濒临破产、受骗的股东，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关村科技”的股东，股价翻番，皆大欢喜。你想想，“中关村科技”包含了多少因为政府管制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

如果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话，大家就会形成稳定的预期：没关系，我知道股市有骗子，我可能会被骗，但如果我真的被骗了，政府会从其他的渠道来补偿我的。如果将来“中关村科技”也不行了，再换成别的科技股票就是了。

这样就使得股市泡沫啊、黑幕啊、骗子啊越来越多。受害的场外人无法采取行动。

46

赵 晓：为什么场外人没有谁想到这一点，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

张维迎：经常能证明，集体行动存在许多悖论。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在早期的英国，国王大量地借私人的贷款，却又任意地修改借款合同，延期还款、降低利率等等。如果债权人预期到国王这样做，就不会给他贷款，或者联合采取对策。

但问题在于，这些人很多，国王总是可以贿赂其中的一部分人，让反对给他贷款的联盟形成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的破产法规定都要有一个“优先程序（priority）”，要有“债权人会议”，目的就是要防止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

否则，我这个企业要破产，我欠 100 个人的债，其中也欠你的，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债权人，他们的钱我都不还，我只还你的，把你给安抚住，你还继续给我支持，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建立信誉了。

股市情况与此类似。政府用场外人的资源补偿场内人，因为股民

很集中，有这个要求，而场外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很分散，而且利益相对间接，尽管大家有利益在里边，但不可能形成合力阻止政府这样做。而且，个人明智的选择是，与其发出声音阻止政府这样做，还不如我自己直接进场寻租更好。所以我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寻租场”。管制使烂柿子值钱好柿子难卖。

赵 晓：现在股市之所以能不断扩展，是因为政府的资源无穷无尽吗？

张维迎：资源当然不会无穷无尽，但现在还没有耗尽。你犯了错误，政府必然会调用其他的资源来掩盖你的错误，政府的隐含担保使得所有在股市上玩的人都预期自己不会受到损害。

我还想说说郑百文的案例。在西方，如果企业垮了，股票将一钱不值，但在中国，一个企业破产了，可能创造出对壳的需求。比如，山东的三联有积极性去买这个壳。这个壳在经济学上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管制租金。这个壳又可以使得那些受骗的股民得到补偿，ST 郑百文的股价还可以涨停板。

在市场中，破产的企业是不可能有人来买的；即使买，也不付多少钱。我要上市，我自己可以上市，我干嘛披着你的外衣？但中国不同，上市是政府的垄断行为，我自己上不了市，就只能借壳上市。

你去卖西红柿的时候，如果烂的西红柿和好的西红柿搁一块的话，好的西红柿的价钱也会掉下来。但我们的问题是，好的西红柿不让卖，只能卖烂的西红柿，所以我为了卖我的好西红柿，只好将它塞进你的烂西红柿中混着卖。当前股市上烂的西红柿很值钱，损害的是好的西红柿应有的价格。

场内人与场外人的收入再分配

赵 晓：在郑百文案例中，山东三联是不是好西红柿？如果买壳对三联的利益有损，那为什么三联还要买呢？

张维迎：受损的是全中国所有的好西红柿整体。买壳对三联是有好处的，所有入场的人都能预期得到好处。

我是个大投机商，我做庄，我骗了你一把，我赚大钱。你是个小股民，你损失了 100 块钱。但是，你不要害怕，政府会补给你 120 块

赵 晓 VS. 张维迎

钱，你满意了吗？原来股市上的 120 块钱是政府垄断转移来的。

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确实类似一个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因为垄断有效率损失），但对场内的人而言，是一个正和博弈，是用 120 块钱的场外资源来维持场内皆大欢喜的局面。

可见，中国股市确实存在着场内人与场外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没有外部输血，没有政府资源的进入，如果受骗者得不到补偿，这个股市就没法再持续下去。

场外资源用完股市就崩盘

赵 晓：那么，这个游戏会永远持续下去吗？

张维迎：不能。比如说有 10 个人，政府向每个人收 100 万块钱，许诺建 10 套房，政府收到 1000 万块钱。但政府花钱的效率很差，1000 万只建了 4 套房子，只有 4 个人能够得到，所以大家都去抢房子。抢到房子的人很高兴，没抢到房子的人就要闹事。

政府怎么安慰呢？再向另外的 10 个人收钱，给要闹事的人再建几套房子。然后是再收钱，再建房。但总是建不够应有的房子，这样又会有人闹事。再闹，再输血。到最后，没有新的资源，不能再输血了，这个博弈也就完了。

所以，中国的股市是个资金黑洞，什么时候资源用完了，也就完了。从时间上看，一旦大家预期到场外资源要用完，股市就会崩盘。然后，股市再慢慢走上正轨。

垄断创造和吸引更多的骗子

赵 晓：这让人想起杂耍中的“锅盖舞”，三个盖盖五个锅，你看任何一个锅都有盖，但要是同时检查五个锅，就露馅了。

张维迎：我担心玩不到这个水平。股市中的欺骗其实是政府有意无意中造成的。政府为了防止欺骗，它又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好比说规定上市公司 3 年净资产收益率在 10% 以上才能增发配股，由此导致上市公司进一步的短期行为。

试想，我上市后募集了 1 个亿的资金，加上我原来 1 个亿，我每

年必须有 2000 万的利润才有可能配股，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好的项目都不可能一两年盈利。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怎么办呢？它自己就最积极性去做庄炒作。

它本来过不了这一关，但现在自己炒自己，过了这一关，而实实在在的企业反而不敢上市，因为它上市后达不到这个要求。从理论上讲，这个东西不难理解。就像斯蒂格利茨和温斯的信贷配给理论提出，由于存在着“逆向选择”，银行的贷款利率提得越高，老实的企业越不敢来贷款，来的全是骗子和冒险家。

由于“逆向选择”，越有能力操纵股市的人越愿意上市，因为它最有“能力”满足监管的要求。可见，政府的垄断、管制本身在创造骗子，然后政府为了防止骗子，设置新的规则，迫使人们更加追求短期行为，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骗子进来。

管制像抽鸦片，会上瘾

赵 晓：你说“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全盘否定管制，是不是有些绝对？

张维迎：现在全世界都在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经济秩序，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为什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就是因为政府管制像抽鸦片，会上瘾。管制创造出大量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会雇经济学家、学者来为自己的存在“证明”合理性。这样，管制将内生性地膨胀，越来越厉害。这是客观上的情形。

主观上呢？普通人往往不容易认识到管制的危害，在出现问题时，往往想到的是这个该政府管，那个该政府管。他不明白，当一个市场被政府管得太多的时候，就可能完全丧失免疫力。

政府管制会导致人们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讲信誉就很难。如果大家都不讲信誉，就会有人站出来讲，需要政府维持秩序。这也就是说，政府或者说管制者其实是自己在为自己创造需求。

他们把猫打死了，结果耗子满街跑。然后，再假装学猫叫，来吓唬耗子。无奈耗子还是越来越多，于是就不断地增加学猫叫的人。这样，管制在消灭了维持市场竞争、市场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后，自己的力量却内生性地不断膨胀。

当然，中国的问题有点复杂，原来我们建立了许多消灭和替代市

赵 晓 VS. 张维迎

场的部门，这些部门在转轨时期摇身一变，现在又以规范市场的管制者的面目出现，但是它手里的权力范围并没有削减。这样的话，规范市场、管制市场本身可能变成对市场的最大的损害，因此，戒除管制就更是重要了。

赵 晓：我想将你的比喻做点发挥。如果把猫比做市场竞争，它当然会消灭耗子。无奈计划经济把猫消灭了，而人们习惯了狗拿耗子。转轨之后，猫还来不及繁殖，耗子多了起来，但人们误以为狗太少，于是呼吁进一步养狗，可是狗太多，猫就没法活了。

张维迎：这也就是说，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本来你可以正常吃饭，维持生命，现在有人说你得病了，肯定是因为没吃好，我把你的嘴堵上，给你打葡萄糖吧。然后就成天给你打吊针，结果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弱，你却认为葡萄糖打得还太少，应该加大量，这样一直到你死为止。

政府权力越大 投资者越没信心

赵 晓：那么，戒除管制应该从何做起？

张维迎：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一是削减政府权力，二是改变权力使用的方式，三是提高权力使用的透明度。

削减权力其实是把大量的本来就应该属于个人的权力归还给个人。这门是我们自己家的，现在你把着门，我进自家的门还要给你小费，你说合理不合理？像这样的管制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当务之急，要尽快消除各种各样的审批。审批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继承了计划经济的做法。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力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即使对政府而言，限制自己的权力也是有好处的。过去我们认为政府越不受制约，政府得到的好处就越大。政府官员更是经常地“聰

明反被聪明误”，误以为权力越大，就越能干事。

事实上，政府享有的权力越大，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就越大，人们对政府就越没有信心，投资者没有信心就不来投资，老百姓没有信心就不会多花时间去投资专业技术、教育和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日益落后。相反，政府对自己约束越多，经济发展可能越好，尤其当一个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更是这样。

这里面的原因，是政府不能把老百姓假设为一个被动的机器，政府一定要考虑到每项政策都是跟老百姓、投资者、商人、消费者进行的一个博弈，这中间存在着“激励相容”的约束。这也就是说，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人家总是有对策。

政府可能是先动者（first mover），老百姓是后动者（second mover），但中间一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老百姓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政府的政策随机性越大，变化越大，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就越低。考虑到这一点，政府的每项政策当然就要预见到老百姓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否则就会得不偿失。

一个自我削减权力的好案例

张维迎：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 17、18 世纪的英国。英国在 17 世纪后期“光荣革命”之前，国王享有非常大的权力。当时英国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够花，所以要借债。但国王没有讲信用的声誉，他随意修改债务合同，而债主对他没有惩罚的能力。这样，好多人不敢、不愿给他借债。

博弈论讲，假如我违约，你惩罚我的能力越大，你就越愿意同我做生意。但和英国国王做生意，这一前提不存在，人们惹不起只好“躲得起”。这样，直到英国在“光荣革命”也就是 1689 年的时候，王室能借到的总债务也不到 200 万英镑。

“光荣革命”后，新的政治架构产生，国王的权力受到了议会的限制。当时规定，任何国债合约的条款要进行修改，或者发行新的债务、延长旧的债务，一定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这样一来，政府的随意性大大降低，而放款人的信心大增，英国政府的借债能力反而提高了。

时隔 9 年，英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 1670 万英镑，比“光荣革命”时翻了 3 番多。有了这样的融资能力，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就打败了法国，之后就发展成为头号工业强国。

让别人到你这个地方来投资也是一样，如果你的权力太大，为所

欲为、你大概只能吸引到很少的一点投资，但是你削减权力、自我约束，反而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

最重要的是政府说话要算数

张维迎：从英国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启发：行政裁量权一定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政府直接决策的权力大多数都有必要转移到立法机关。这是因为，立法机关本身不能直接行使这套权力，所以它为自己去谋利的机会相对较少，由它来制定法律就比较有可信性，对社会的损害就会大大减少。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应该逐步将大量的立法权由政府转到人大，让政府主要变成执行机构，而不能给它太多的权力。

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一定要说话算数，政府的信誉至关重要。外来的投资者、本国的国民，他为什么要相信你的政策，跑到你这里来投资？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信誉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政府搞一锤子买卖，总是追求短期行为，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追求短期行为。如果政府说话不算数，这个社会也就不会有说话算数。我想这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

可惜的是，我们不少政府机构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报道过陕西兴平市有一个工厂需要 500 万元的投资。当地政府承诺说，谁能够在 10 天内打进 500 万到账上，谁就可以经营这个项目。后来一个私营老板真的把 500 万资金打到了账上。结果呢，政府又不承认了。这就是政府的机会主义。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像卖企业，政府今天将这个企业卖了，过两天工人一闹，赶快又收回来，一点不考虑当初卖企业的合同。像这样的政府机会主义、言而无信的做法，怎么能不导致个人的短期行为！投资者怎么可能形成稳定的预期！个人之间交易，我的东西本来可以卖 100 块钱，结果我犯傻，10 块钱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后悔。后悔怎么办呢？打自己两耳光吧！但政府不是这样，后悔了，就打你两耳光，以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撕毁合同。

权力行使方式应该市场化

张维迎：第二个方面，如果这份权力还必须由政府拥有的话，那就要

改变行使权力的方式，尽量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权力，好比说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实在放弃不了的，可以多在这方面想些方法。

权力行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选美”的方式，让有权力的人来选择合适的人。另外一种是拍卖(auction)的方式。拍卖方式优于“选美”方式的地方在于，它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监督代理人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从而减少腐败行为。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电信营运权实行的就是拍卖方式。

当然，好多权力运用市场方式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比如说，拍卖一个企业与拍卖一个古董不一样。古董谁出的价格高我卖给谁，但企业也许不能简单地因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里边还有个环境考虑的问题，还有个我对你的信心问题，还有个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但是，拍卖的方式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腐败。

北京市的出租车有6万辆，办一张出租汽车牌照的市场价码在10万元以上，仅这一项多少钱？60多个亿。如果拍卖，比如说你这个出租汽车公司需要多少辆车，可以去参加竞标。拍卖的钱收归财政。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减少其他许多扭曲的税收，一举多得，效率还可以提高。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结果这许多钱都变成了某些个人的私下收入。

政策要透明 产权须保护

53

张维迎：第三个方面，如果权力使用的方式也无法改变的话，那么一定要想办法提高权力使用（政策）的透明度。

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回归之后，它的交通规则就没跟内地接轨，我们靠右行，它靠左行。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因为信息和规则是透明的，所有的香港人都明白你是靠右行的。由于规则透明，香港的司机到了深圳后，它仍然可以开车，只不过应该按照这里的规则来开车就是了。

以往，我们喜欢把规则装在兜里，不给人家看，这不行！你这样不透明，让投资者不放心，谁愿意到你这里来投资！

透明度的问题今后会越来越很重要。我们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后，并不是所有的规则都是必须和国际接轨的，有些规则不一定要跟它接轨的，因为接轨是一个长期变革的过程，但是规则一定要是透明的。

另外，政府还有一项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法律保障特别是保护产权的责任，这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如果政府在这方面不花力气，如果力气还仍然花在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上，就像现在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所做的那样，就想歪了。

未来应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赵 晓：我们国家也在努力放松管制。但人们的认识好像还不是特别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往回走。

张维迎：应该说这 20 年来我们走得还是不慢的，问题是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了，我们现在看到了更多的问题。原来认为是习以为常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发现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需要进一步地改。

这里我想提一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的教条，提出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则成为政府官员头上的紧箍咒。以往 20 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应该说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在目前情况下，政府的工作是不是应该转移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上来？政府保护产权、维持公平交易的规则就够了，最好不要插手具体的经济建设。因此，未来 20 年，为了继续发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政府应以维持市场公平为中心，以保护产权为中心，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赵 晓：这些年来人们对政府“真抓实干，发展经济”早已习惯成自然。现在你提出政府“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这个弯转起来可不容易。

张维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目前还将大量的精力花在经济发展方面，甚至像深圳这样观念比较超前的地方也是这样，真的是想歪了。

其实，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你只要进一步将体制理顺，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去干活，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了。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倒容易拔苗助长。你看人家发展那么快，自己也要发展那么

快，然后就运用政府的力量，上大项目，结果能好吗？

像高科技，本来靠的是优越的体制而不是政府就能催生出来的一种东西，但我们看到美国的高科技、硅谷，就羡慕得不得了，然后就想通过政府来搞创业投资、发展高科技。其实政府搞创业投资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因为，高科技行业最依赖于个人创业的积极性。如果人们没有创业的自由，或者创业以后缺乏稳定的预期，高科技就不可能发展。

靠政府拔苗助长，发展高科技，最后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劳民伤财。最近《财经》杂志报道，比利时有个I&H公司，号称是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后，股票一度涨到100多美元。比利时的人很骄傲，因为一个小国出个“明星”很了不起。但后来，人们发现这家公司的情况全都是假的。I&H公司的股票现在跌到了每股50多美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政府帮助他们借风险投资，并帮着他们做假来膨胀。

不要再搞什么优惠政策了

赵晓：那么，对于政府出台某些扶植高科技的产业政策，你怎么看呢？

55

张维迎：我不同意给高科技产业优惠政策的做法。高科技依赖于个人创业，同时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要想搞好实在不容易。

如果政府放出风去，说是要制定高科技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家就会把心思用在怎样获取政府的资源，并通过获取政府的资源来打垮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打败对手。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流向某几个企业，短期内这些得到政府扶植的高科技企业可能发展得很快，但一旦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它们就完蛋了。

我的看法是，政府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的政策，而不要去搞什么针对某些企业的优惠政策。政府应该清楚，它对一部分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平，而优惠政策还可能变成腐败的渠道。

我主张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uniform）、普遍性的（universal），对于任何行业都不搞什么优惠政策。如果你这个政策对这个行业是好的，为什么不对所有的行业都一视同仁？如果你这个政策真的有生命力，为什么不向全行业推广？

赵 晓 VS. 张维迎

高科技如果真的有利可图，自然就会有人来搞高科技。政府只要给创业者自由，让创业者有稳定的预期，理性人自然会去选择最好的东西。

我们现在发展高科技，问题并不在优惠政策太少，而是整个经济管制太死了。这种体制不仅不适应高科技，也不适应低科技。只是低科技我们靠别人已有的技术还可以维持，而高科技在向我们转移的时候很慢，使得我们捉襟见肘。

政府真要想发展高科技，就应该从根上解决问题，就应该清楚如果有—个很好的公平竞争的体制，以及有效的产权保护，什么都可以发展起来。

聘请外资顾问 有损市场公平

张维迎：我这里顺便指出一点，为了发展经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聘请外商作顾问的做法是违背公平的。

据报道，北京市聘了 30 个外国大企业的 CEO 或董事长做顾问，这种做法对吗？许多人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不规范的做法。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一旦聘请了这些人，他们就跟政府有了一种特殊关系，就有可能破坏公平竞争的规则。你当然可以说我的目的只是想让他给我提建议，但是其他的企业怎么去监控你？怎么能够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呢？人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容易形成对市场规则的破坏。

我听说除了北京市以外，好多地方现在都在聘请企业经理、特别是跨国公司 500 强的经理当顾问。对这些被聘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至少有利于他们获得优惠条件，但是对市场秩序起的是破坏作用。

赵 晓：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后，导致了“新经济”的出现，放松管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有类似的促进作用？

张维迎：我问过大量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平均 50%~60% 的工作时间都花在对付和应付政府上面，而且这个成本每年都要重复。所有的管制、审批制度解决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增长力量？我原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实现增长率达到 30%，我现在还要更加乐观。

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力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

以往 20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未来 20 年，为了继续发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政府应以维护市场公平为中心，以保护产权为中心，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本文发表于 2000 年，曾引起轰动，
并成为中国垄断行业改革及
放松管制运动的先声。)

“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 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以 WTO 为分水岭，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但是，发展道路的选择仍然至关重要。WTO 为未来的改革与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将顺理成章地自动完成。说到底，中国的前途仍然取决于对现状的认识、对困难与机遇的把握、对前景的辨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宏大问题要从微观话题开始。民营企业正是这样一个深具宏大意义的微观话题。无人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成就，无人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性，但民营企业的确还遭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民营企业大踏步发展的的确亟待环境的改善和各方面条件的更加成熟。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经济中的一大新现象是所谓的民间“状告政府”。福建马尾陈氏兄弟 IP 电话一案曾轰动全国。海南某公司状告证监会并在一审中胜诉曾引起中外关注。近期，上海某民营企业因为银行管理部门不准许办银行一气之下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这样的事例，在 WTO 时代会越来越多。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它是否有可能成



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重要一步呢？樊纲的看法是，民间状告政府是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是WTO时代对内开放的重要环节，将直接带来民营企业运行环境的改善，意味着中国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樊 纲：WTO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法律进一步健全、法治逐渐确立的时代。对于民营企业的的发展，除了一般性的舆论呼吁外，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民营企业状告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合法权益，谋求一视同仁地位的过程。

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仍然面临着一些障碍，下一步民营企业的的发展要靠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互动来实现。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权力不是谁给的，而是利益主体争取来的。现在对于发展民营企业，上上下下已取得共识，并开始有了一个大的政策原则。但怎样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呢？恐怕还需要靠民营企业自己来争取、来奋斗。

有这样一个案例。据网上消息称，上海有个民营企业要办银行，提出申请，银行管理部门不同意，结果被这个民营企业告上法庭：问为什么你让外国人来办银行，却不让我们办银行？并且提出：国家有政策，凡是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都要对民营企业开放，你为什么还不开放？当地法庭把这个案子驳回后，该企业后来又上告到高级人民法院，结果怎样目前还不太清楚，但这个民营企业的做法很有意思，也很有一些代表性。这几年，有过许多民间告政府的例子。比如，去年有律师就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事状告铁道部，虽然案子没有受理，但今年春运的票价调整铁道部搞了价格听证会，不能说没有效果。还有上海人告证监会，说证监会的某个法令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类似的例子，各地都有不少。

怎么来看这些事例？这些事例反映了中国法治体系的逐步形成，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中国政府进步的表现，是整个中国法治体系进步的表现。民间可以告政府，民营企业可以依靠法律的框架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权益，说明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从市场演化的角度看，状告政府实际上是在法律框架内通过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来逐步完善市场的经济体制结构。状告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矛盾比非法手段（剧烈的社会冲突、坑蒙拐骗等等）要好得多，比如民营银行通过正式渠道建立起来总比搞地下高利贷要好。状告政府，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便于各方面把利益说清楚，有利于公正对待。因此，这些事例确实表明：一方面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步到了一定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式也将进入到下一个阶

赵 晚 VS. 美 纲

段：政府政策和民间的要求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互相推动。这可以说是状告政府的意义和性质所在。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许多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包括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都到了一个阶段。我们要意识到，体制的建设不是政府给的，历来都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实际是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磨合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改革也是在各种利益的推动下往前走的。如政府废除各种不必要的审批制度，就是因为审批制度已经危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大家越来越怨声载道。打破垄断就是因为基础部门的垄断价格的提高使得各行各业成本大大提高，垄断已损害到越来越多人的利益。打破垄断就是利益冲突导致的改革和进步。

过去，解决利益冲突采取的是比较隐晦的办法。比如，通过政府内部的渠道，通过一层层的上报、一层层的讨论来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在前一个阶段体制条件下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过程和方法。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至少在过去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有利于避免社会公开讨论可能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等等。但毕竟社会在进步，人们对问题的理解越来越进步，中国的法制结构也越来越完善。逐步把许多事情公开化，进行讨论，把问题摆到法庭上来解决，反而有利于缓和各种社会矛盾。政府告企业、企业告政府、民间告政府、民间告企业等都是为了使讨论、冲突获得合法的解决，使这些推动社会进步的案例能够纳入法制的框架。比如春运票价问题，本来老百姓怨声载道，把事情摆到桌面上反而容易缓解民众的怨气，使问题的难处让公众有更多的了解。

因此，到了一定阶段，就应该从主观上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好让事情解决得更快一点。当然，有时有些问题即使摊开了一时也不容易采取措施去解决，但至少可以让各种怨气、让矛盾、冲突有一个出口。

我想强调的第三点就是，民营企业今后的发展要更多地利用法律框架争取自己的权益。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依靠民营企业实现的，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现在，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各种阻力，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还不能被一视同仁，民营企业得到的事实是“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WTO后，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享有“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都要比民营企业高。很多国企和外企能做的事，民营企业反而不能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某些部门的问题本身会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发
展。比如金融部门，民营企业不准进入，它就缺乏便捷的金融渠道，
它的资金来源就会受到严重限制，民营企业在其他行业的经营和发展
也都会遇到障碍。

大家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这个问题。现在大的原则已经定下来了：凡是外资能够享有的权利，内资、民营企业都能够享有。问题是
如何尽快落实这一原则。民营企业状告政府体现出他们想落实这些原
则，是在针对政府的一些具体措施提出具体要求。对此，政府应该充
分理解和重视民营企业的做法，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让体制更加完
善，让政策更加符合下一阶段的发展要求。

第四点，政府各部门应该如何对待民间呼声。这次人大大会上有代
表指出“民间告政府，政府老不出庭”。我想，这件事应该有明确和
具体的法律规定。比如，在合法框架内法院受理了民间告政府的案
子，政府必须应诉。

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开始，政府如何处理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
的关系的具体问题对我们还是一个新课题。我们现在大的体制已有了
一个大体框架，但在具体问题上还需要通过案例逐步形成模式，通过
基本法律层次加以规定。比如，如何利用已有的《行政诉讼法》来进
一步规范政府、民间、司法部门等各方面的行为，这些都需要通过逐
步的变革，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的积累和实践的发展来加以改善。这
将是中国法制体系改进的重要途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注意，即不要一碰到民告官就一味地指
责政府，因为民间也不是绝对正确的。这就需要社会各界用心平气和
的态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间状告政府这个事情，从而来共同发展
我国法治体制的框架。任何人都应该在这个框架里行事，任何人都要
逐步在这个框架里处理社会矛盾。

“法治”框架实际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一
个主要渠道，是创新制度的制度。在WTO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以及各种利益冲突不是越来越少了，而
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
程中如果有一个框架，并且能够很好地去利用好它，将是一件大好事。对政
府来讲也是如此。政府应该想办法让这个框架能够更好地起作用。所以各方面
要心平气和地看待民间状告政府这事。不是说哪一方特别的落后，特别的不好，特别的不讲法治。状告政府
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鼓吹批判政府，和政府斗争，而是怎样进行
发展建设，帮助政府多一条渠道去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

赵 晓 VS. 樊 纲

在樊纲讲了这么一段长话后。我们进行了如下的对话。从状告政府谈到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变革方式、制度创新方式。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民营企业通过状告政府来表明自己的合法利益确实不是一件小事。它实际上是中国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由此将引发中国社会的对内开放，而对内开放与WTO对外开放潮流相结合，将大大地促使中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中国的民营企业则将在开放社会的洪流中寻找到生存与发展空间。反之，如果没有对内开放，WTO所带来的对外开放的局面就不可能被充分利用，甚至有可能使中国民营企业陷于困境。

赵 晓：我以为民营企业的道路问题非常重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入WTO之后，再过大概5年，外商将全面进入中国的各个产业包括现在尚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诸多垄断领域。到那时即使政策放松，再向民营企业放开也将无济于事。因为市场空间已经被跨国公司占领了，中国民营企业进入的良机已经过去了。所以如何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的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迫切。

我想对你前面所讲的内容特别是通过状告政府来刺激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创新作两点评论。第一点，易刚教授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洋人既生产产品又生产制度，而中国人只生产产品不生产制度？”我曾经用林毅夫教授“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区分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进行的，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民间利益主体在有利可图时作出的制度安排，在美国，这两种形式的制度变迁同时存在，而且美国案例特别容易导致大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出现，所以，美国社会的制度创新总是显得那样生机勃勃、经久不息。相比之下，我们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供给主体单一，制度创新因此而不足。你所谈的“状告政府”，在我看来，如果能够启动并且顺利地往前推，对于中国社会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大量出现肯定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的制度供给由此有可能也进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时期。

第二点，周其仁教授曾经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变迁，论证了中国的公共选择过程以及制度创新是怎样实现的。他有两点重要发现，一是土地承包制度的创新和推广实际上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对话，用你的话来说就是两者间的“互动”。二是中国的许多所谓“中央政策”实际上是“中央合成地方政策”。也就是说地方先有了制度创新，然后在某一次中央会议上，通过好几个省的联合努力变成中

央政策。不过，“中央合成地方政策”仍然局限于行政体制内部，而中国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对话因为缺乏法律的保障，总不是那么顺畅和快捷。而现在，在造就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一个能够确保创新制度的制度框架后，制度创新便有可能依法进行。而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本身又将诱发更多的制度创新，包括一套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制度产生。其结果，中国老百姓今后会更多地去找法律，而不是老是在“找市场”和“找市长”之间进行选择。这的确意味着中国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樊 纲：在成熟的市民社会，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对话通常有一个制度创新的合法渠道，大量的制度创新的出现有赖于完善的创新制度的制度框架，而不仅仅是在官僚体制之间的种种变通。

我们得承认，官僚体制也是反映各方面利益的一个渠道，只不过在市场经济中，这个渠道越来越显得不够公开，不够快，比较缺乏效率。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评论。不过，对于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除了像拿破仑之于欧洲，战后美国之于日本这样的强制性变迁的极端的例子外，可能大部分的制度变迁既包含诱致性变迁的因素，也包含强制性变迁的因素。制度创新都是因为某种利益需要不得不改的结果，所以都具有强制性。反过来，制度之所以会被改革是因为改了之后有人能得到利益，从这点讲它又都是诱致性的。

中国为什么不产生制度？其实中国也产生。但是，产生的是过去的制度，中国的制度是在当时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框架下产生的，后来就显得落后了。美国特别能产生制度，有很多好的制度，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其实有一个好处，也就是我们只要学习就行了。前沿的制度问题都让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它先交了学费，创造出了制度。我们只要学习、只要拿来就行。这可以省去许多制度创新的成本。

赵 晓：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存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也存在制度知识学习上的后发优势。像通过和官司来形成和创新制度，其实是市场经济下的非常普遍同时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只要学习就行了。

樊 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比较优势可能目前主要就是生产产品，即使我们创造了一些新的制度，它们也可能是别的国家已经实现

赵 晓 VS. 樊 纲

过的，而且可能是别人先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改革初期，邓小平等领导人当时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另外也是国内有需求。

中国过去制度创新的真正问题在于，中国的体制缺乏效率和有效性，制度创新所赖以实现的“创新制度的制度”不完善：它是官僚的、封闭的，主要借助于官僚制度来解决问题。

赵 晓：我现在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曾经一度中国的制度也是先进的，并为别人所效仿，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制度创新停止不前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创新制度的制度”不太有利于制度创新呢？

樊 纲：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过去的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不足，制度创新结构是缺乏效率的，逐步封闭的，因此制度创新越来越缺乏，效率越来越低……

赵 晓：且慢！这里，“封闭”是一个很关键的词。请问，你怎么理解封闭？封闭和开放有什么不同？过去我们只能是官治民，现在可以民告官，是不是就是封闭和开放的一个区别？

樊 纲：所谓开放，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社会和这个制度有关的人都能参与，就是全员参与；另一个含义是向所有新观念开放，包括向国外学习，向其他国家借鉴好的东西。过去我们的历史上也有制度的创造，但后来逐渐变得封闭起来。

赵 晓：非常精辟。我现在可以做这样的引申：从对内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是自上而下的，不能全民参与，所以是封闭的。它或许在一定阶段上还有一定的创造性，但逐步就变得没有了创造性。从对外来看，中国社会的演进，在经历了几次民族大融合之后，就再也没有遭受过像样的文明挑战，长期缺乏外来意识和观念的冲击，也变得日益封闭起来。中国社会对内对外日益封闭，制度创新当然就又一天天地萎缩下去了。

樊 纲：是这样。这一封闭的过程，直到鸦片战争被外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才被迫开放。这就是强制性的（imposed）变迁，是靠外力强权实现的。相比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则完全是诱致性的。

中国制度的演进，包括“创新制度的制度”的改进、开放和创

新，就中国整个体制的变革过程来看，总体趋势是由封闭走向开放。这几年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正是受益于开放。先是对外开放，20多年中引进了外国许多观念、思想、方法，包括法律等。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对内开放，包括各方面的制度的对内开放。创新制度的制度也要逐步地、更多地对内开放，使内部形成良性互动，使体制更有效率，更有效果。

赵 晓：我的理解，从早年的贸易到引进外资，再到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渐入佳境。与此同时，对内开放也必须跟上，否则恐怕还是不能完全打破封闭。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状告政府这种办法，事实上是让全民参与到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来，创新制度的制度就变得更加完善了。这样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中国可望进入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

如果只强调对外开放，忽视对内开放一定会产生很大问题。从路径依赖来看，如果对外开放单兵突进，全员参与的对内开放步履蹒跚，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有可能走偏。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得到有可能不是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是拉美的扭曲的市场经济。比如，就扩大内需来看，民营投资过去每年增长约25%以上，现在连10%都不到，并低于国企的增长。长期缺乏对内开放的过程，缺乏对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启动民间资本就会画饼充饥，最终就会演变成国际资本和国有资本共同控制经济的格局。这样的格局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

樊 纲：我昨天刚从大庆回来。大庆外资上市后的利润本质上是资源税。这些完全靠资源产生的利益本来应该国民先拿到，但由于迟迟不发展民营经济，民营资本没有足够的资本规模参与，只好让外资参与。外资可能拿到10%。若进一步私有化，恐怕也不会落到民营企业的头上。这就等于让外国人白拿了中国的资源收益。虽然最近这一轮的增长可能更多还是由外资推动，但如何转向由内资推动是下一步必须重视的问题。有人强调民族的东西，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固守民族的东西。别人才不管你民族不民族的，它有利就来，无利就走。那到时我们怎么办？拉美吃亏就吃在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别人来告诉它该怎么做，而别人却又不了解它的国情。

赵 晓：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般认为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很大的。不过，从外部看，WTO成员以及

赵 晓 VS. 樊 纲

国际资本只要求能照顾到他自己的利益，让它准入，让它和别国公平，剩下的事它并不管。它也不对中国是否搞完全的市场经济负责。你一开始讲的是对的，民营企业的利益要得到平衡和保证，不能靠赐与，而是要通过合法渠道争取。我现在加一句，也不能靠 WTO 自动获得。

樊 纲：实际上，如何使我们自己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体现，如何借助加入 WTO 推动自己的制度改革，这才是我们加入 WTO 的最大好处。仅仅加入 WTO 并不见得是增进自己的利益，反有可能是增进了别人的利益。借助加入 WTO 推动我们自己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比如，从银行角度来讲，将来大银行服务的是大公司、好公司。这些都有可能让国外银行拉走。剩下的坏的大公司则留给国有银行。至于地方的小生意，可能根本没有人做。如果我们现在发展地方民营小银行，外资一时还进不到那里，地方的银行就能得到成长空间。地方小企业也能因此得到发展支持。在未来 5 年时间中，这些小银行逐步成长起来后，就可以做大生意，然后有可能和国外银行抗衡。这 5 年要是再不发展，到时候国有的大银行又死掉了，地方小生意也没做起来，然后国外大银行在中国立足之后立即腾出手来发展它的全国性网络，到各个地方去做小生意，那时候民营银行就再也没有发展的良机了。

66

赵 晓：果真如此。到那时候，所有在前几年鼓动中国加入 WTO 的人，包括你樊纲在内，回过头来，都有可能被骂做历史的罪人。其实呢，并不是因为加入 WTO 的这个主意的错。而是因为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对内开放，没有很好地利用创新制度的创新来发展民营经济。

樊 纲：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做各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对外开放，同时国内要做更多的工作，要通过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促进对内开放，带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否则，加入 WTO 最后的效果就很难预料。现在提这件事，就是希望加入 WTO 能够推动社会各界、推动大家更多地思考这一问题，把这一问题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同樊纲的谈话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谈话中，樊纲中断了所有的电话，并延长了原定的谈话的时间。谈到最后，我们都为所谈的主题不由自主地感到几分沉重，同时也生出无尽的希望。我们衷心地期待，这样一个话题，会有更多的人士所加入，并有民营企业家们参与

到其中的制度创新的历史中来。中国，将在WTO时代，随着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进入五千年来发展最好、文明最昌盛的全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第一次提出“创新制度的制度”及
“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等概念，
并用于民营企业与中国制度
创新分析，可谓别开生
面、饶有启示。)

产权、平等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

在笔者和樊纲教授的谈话中，他提到了“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这一概念，并以状告政府为例进行了探讨。但是，究竟什么是“创新制度的制度”的关键，限于时间当时未及深入讨论。不过，这一遗憾在几天后笔者同茅于轼先生的对话中很好地得到了补偿。茅老师对于“创新制度的制度”的提法很感兴趣，进而从这一概念出发，引出长篇谈话，特别是强调了产权保护和平等规则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创新制度的制度”主旨所在。他还从这一分析框架入手，深入地探讨了民营企业发展及其问题、WTO后中国向文明社会转型等重要话题。让我们先来听茅老师的这段精彩谈话。



茅于轼：“创新制度的制度”这一概念提得很好。的确有一些制度是更重要的制度，是基础性的制度，或者说是母制度。但什么是“创新制度的制度”的内涵呢？

财产权安排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了，其他的制度都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合理的财产权制度安排隐含一个前提：任何人都不能侵

犯其他任何个人的财产权。

再就是平等的制度安排。平等规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够享有特权。否则，有特权的人就有可能去侵犯别人（没有特权的人）的财产权，财产权的保护也就谈不上。

有没有特权、能不能有效地保护产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在这以前有好多制度，在这之后也有好多制度，但人类历史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关键的一点要看人与人是不是平等的，产权是不是得到保护的。

从理论上说，平等的含义中其实已经包括产权的平等，也就是财产权的不容侵犯。一个人财产权不受侵犯，从别人来说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我们常说保护私有财产，换种说法就是不能侵犯私有财产。

谁能侵犯别人的财产？当然是有特权的人能够侵犯没有特权人的财产。当任何时候有特权的人也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时，这个社会就平等了。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不能通过掠夺、欺骗、强制手段获取他人劳动果实，而只能通过分工、合作和创新获得财富的文明社会。

财产权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人类历史上至少经历了好几百万年才慢慢确立起来。这个变化使得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市场经济以前可以侵犯别人财产权的充满剥削和被剥削的阶段；一个是市场经济有了财产权，取消了特权、不再有剥削关系，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发展的阶段。由此带来的深刻意义就是由于平等进一步带来许多新的关系，社会博弈的规则变得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以前在人与人不平等的时候，每个人想出人头地，必须想方设法得到特权。但是特权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这使得争夺特权的斗争非常激烈。大家争做皇帝，做了皇帝后还不安心，还害怕别人把他暗算了，就不得不整人，整掉这个不够，还要整掉那个，最后剩下孤家寡人。

这些你死我活的事，许多中国人曾经亲身经历过。大家亲眼目睹了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地不平等，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地沦落为争夺特权的撕咬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幕戏：尔虞我诈、残酷无情、全无诚信。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才是文明的阶段：人跟人是平等博弈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它的主调是合作、创新（当然还会有各种争夺，但规则不同），这使得人类的财富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起来。我们目前经历的便是这样一段正在变革的历史。

赵 晓 VS. 茅于轼

从产权保护和平等规则来讲，私有经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经济成分。只有在良好的产权保护和平等规则的基础上，私有经济才能够得良好的发展。

中国的情况人人清楚，在改革开始之前，私有产权基本上是不受保护的。那时候，生产资料也好，生活资料也好，都不受保障。政府强调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小资小农因素都要消灭干净。当权者的思维，是以为这些因素消灭干净后就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了，骨子里可能也是一种“平等”理想的体现。这种平等当然是一种很肤浅的平等意识，是根本做不到的东西。我们知道，社会生活包含生产和消费。生产和消费由什么人来组织呢？在计划经济时期只能由特权者来组织。所以在那个年代，有两类人：一类是计划的实施者、监督者；另一类是计划的执行者。整个社会便由前一种人控制着后一种人，经济也由前一类人控制运行，这是计划经济中的一大特色。在计划经济的特权中，还有大中小特权之分。官僚的特权不用说，工人也有特权（他有做工的特权），农民也有特权（他有块地，别人不能有）。所以，计划经济时期整天空谈平等，其实是最不平等的社会。

要打破计划时期所有这些特权非常困难。怎么办？中国人想出了搞双轨制的办法，就是计划经济这一块不太去动它。能改就改，改不动先放在那里，另外催生出新的一块——市场轨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其实是双轨制，它的好处在于使帕累托改进成为可能。因为在双轨制下，谁的利益也不侵犯，但另外有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后却可以抓住。

由于搞了双轨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越来越大，私人经济也越来越得到发展。我们现在想一想，国有企业改革到底有多大实质进展？没有。国有企业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半死不活的——不能说没有例外，但总的形势是这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呢？嚷嚷着改革好多年了，能不能真改成，我看也够呛。至于政府改革就更难了。政府只能是一个，它是不能搞双轨制，不能另搞一套的。那你说怎么改？

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以及政府改革等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民营经济这一块成长起来了。中国经济增长其实靠的就是民营经济。7%的GDP增长如果没有民营经济，我看连1%都达不到。因为民营和国营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现在谈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一般人都会讲到融资的困难。不过，这句话可能得打一点折扣。在我看来，它主要不是创办资金的问题。你看现在已占中国经济大半天的民营经济，从投资到发展基本上

没花过国家的钱。那么它发展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筹的，或者想办法筹来的。不是 100% 也是 90%。谁说中国老百姓的本事不大？他能创造出奇迹来。

民营经济发到今天的地步，看以后 20 年会怎样？现在民营经济越来越大，投资能力已经很大了，创办资金的问题已经过去，但是扩张所需的资金融通问题显露出。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企业都有投入的时候，有产出的时候，在投入的时候，企业要找工人、买原料、扩厂房，所以就要花很多的钱，而在把产品生产出来后卖出去，就有很多的钱进账。由于有投入期和产出期，企业的钱必然是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正（现金流）一会儿负的（现金流）。企业资金变动的这一特点要求企业必须有很好的融资环境。现在的问题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借给企业的流动资本，民营企业连 5% 都拿不到，几乎全都贷给了国有企业。这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完成整个中国经济一大半的生产任务，使用的国家流动资本却不到 5%。这显然非常不成比例！但也是个谜：民营企业究竟是如何只用 5% 的流动资本生产出一大半的产值来的呢？我没有仔细调查过，但猜想这里面一定有渠道、有窍门。其中一项，估计是国有企业从国家银行贷到钱后又转手贷给了民营企业。

最近二十多年这么大的变化，民营企业的发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我在哈佛的时候，听过科尔内的课《计划经济的转变》。里面讲，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民营企业的比例。现在民企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个比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比例。

去年我为亚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得到一系列的结果。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结果就是我用 30 个省市的人均 GDP 和民营企业雇佣人数占总雇佣人数的百分比做回归分析。结果，30 个点值除北京外，都非常好地排列在趋势线的两边，回归系数达到零点九几。这说明民营经济比重大和人均财富高度相关。回归结果还表明，民企职工人数增加 1%，全省的人均收入可以增加 1640 元。亚行的人问，1% 的民企怎么能为全省每人都生产出一千多块钱？这可能吗？我的解释是民企的发展，它雇工人数比例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比如政府服务的信息、市场环境的信息、信息来源的难易以及交易费用的信息等等。一个人投资新办一家企业，首先就要做可行性分析，这里面包含的信息是非常多的。所以从信息观点来看，民营企业的雇工比例是一个信息指标，而不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干活这么简单，不是那个意义，它是显示商业环境的一个信息指标。

赵晓 VS. 茅于轼

西部跟东部比起来很落后，主要原因就是投资环境的差异。可以举好多例子。比如超级公路收费，西部省会超级公路对政府首脑的车都不收费，东部，比如北京，除军车外都是要交费的。这就是说，西部的政府自己在破坏市场规则。另一个例子可以看政府官员的名片我看东部省市政府官员的名片上，通讯方式大都一应俱全、有电话、传真、EMAIL，有的还有网址；而西部地区官员的名片上，往往只有一个办公室电话，一些很重要的官员甚至连传真号都没有。这些都是以显示东西部官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太相同，他们所在的市场环境当然也不同。

北京市民企雇工比例低但人均收入高。这和一般情况不同。我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央政府不喜欢太多的私营经济，控制较严，所以民企雇佣人数比重低；但北京人均收入高，是因为外国人的花费高，以及政府的花费高。

这项研究的结果有非常寻常的意义。外省市经常问我怎样才能把经济搞上去。我说，很简单，发展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达了，经济就上去了。

我们目前的市场环境也是民营企业塑造出来的，而不是国有企业塑造出来的。所以我说民营企业的贡献很大。我们不能光看它直接的贡献，还要看它间接的贡献。

入世后，我们的政策对外国人算是公平了，但对中国民营企业到现在还不公平。以银行为例。外国银行都已经在国内开业了，人民币业务也开始了，但还是不允许中国人私人办银行，怪不得急得上海人要打官司。大错特错！还有其他行业，比如保险，外国人都进来了，中国自己的人都不让搞。真是笑话！

要是允许私人办保险公司的话，我首先要去办一家保险。准赚！前儿天我写了个东西，民航暴利。民航人身保险一年收入在 16 个亿，赔付顶多 4 千万。我是这样算的，假如每个人都买航空保险的话，一年 8000 万的旅客，20 元一张的票，保险公司的年收入就是 16 个亿。每年飞机失事摔死多少人呢？算 200 吧，总共赔付 4000 万。16 亿赔 4000 万，你说能赚多少？就算成本全算上，至少能赚 700%。保监会说保险公司没有暴利。谁信？我看外国保险业如果做民航保险，中国民航保险马上就要垮掉。

我说民营经济好，但遭受到不公平待遇，不等于说民营企业自身没有问题。全面地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自身也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信用差。第一大表现是假冒伪劣。很多假冒伪劣都是民营企业干的，而不是国企干的。第二大表现是作假账，这将制约民

营企业做大。理由很简单，民营企业作假账的话，它的融资会很困难。因为人家投资，一定要看财务状况，看你现在有多少钱，他进来能占百分之多少。

就算不投资，做大的买卖，人家也要看你的财务记录，看你的营业额是多少？结果你的账是假的，别人当然不干。再一个表现就是拖欠很厉害。国企当初闹国企三角债，后来是民企跟着来。

这些问题的形成有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方面的原因。有些毛病根子出在政府身上。比如企业作假账，有时就是被逼的。我是天则所的，我知道交税中存在各种问题，对民营企业非常的不合理。对此，我跟国家税务总局谈过多次，他们起初根本不承认这是个错误。现在三四四年过去了，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个错误，也准备改，但还没真改。

我略举几个例子。先说企业所得税问题。税务部门规定，每月工资超过多少便不能计入成本。好比说，月工资超过1000元的部分便不能记入成本，只能算利润，并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一条就不合理，它限制了企业发工资。最不合理的是，对于外资企业没有这个限制。外企想开多少工资就是多少，都可以打入成本。这太不公平了！

再比如，按规定，企业上年的亏损可以在下年利润中弥补。但税务部门同时又规定：每个季度预扣所得税。这个办法简直是糟糕透顶。我写了篇文章叫《怎么把企业搞死》，把它归入把企业搞死的办法！本来，企业到年底都要看上年是否亏损，有亏损的话可以抵扣不交。现在呢，每到季末，税务局才不管你去年是赔是赚呢，先让你把所得税交了再说。这样做可把企业害苦了！因为企业的周转资金都没了。幸亏是每季交，如果天天都要预交，把企业每天的流动资金都拿走的话，企业哪里还会有什么钱来发展？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是什么，不是想把企业搞死的政策是什么？

按理说，在预交所得税后，如果企业这一年是亏的，到年底结算就应该退还原来预交的部分，但是税务部门吞进去的钱哪肯轻易吐出来。他会想方设法抵赖，不给你退，或者折腾你花巨资搞审计。总而言之，不把企业搞死不算完。

对于国企就好多了。举一个例子是打官司，对于国企和民营企业就大不一样。举其中的官司输了之后，它的职工宿舍要腾出来拍卖，里面的职工都得搬走。但你听说有哪个国企破产后职工被迫搬宿舍的？不打起来才怪。国企欠税有的是，照样是大模大样地欠。但你民企欠税试试看？对不起，手铐给你戴上。

所以，民企遭受的不平等是多方面的，有税务方面的不平等，司

法方面的不平等，等等。民营企业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将来值得在中国史书上大书一笔。

回到前面的话题，继续谈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民营企业内部的劳资纠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大的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仍然习惯用一种封建的、人跟人不平等的观念对待员工。他的这种恶劣的做法常常不容易得到及时的惩罚，因为他有钱就可以摆平政府。从这一点，我总是强调说：“不可以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能让有势的人弄钱。”不过，这是个理想，很难实现。就是美国也难于做到，美国的有钱人还是有势，它所不同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不好，全国上下都注意这件事。太出格的人就行不通。现在中国有钱人都很有势，政府帮大款。到头来，这会把政府害了，把企业害了，把老百姓也害了。需要全社会特别警惕！

民营企业的管理也不太行。民营企业家普遍管理水平低，其中有自身素质的问题，经验的问题，眼界的问题，总之各种各样的问题，非常复杂。民营企业现在都盼望有一个好的管理者，但眼下经理市场在中国可以说还没有。不像美国，经理市场很成熟，赚 20 万的还是赚 40 万的，管 50 人的还是管 1000 人的，分得很清楚。民营企业对MBA 的需求非常高。可惜的是，中国的MBA 学生很缺乏道德训练。本来，MBA 作为职业经理人，头一条就得忠于企业，没有这个品质，谁还敢用你一个外人？但现在不忠于企业的人比比皆是。民营企业最后都害怕了，觉得还是自己人才可靠，因此家族治理的非常多。有一个调查，民营企业主要的决策都是由老板或他的家人做的，拿到正规董事会讨论的还不到 5%。这样的治理结构，管理上当然容易出现偏差。

从发展前景看，中国民营经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国企按产值占 30% 多。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最高的也就 12%—13%。中国民企至少可以从 70% 发展到 90%，这中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民营企业长远发展要靠产权和平等规则的建立。政府对保护私有产权这么谨慎、保留，我猜想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从观念上认为保护私有财产对有钱人有利，而共产党是穷人党，不能为有钱人服务。这个看法很有代表性，其实非常错误。有钱人相对穷人来讲，往往也是有势的人，他的财产一般能够得到多一点的保护。最需要保护的其实是无钱无势的人，农民、打工仔、打工妹等等。中国农民长期被各种乱收费所困扰，本质上是财产所有权得不到好的保障，而打工仔打工妹们呢，有时辛辛苦苦一年连工钱都拿不到，同样是财产所有权受到了侵害。我对“减少农民负担”的说法不太理解。这句话隐含的意

思是农民的负担可以减少也可以加重，都在一些人的手里握着。其实，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应该讲清楚的是什么是政府该拿的，什么是政府不该拿的，决不能随便增加负担。对保护私人产权有疑惑，还有一个原因是和有人对“共产党”这三个字的理解有关系。过去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现在有人把保护私人产权和共产党相对立起来，都很荒唐。“共产党”是从“community”翻译过来的，community的本意根本没有“共产”的意思，它是“公社”、“社区”的意思，是指一个小小的政府，一个社会群体，每个人都能享受公平参与、公平分配以及公平的政治权利。世界上有民主党、自由党，都挺好听的。“共产党”如果被理解成我能瓜分你的财产你才能入我的党，那不荒唐了吗？

不过，总的来看我现在对中国有前景越来越乐观。这些年中国的成就和变化都相当大。过去不能谈或者不容涉及的很多深层次问题，现在人们谈得越来越多，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开明。比如，我们的国家领导同志近期表态说“我不能干涉司法”。那太好了！连国家领导同志都不能干涉司法，谁还可以干涉司法呢？司法就应该可以独立了嘛！这句话以前没有听到过，现在能够听到了。

赵晓：茅老师，您谈的非常好。您对于产权与平等的规则，我想可以作为今后我们讨论WTO后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您对民营企业谈得很全面，既谈到了它赖以发展的基础，也谈到了它所遭受的不公平的情况，还谈到了民营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对于WTO后的民营企业发展很有意义。

我想就您的谈话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做些评论。

您的谈话中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就是产权是否得到尊重和保护是区分文明与否的标志。您的看法，在文明社会之前，财产的所有权是不受保护的。在那样的特权时代，大家竞相追逐特权，因为有了特权，就可以随意地蹂躏产权。我想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关于这一点，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给予翔实的证明，譬如，西班牙曾经出现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王权蹂躏产权的历史。在诺斯看来，政府就像黑社会一样。后来，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把侵犯产权的传统带到了拉丁美洲，结果拉丁美洲长期陷于泥潭。

人们竞相追逐特权，实际上关注的只是分配。而保护产权，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也就是通过促进生产，在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让有些人受益。在产权得到良好保护的情况下，财富将不再

赵 晓 VS. 茅于轼

是分配的一种结果，而是把饼做大的结果。这样，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前提下，整个社会福利日益增长，最穷苦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

我以为这一点实际上揭示了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斯密所称的国民财富的性质所在。诺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西方世界的兴起意味着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进步，而在于最早地确立了人类社会的产权保护。像荷兰，因为率先对产权保护，才有了技术进步，才能在欧洲暴发黑死病的时候，不仅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反而出现了人口的净增长。西方的兴起其实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由于产权得到了保护，文明演进和福利增长的情况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大家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

这一点的确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揭示出WTO后中国改革的要旨所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这20多年取得的，其中如你所说民营经济的进步至关重要。但是，保护私人产权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制度，还没有在制度变革中完全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只是允许私人产权的存在，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但维护产权和平等的制度还远非完善，还存在着你提到的不平等的情况，侵犯产权的情况。因此，文明的制度框架尚有待在WTO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

茅于轼：我同意你的讨论。对于产权和平等规则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做一下最新的国际比较。印度与菲律宾都号称民主国家，当然印度的计划色彩重一些，菲律宾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发展都不如意。这两个国家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在印度，种姓制度源远流长，人跟人不平等是根深蒂固的，是天生的不平等。菲律宾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则是财产不平等造成权利的不平等。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曾有一段时间生活在菲律宾，他很有感受，说菲律宾是“国穷民富”，政府太弱了，社会天天动荡不定。举个例子，马尼拉的地铁修那么多年也没修起来，就是因为政府近乎瘫痪。在菲律宾，一方面是有钱人飞扬跋扈、缺乏约束，另一方面是穷人作出过激反应，老是绑架富人。所以菲律宾那个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障碍。

从国际比较就可以看出财产和平等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所有的穷国可以说在产权方面都有障碍和隐患，产权问题愈严重的国家愈穷。相信人们只要进行国际和历史的比较，无论是从横的、纵的方面比较，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产权和平等规则的重要性。

赵 晓：在您刚才提到的印度与菲律宾的情形中，产权都没有得到很

好的保护。印度虽然号称民主国家，其实只在表面上有政治平等，在产权保护方面是不平等的、在人们的发展机会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张五常提到的“制度化腐败”，办任何事都必须交“租金”，是“租金面前人人平等”。这说明印度徒有形式上的平等，但不具有真正实质性的平等。

至于菲律宾，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公共权力太弱，不具权威，没有能力保护产权。这使我想到周其仁教授曾经总结的“跛脚悖论”或者说“产权悖论”：一方面产权需要公共权力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公共权力可能侵害产权。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在传统社会，在中国转轨时期，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公共权力过大过强，得不到规范，所以出现了政府随意干预经济，对产权掠夺和蹂躏的情况。但在菲律宾，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极端：因为公共权力过于弱小产权同样得不到保护。

我以为要跳出这个怪圈，就需要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关键的一点，产权保护固然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但这种权力需要建立在平等的法律依据上，而不能演化成不受平等原则约束的“利维坦”。我们过去喜欢讨论究竟是要一个大政府还是要一个小政府，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是建立在人人平等、消除特权的基础上，如果政府如同世界银行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能够保护产权、行使宏观调控、维护市场运行规则的“有效的政府”，大政府和小政府都不是问题所在。

这样来看，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不难体会到，产权保护和平等状况如果不能达到一定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无法实现起飞和发展。过去刘易斯等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原因时，提出过“贫穷是贫穷的原因”，即认为储蓄达不到是一国发展的最大的障碍。现在来看，更深刻的原因其实是产权和平等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技术创新也不可能解决，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技术创新的激励。就算是有了储蓄，在开放经济下也会用脚投票。所以，“贫穷是贫穷的原因”只是一个表面的解释，而没有找到问题的根子。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或许是因为它的政府过强，或许因为它的政府过弱，中间则必然是产权平等的管道被堵塞了。

茅于轼：是这样的。从横断面看，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有大有小，这不是问题所在；从纵断面看，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产权保护和平等状况。如果产权保护和平等状况不能与时俱进，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不前。

赵 晓 VS. 茅于轼

赵 晓：对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茅老师很乐观，我也很乐观。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年，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视保护产权，看到了民营经济的成分越来越高，还看到了民营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来看，这些年也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比如劳动力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我以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的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我看来，劳动力的流动意味着大家在职业选择从而发展机会上变得更加平等，而这一点正是对产权的保护，因为人力资本的产权就是产权的题中之义，甚至具有更为重要的含义。我个人一向认为，邓小平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给了中国人以选择的自由，从而让中国人逐渐走向平等。有句顺口溜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做个体户”。我想，只有给了中国人充分流动和选择的自由，人才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人的创造性才能充分“涌流”，社会财富也才能充分“涌流”出来。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真正动力何在？难道不是在人的平等和产权的保护上？

茅于轼：是啊，过去只有一个老板，现在不行了可以换老板，实在不行了还可以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呢！

赵 晓：不过，更完善的产权和平等规则的确立需要从显性的法律层面进行，需要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现在的情况，如你所说，在我们的法律、税收、投资、市场准入等方面都还对民营企业存在许多歧视。这样，就还存在一种危险：历史会倒回去。当然，这种可能性实际上非常小，但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并非不重要。创新制度的核心规则当然就是平等与产权的规则。

茅于轼：我想再次强调一下，保护平等和产权对穷苦人最有利。穷人的财产得到保护，他就有可能变成中产阶级的一分子，或者成为富人，因为道路是开通的。过去的历史都是穷人的财产得不到保护，最后只好造反，激烈地侵犯富人的财产，甚至剥夺其生命。但结果并不理想，通过“打土豪，分田土”建立起新的秩序，富人的财产权固然是完了，穷人却也没有得到富人的财产。从中国封建历史看，什么时候有过穷人的财产权？

所以，不改变文明的规则，只是改朝换代，结果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中国今后只有跳出侵犯所有权的革命方式，确立所有权的保护方式，穷人才有希望变成中产阶级。尊重每一个人的财产

权，也就是尊重穷人变富的梦想。

赵 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有到了这样的地步，中国的改革那放才算是真正到位了，一个新的国民财富增长与分配的文明时代才算真正到来。而在这之前，在转轨时期，问题还是会有许多，甚至有扭曲。比如，富人想办法保护自己的产权，怎么办呢？他会通过把自己利润的一部分转换成特权来保护自己的产权。现在不少私企老板就是这样，摇身一变戴上一顶红帽子。他本人其实不见得对从政有多大兴趣，他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政治上的“红帽子”来保护自己。可是，如果产权保护制度能让他很放心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在政治上投资，而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于创造利润。

我还有-一种担心，如果平等与产权保护的制度没有确立和完善，有钱人在政治投资成功后，也就是说变得有权有势后，是很容易做坏事的。试想，当做坏事的好处大大高于生产得来的利润，谁不愿意去辛辛苦苦从事生产，干嘛不做坏事呢？赖昌星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到头来，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将越来越丧失平等权利，因为他们需要从有钱有势的人中虎口夺食，这有多难！这样穷人难免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社会稳定这一发展的起码前提就会受到威胁。

茅于轼：我们现在的状况，的确还不能高枕无忧地说已经告别了野蛮时代，完全走向了新的文明状态。

赵 晓：过去我们说中国长期处于超稳定结构之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但在产权与平等的新规则下，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老板，成为富人或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虽然结果不会是平等的，但机会均等。在这种规则下，中国人将追求经济增长、生产和效率，而不再是竞相追逐特权、追逐不平等。中国社会就有可能告别几千年的结构与状态，真正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常态。

茅于轼：我一直以为，社会科学的普及要比自然科学的普及还要难，但非常重要。这些道理其实不复杂，但要让每一个人懂非常不容易。津巴布韦到现在还不懂这套规则，还是以侵犯白人的土地财产所有权来维持政权，结果一塌糊涂。所以这套规则的确是非常重要。全世界老百姓也好，政治家也好，都应该懂得它的真谛。

赵 晓：这使我想到过去我和朋友们爱说的一句话：中国目前最需要

赵 晓 VS. 茅于轼

的不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人们对经济学常识的起码的理解和尊重。

茅于轼：前沿理论就学术发展来说还是需要的。但解决当前问题，需要非常透彻地理解经济学和历史的发展。

赵 晓：我们讨论的这些内容和中国WTO时代发展战略选择这个大题目的一个重要关系是，我们已经尊重了国际资本的产权，给了它们与国内企业平等竞争的权利，我们还需要尊重民营资本的产权；我们给了外国资本国民待遇，还应该将同样的待遇给民营企业。唯其如此，产权与平等的规则才能确立。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把所有这些权利施之以最普通的工人、农民、施之以社会的弱势群体。我的看法就是，我们只有将WTO产权与平等的原则向为延伸，完成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型，一个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新的制度框架，一个真正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可能在21世纪的中国最终得到确立。而这，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茅于轼：我很相信这种前景会成为现实。我注意到，这两年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对特权——比如对垄断、对限制进入、对外国人限制的反对呼声越来越强。特权已经变成了中国人都反对的东西，这是个好现象。

赵 晓：这说明特权在合法性上已经破产，接下来无非是靠改革开放来逐渐消除它。

茅于轼：还需要谈一点的是，在平等规则和产权保护最终建立之前，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该怎么办呢？诺斯最近在北大的演讲中，强调了政府制度的灵活性。他指出，经济发展需要保护产权、自由和平等，但中国的改革从表面上看还没有能够实现依法治国、平等之类的内容在法律上也尚未有效地确立，可是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有灵活性，在实际操作上吸取了这些东西。

我很同意诺斯。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它的成功就在于灵活性。从这点上，中国改革20多年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要领导这个进程是很不容易的，从中体现出了不起的智慧。入世后，我们需要更具灵活的政府以及灵活的老百姓。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文化，产权和平等的普适规则需要结合

各国的文化土壤才能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所以，在中国如何尊重产权，需要认真的探索。但是，产权制度不可以灵活，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平等和自由只能朝前走，不能向后退。对于WTO后的矛盾，我们寄希望于灵活的政府和灵活的老百姓的配合与互动。

赵 晓：我以为，如果政府是有弹性，有灵活性的，它就意味着公共权力和产权之间的某种比较缓和而不是紧张，比较和谐而不是失衡的关系，否则就会出现诺斯说的公共权力对于产权的蹂躏，或者菲律宾式的保护不足。在大多数时候，政府强权可能侵犯产权，但政府权力过弱同样不利现代化的转型，所以灵活性和适度弹性是在公共权力和产权间建立一个缓冲，让它保护产权却不敢侵犯它。如何实现产权和公共权力的和谐均衡状态，无疑是中国加入WTO后一个很大的课题。

(本文写于2001年入世之后，所探讨问题已涉及中华文明长盛之根本问题。)

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的话题，正成为政府与百姓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农民收入如何提高，税费改革前景如何，入世后中国农业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城市（镇）化究竟应该如何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景如何等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正撞击着山坳上的中国。

中国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农民问题，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依旧是农业问题。

“在全社会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相当数量农民的收入绝对值在减少这样一个事实，这才是当前农民收入问题的严峻性之所在。”

“引起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和一部分农民收入绝对值减少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个人认为，基本原因是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销售困难。”

“如不摆脱一个低迷的、不景气的经济周期，尽快进入一个稳定的快速增长周期，农产品市场在短期内是很难完全好转的。”

“如果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很简单，粮食少了价格就升，农民就会多种粮；粮食多了价格就跌，农民就会少种粮。这样的判断完全符合经济逻辑，但对于农民来说受不了。”

“任何队伍在执行政策时都可能会有质量问题，都可能出现钻空子的现象，但这种普遍的、大面积的钻空子、不执行政策的

现象，是与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有关系的。”

“我认为把粮食安全问题抽象到‘有和无’的层面意义不大，因为天底下从来就不曾出过没有粮食的现象，从来都是粮食‘多和少’的问题。”

“我认为粮食安全问题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是永恒的，绝对不能说是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农村税费问题根本不是多收点少收点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设计对不对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解决农民负担不是减多少费的问题，而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

“所以，农民税收之外的负担重，大头在于教育。”

“农村教育这个最大的开支主要让最贫困的农民承担，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农 民 问 题

83

赵 晓：中国经济学家们近年来日益关注农民收入。这是因为农民收入影响到全社会消费。党中央、国务院则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你以前曾提出，农民增收是“九五”留给“十五”的最大课题。请问农民收入究竟有什么问题？

陈锡文：农民收入问题从“九五”后期尤其是1998、1999年以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很突出的现象是农民收入增幅在“九五”期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情形。1996年（“九五”第一年）农民收入增幅为9%，相当不错，但到了“九五”最后一年也就是2000年，掉到了2.1%，就相当得低了！

更严峻的问题还是一般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而是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绝对额减少。1998年到2000年连续三年农民人均销售农产品的收入都在减少。这一方面说明农业作为一个重

赵 晓 VS. 陈锡文

要产业提供的收益在减少，从而有可能影响农民的投入、影响农业的后劲；另外由于农民的收入结构不一样，所以虽然全国平均的农民收入还在增长，但主要只是以非农产业为主业的农民收入还在增加，而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民收入的绝对值却在减少。因此，在全社会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相当数量农民的收入绝对值在减少这样一个事实，这才是当前农民收入问题的严峻性之所在。

赵 晓：那么，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的原因是什么？

陈锡文：引起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和一部分农民收入绝对值减少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个人认为，基本原因是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销售困难。这是由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所以改变或者调节供求关系非常重要。

政府从1998年实施的扩大内需的方针，采取了很多刺激消费者扩大消费的措施。但是从居民的最终消费来看，住宅、汽车、教育、旅游等新兴消费项目增长很快，而与农民收入直接相关的食品的销售并没有成比例地增长。这里有人们生理上的原因，也有消费习惯上的原因，总的看，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对于扩大农产品的需求并不明显。

因此，我们需要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做些分析。一方面，当前整个经济正处于相对缓慢的增长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都面临比较严峻的局面。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行业，比如IT业、金融证券、保险业，但大多数行业的经营形势都比较严峻，导致多数就业者的收入增长比较困难、支出更为谨慎。另一方面，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消费也正处在升级的阶段，生活费开支中的恩格尔系数快速降低，新增收入用于食品的开支明显减少。应该说，这两方面的情况对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都很不利。

大家都看到，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农产品，大多数工业品也都存在。进一步地看，这种现象也不仅存在于中国，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全球。

这说明农产品市场不旺、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的新困难，是与整个经济周期有直接联系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如不摆脱一个低迷的、不景气的经济周期，尽快进入一个稳定的快速增长周期，农产品市场在短期内是很难完全好转的。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农民就业太不充分。中国只有不到20亿亩的耕地，却有8亿多农业人口，靠这点土地是难

以使那么多人致富的。因此，在现阶段，除了农村自身的结构调整、提高质量、提高效率之外，更突出的问题就是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否则没有办法开辟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道路。当前为了促进农民增收，采取一些相关政策，比如税费改革等，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伴随一个大的政策——加快城镇化进程，那么农民的收入不仅在短期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快速增长。

一方面要看到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的形势是很严峻的，8亿多农民收入上不去对国内市场影响很大。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那种认为采取一两项具体政策就可以解决农民增收的简单想法，要把农民增收问题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去考虑。

赵 晓：很多人存在这样一个疑问，既然粮食产量是增长的，政府又实行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为什么农民从农业中的收入不增反降呢？

陈锡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很简单，粮食少了价格就升，农民就会多种粮；粮食多了价格就跌，农民就会少种粮。这样的判断完全符合经济逻辑，但对于农民来说受不了。中国的古话是“粮贱伤农”，粮食多了会伤害农民。也就是说，虽然听任周期变化符合经济学逻辑，但对农民来说就那么点家底，他经受不起这样的折腾。因此在客观上、从具体的国情国力出发，用各种办法扶持农民、补贴农民，就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

我想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所做所为正是为了避免“粮贱伤农”，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才采取了保护价的办法。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旦保护价高于市场价就会诱导农民多种粮，而粮食越多，市场价就越难回升。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如果不保护，市场的风险就都扔给了农民；但政府一保护，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信号，使农民盲目生产。这确实是很困难的抉择。

我个人觉得在粮食价格上保护农民是必要的。我们现在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为了比较平稳地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一些过渡性举措确有必要。我们要从整个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和客观要求出发，而不能过于简单地认为某个具体政策是市场举措或是计划举措。

对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它有点像在粮食期货中做“多头”。敞开收购就好比是做“多头”，即全部吃进。就国家的财力而言，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做期货的人都知道，就每一次具体的交易而言，很难说到底做“多”对还是做“空”

赵晓 VS. 陈锡文

才对，做“多”可能赢也可能输，做“空”也是如此。胜负取决于你对形势的判断，也取决于你的实力和手段。从形势判断而言，以保护价避免谷贱伤农，这是必要的；就国家的实力而言，保护价的补贴，财政也是支付得起的。但是操作的手段有问题。我已经下决心做“多头”了，而且也有实力做“多”，可是我是老板，我不直接操盘，我要下指令让操盘手去做。这时候，操盘手听不听我的指令就成为成败的关键。如果老板的指令操盘手是倒着做的，就算老板有再多的钱也会被搞得倾家荡产。粮食保护价收购三年来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政府下定决心：我做“多头”，到最后我掌握全部粮源。而粮食总是有需求的，不管谁来买，我再顺价销售就是了。这个思路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但问题就在于绝大多数地区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并没有真正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这就引发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思路在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漏洞：我的操盘手不仅没按我的指令全部吃进，反而按比我低的价格自己在那里买进、卖出，那就等于把老板要了。按保护价购进的粮食都堆在仓库里，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同时却大量地以低于保护价的价格在那里购进、销出，致使库里的粮食根本无法顺价销售。过去三年，不少地方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际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这导致两个很坏的结果。一是原来的政策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运转得起来的，实际上由于操作中有大漏洞转不动了、再转就转成了无底洞，所以它使得原来的政策设想落了空。二是政府对农民以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承诺在实际收购部门没有真正得到执行，所以“粮贱伤农”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最终是造成了两极“伤害”：一是，政府付出很大代价保护农民，钱却没有到达农民的手里；二是，既然政府出了粮食收购的最高价，农民就认为还有需求，就还去生产，所以在已经出现供过于求局面后粮食的供给没有及时调减，造成了库存过多，市价难以回升，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

现在有人批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从理论的角度看有道理，不过政府需要考虑的事情显然不可以像理论那样抽象。从经济学角度批评这个政策，基本点是认为应当由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力量来解决供求平衡问题，这从大的方向讲当然是对的。在供过于求的背景下，完全由市场作用去自然地恢复均衡，等于将市场风险全部交由农民承担，不管农民的损失，粮食多了就让其跌价。这或许可以较快地恢复供求均衡，但是，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受到什么样的损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同样需要做点判断。

在粮食问题上古今中外都不是只有市场在起作用，哪怕在当今的

美国也是如此。1998年春，美国市场粮价低迷，克林顿政府曾入市购买200万吨小麦支援非洲，实质就是采取非市场的手段调节粮食供求和价格。人们还知道罗斯福时代政府甚至购买牛奶和小麦倒进海里，可以说是用非市场手段调节的经典案例。所以不能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干预。现在回过头来评价一项过去制定的政策当然很简单，因为结果摆在那里，困难在于往前走的每一步，到底是该往西一点还是往东一点，步子该迈多大？这就不像回过头来做评价那么清晰明了。

我同意总体来看粮价政策没有完全实现其目标的评价。但我认为没有实现的最基本原因，除了在理论上可以继续争论到底到底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外，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么大的一个政策没有一支可靠的队伍去执行。这是政策目标没有实现的基本原因，涉及很复杂的社会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不是简单地用某一种理论原理就可以解释清楚的，还必须同中国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体制现状结合起来一起考虑。但无论如何，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由于实行了保护价措施，使得市场上粮价没有跌到不可想像的程度，保护价多少起了一点托底的作用。因此一方面要看到政府付了很大的代价，而实惠没有都为农民所得，这里有很大的漏洞，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农民还多少得了一些好处。

赵晓：出台一项政策除考虑政策意图本身，它的操作性、实施队伍实施的可能性要不要同时考虑？有的经济学家分析，粮价政策只能达到一个目标：保护农民就要由政府掏钱，政府不掏钱钱就保护不了农民。政府既想保护农民又不想掏钱万无可能。真的是这样吗？

87

陈锡文：1998年粮改政策设计的核心，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和顺价销售。按保护农民的价格收购粮食，然后再顺价销售，也就是说在保护农民的同时财政上不增加对价格补贴的开支（可以补贴企业超储的费用），这在一定意义上政府相当于起一个保护农民的中介作用。因为真实现了这个目标，保护价与市价之间的价差就不是政府出，而是谁消费粮食谁出。

队伍的工作质量问题显然与政策设计不无关系。对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来说，政策设定这头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那头要顺价销售，就是说政策对企业的约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许亏损。那么从粮食购销企业来说，它至少会做三点考虑：一是如果以保护价购进的粮食顺价销售不出去，发生了亏损算谁的？二是如果市价迟迟达不到顺价销售

赵 晓 VS. 陈锡文

的水平，购进的粮食迟迟销不出去，企业没有经营收入，职工的工资、福利怎么办？二是我这个企业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但如果有的企业不这么做，必然会出现谁按政策办谁吃亏。这样劣币驱逐良币，只要不执行政策的企业得不到及时惩治，就会有更多的企业不执行政策，最终造成整个政策被扭曲。

在这三点考虑中，企业受政府委托执行保护价如果发生亏损怎么办？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整个政策设计中缺的也是这个部分。这就导致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就有可能扭曲政策，不执行政策。

当初政策设计最理想化的地方就在这里：认为有了垄断这个前提，不论以保护价收进多少粮食最终都可以实现顺价销售，而只要做到了顺价销售，政府在保护农民上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太大。但在做这种设计时显然有两个关键因素没有考虑到：一是没有考虑到企业行为与执行政策的关系。以保护价购进的粮食达不到顺价要求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明确，会导致粮食企业产生疑虑和行为扭曲，结果就会失去垄断粮食市场这个前提。二是没有考虑到在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下，农民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农民看到政府公布的保护价还可以接受，而且又是敞开收购，他就不会去调减粮食生产。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局面就会越来越复杂。因此我想，任何队伍在执行政策时都可能会有质量问题，都可能出现钻空子的现象，但这种普遍的、大面积的钻空子、不执行政策的现象，是与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有关系的。

88

赵 晓：这么说粮食保护政策对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的下降有一定影响？

陈锡文：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模型计算。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如果按保护价但不是敞开收购，粮食品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这么长，也就是说市场粮价的回升点可能会出现得早一点。但就目前农产品供求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试想一下，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能够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并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使得粮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有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也是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即使这

几年少种一点粮、改种别的农产品，但问题依然存在。

我有一个大体的经验判断，根据目前的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的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 16.5 亿亩到 17 亿亩。低于 16.5 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将不能满足需求，粮价就会上涨；超过 17 亿亩，则会导致供过于求，粮价会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仅有 5000 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我们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生产。因为有库存，估计一两年内粮食播种面积低于 16.5 亿亩问题不大，但连续三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这还只是从粮食这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要考虑的是：调减下来的粮食播种面积去种别的农作物，农民是否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比如棉花、蔬菜等都已经是供过于求，所以抑制农民增收的基本原因不在其他，就在于前面所说的市场需求制约和农民就业不充分。现在有些地方出现“抛荒”，可以反证这一点。不过，这里顺带说一下，对于“抛荒”我认为不必过分担忧。首先是“抛荒”的量在总体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抛荒”是在粮食暂时供过于求、其他农产品也不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实际上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移投入的一种应对措施。当然，引发一些地方出现“抛荒”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农产品在当前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的原因外，农民种地的负担过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抛荒”没有导致供给短缺，既表明它主要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又表明多数农民在当前情况下确实难以靠农业增收。

赵晓：你以前说过，一个人穷的时候吃不饱饭，以后收入增长了，他也不可能一顿饭吃三五斤大米。这里面蕴含的是“初级农产品收入弹性低”的经济学原理。前面你再三强调市场需求对农民增收的约束，我想道理同样。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农民增收难可不可以看成是市场给出了清晰的信号，仅靠农产品增产已不可能实现农民增收，因此需要将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转移出去？

陈锡文：农产品面临的需求约束确实非常严重。比如全球粮食价格的下跌是从 1996 年初开始的，迄今 5 年多了，仍处于低谷。很多品种目前的价格和最高价位时相比已跌去近一半，这似乎意味着全球性的粮食过剩。但从需求角度看，全球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甚至还有饿死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所以讲目前农产品过剩，只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赵晓 VS. 陈锡文

但粮食有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方面很重要的产品，对它仅仅依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作判断是要出问题的。虽然，如果完全从经济学上判断，全球粮食生产都应减少，更不用说中国的粮食生产要减少，但是从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的“粮食安全”的概念来讲，现在全球粮食生产未必能满足需求。因此，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仅仅按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

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状况，从平均消费水平看，粮食市场已经饱和，似乎应该减产。但是平均水平背后掩盖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说中国，如果拿城里的4亿人口和农村的8亿多人口作比较，两者需求结构的差异就非常大。除了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民外，农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继续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鱼这些动物蛋白食品。这说明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虽然整体上已经迈过了小康，但由于存在着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问题，出现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样市场就很难对付。生产出来的东西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早就满足了，但对另一部分人不是这样，没满足的人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

现在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农产品消费者也就是城镇居民，已经进入食品支出比例下降的阶段，他们的支出将转移到新兴消费行业去，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什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城市消费的发展变化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东西和农业无关，比如城里的高楼、轿车都和农业无关，所以尽管城镇在快速增长，但对农业的带动却非常弱，很多农产品的消费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农民再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市场，最大的制约正是在这个地方。

但这种制约最终不是仅仅影响农民，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困难都在这里。按农业的生产能力来说，足以保证4亿城里人吃饱吃好。但问题是有限的城里人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有限，结果是相当数量的农产品过剩，这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收入上不去。农民收入上不去，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里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农民买不起，非农产品也没有大的市场。最后出现了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农产品相对于城镇居民是过剩的，而非农产品相对于农民也是过剩的。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8亿人生产出来的东西4亿人消化不了，所以农产品显得过剩；而农产品过剩导致农民收入上不去，因此4亿人生产的非农产品农民买不起，最后是大家的市场都难以扩大。所以，如果目前已日益明显的收入分配、资源分配问题解决不好的话，第二、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必然面临相互缺乏所需要的市场环境问题，各自的发展就都将遇到很大的障碍。正是从这个整体的角度作分析，我同意“农

民增收的途径在农外”的说法。

赵 晓：刚才谈到了“粮食安全”，请进一步展开。这是个大问题。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粮食安全”其实并不成立，“民以食为天”也罢，粮食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战略问题的说法也罢，都是从“有和无”这样的存量角度去谈的，但现实中我们面临的只是粮食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这样的边际（增量）问题。

陈锡文：关于“粮食安全”的概念，FAO的定义很明确，就是要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保障其生活的基本食品，而且这个食品必须是有营养和健康的。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包括几个要点。其中，总量是最基本的，就是保障所有人都吃饱的总量要求是否能够满足。其次是价格，能不能保证大家都买得起。第三则是食品的营养和安全性。从这三点去看，总量我们目前没有问题，关键是价格，是不是能保证所有人都买得起。就价格而言，城里问题不大，但农村到目前为止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另有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按一般分析，应该有高于临界线5%~10%的弹性区才好，因为人均收入超过635元就算进入温饱的话，有些人可能今年达到这个水平明年又掉下去了。所以没有解决温饱和只是不稳定地解决了温饱的农村人口共计有大约9000万人，另外城里还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家庭。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觉得粮食安全的问题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说实在话，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确有许多人就是出现了颗粒无收的年景他们也不会饿肚子，中国没有粮买进口粮就是了。问题是还要考虑另外一部分人的问题。粮食的“有和无”这个概念对于有支付能力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变化的只是粮价的贵贱而已；但同样的问题，对支付能力有限的人确实是存在的。这里讨论的问题，其实不是实物形态的粮食有和无的问题，而是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有和无的问题。从粮食的实物形态讲，根本就没出现过无粮食供给的状况。但粮食的供给数量是决定粮价的基本因素。一个比较小的供给量的变化完全可能引起一个相当大的价格变化，这是粮食市场特有的规律。因此在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下，说没有粮食的实物，确实是不可能的，但说有些人没有购买粮食的支付能力，却完全是可能的。因此在粮食问题上政府必须考虑的是如何保障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粮食。我认为这是当前讲“粮食安全”的核心。只要有一部分人担心粮价会涨到他们买不起的地步，那么这个阶层所面临的问

赵 晓 VS. 陈锡文

题，显然就是整个社会保持稳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赵 晓：对于买不起粮食的人，除了降低粮价外，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别的方式，比如对最贫困者实行救济。

陈锡文：当然可以。但很现实的问题是政府拿了钱还要有粮，所以最后又归到总量问题上。我认为把粮食安全问题抽象到“有和无”的层面意义不大，因为天底下从来就不曾出过没有粮食的现象，从来都是粮食“多和少”的问题。说旧社会“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那也只是局部现象。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是粮食少到什么程度会导致社会不安、经济不稳。一般情况下5%、10%的粮食供求缺口会导致多大的粮价波动，粮价波动又会引起多少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这个问题从现在来说就是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

到了我们现在的阶段，量的问题可能不是最值得担心的，暂时减产了，还有库存，库存挖完了，还可以进口。问题是价格，多少人对这个价格是不足为虑的，多少人对这个价格是忧心忡忡的，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粮食安全问题是一直存在的。现在政府在考虑三大安全问题：石油安全、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而这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也都是生活中非常现实的事情。

92

赵 晓：能不能这样说：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如果大量进口粮食人家会卡我们的脖子，而是国民收入还不够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粮食方面的支付能力有限？

陈锡文：也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如果20年前谈粮食安全问题，确实存在着量的短缺问题，所以只能实行配给制。现在，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不能让粮价波动危及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也不能让粮价波动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太大的冲击。但中国人均只有0.1公顷耕地，半数以上的耕地还得靠天吃饭，因此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去年粮食一下子减产9%，想一想在正常情况下，9%的减产对粮价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好就好在前几年粮食丰收，库存充裕，所以挺住了。如果前几年都是大体平衡，忽然一年减产9%，对市场粮价乃至整个物价的影响会非常大。

赵 晓：情况有没有可能相反，恰恰是因为前几年粮食持续供大于求，价格不断走低，才使得去年出现了大减产。也就是说，这种减产

是理性的减产。

陈锡文：去年粮食减产900亿斤，大约400亿斤属主动调减，而500亿斤属自然灾害造成，这说明意外的减产比你说的“理性减产”要大。

还要考虑在正常年份中，在供求大体平衡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出现一年5%—10%的减产？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会出现虽然有粮食，但粮价大幅上涨对社会形成冲击的情形。至于粮食会不会成为真正军事和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物资，那要看实际情况。虽然美国人宣称再也不会搞粮食封锁了，这样的承诺有用吗？在外交上从来都是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我相信美国政府如果一旦需要使用粮食作武器并认为它有效，一定会照用不误。实际上，中国只要有5%的粮食供给波动就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1995年，我们才进口了2000万吨粮食，国际市场闹得天翻地覆，粮价一路飙升。所以我认为粮食安全问题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是永恒的，绝对不能说是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赵 晓：与农民收入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税费调整。如果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但税费下降了，农民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当然会上升。对于目前的税费改革，人们担心的是税加上来了，费降不下去。因为有很多费根本就没有名目，也减不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税费改革的结果，农民的实际负担反有可能增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陈锡文：明末清初浙江余姚的黄宗羲先生对于农民税费问题曾做过精辟的分析。在对自秦以来的整个中国农村税制变化充分研究后，黄宗羲先生得出结论，每一次税改都是在农民对苛捐杂税不堪忍受的时候施行的。这时候就连皇帝也感到正税太低，苛捐杂税太高，有必要把苛捐杂税砍掉一块，部分并入正税，然后宣布不许再征任何苛捐杂税。但是，一晃几年过去，皇帝换了，地方官换了，大家会突然觉得正税不够，于是又加杂税。因此，每一轮改革的轨迹就是，一开始砍掉一些杂税并入正税，农民名义税收增加但总税负减轻；然后在下一轮，官府觉得正税不够用了，又开始加杂税；加到一定程度后呢，又觉得农民负担太重，于是又砍一些杂税并入正税……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能不能跳出“黄宗羲定律”是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对大多数纳税人来说它是跳不出去的，因为你对社会的公共性开支要求越来越

赵晓 VS. 陈锡文

高，税负必然也会越来越高。那些福利国家最后都走不下去，也是这个原因。

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特点非常明显的时候，如何对待农民问题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摆不正确，就不可能跳出“黄宗羲定律”。

当今世界，直接依据耕地以及依据农业经营征税的国家非常少。其原因，一是农民数量少。二是在社会统计和税收体制健全后，对家庭或个人一般都是征收最终收入税，也就是所得税。在这种税制下，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常可以不纳税或少纳税。

但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去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6280 元，有多少人交税？农民一年收入才 2253 元，可是人人要交税。这从公平角度上讲不过去。月收入不到 190 多元纳什么税？所以农村税费问题根本不是多收点少收点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设计对不对头的问题。

从改革的角度看，有几个方向应当明确：第一是农村基础教育。农民作为公民，又纳了税，他们的子女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而基础教育是公共开支，如果这部分纳入财政开支，全国农民的负担估计可以减少 50%~60%，而且反弹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二是计划生育统筹。计划生育是国策，国策开支不列入财政预算似乎讲不过去，所以这部分也是应该拿出去的。第三民兵训练，现在已经列到国防开支中去了。第四是对优抚对象的照顾，这应该改由民政支出。第五是乡村道路桥梁建设，可以考虑农村社区和国家相结合投资。第五是农村医疗，这涉及社会保障，可以考虑由国家补贴和农民个人负担相结合。

综上所述，现在的乡镇六项统筹至少有四项应该拿掉，列入政府公共开支。农民也是公民，他交了税，享受公共产品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还要另搞统筹？从这个角度讲，解决农民负担不是减多少费的问题，而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过去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入也少，农村的事只能由农民自己办。但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总额已经从 1978 年的 1132 亿元增长到了 2000 年的 13380 亿元，财政在城乡之间的开支格局应当考虑做大的调整了。现在人们一说起来就责怪农村机构庞杂、冗员多。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不是主要问题？目前全国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口共有 1280 多万，其中 280 万为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 1005 万。这 1005 万中属于党政干部的、也就是属乡镇政府、党委的满打满算才 140 多万，而教师有近 700 万。精简政府机构、人员势在必行，可一共只有 140 多万人，能精简掉多少？省下这些开支对农民能减轻多少负担？

所以，农民税收之外的负担重，大头在于教育。关键是要弄清，这一笔最大的开支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如果是国家法定的基础教育，就要把它列入公共财政，这样才能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因为今后农村教育还要发展，校舍要改善，设备要增加，教员素质要提高，你不能总让它作为农民完税之后的负担。所以现在的税费改革试点虽有成效，每人减轻负担约 30%，但如果教育这个最大的问题不解决，就难免不以各种形式出现反弹。

所以，现在要看两个问题：一是农民这样的收入水平到底应该怎么对其征税？二是城市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对农村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支持方式？在日本，我调查过农村的财政问题。在北海道有一个町，它的规模和我们一个小镇差不多，7000 多人，一年的财政开支高达 100 亿日圆，约合 1 亿美元或 8 亿多人民币，平均一人财政开支 10 多万元。这么高的财政开支，它的收入从那来？只有 7% 是在本地的税收收入，93% 是中央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我们的国情当然不可能这样做，但目前的情况是不少乡镇财政上还要上缴。这个状态不改变的话，农村税费改革必然步履艰难，很可能难以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赵 晓：除去其他因素，人力资本差异可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城市孩子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好，其工作后收入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投资的回报。农村孩子呢？正相反，普遍受教育不足，这怎么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以提高农民收入，要注意提高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这应该是改善农民收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农村女孩子的教育，可以说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基础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许多国家都是由政府财政不遗余力、大力支持。我们的财政喜欢搞大工程，治理大江大河比较多，教育投入相对较少；在对教育的投入中，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支持不足。有人说，现在给有些大学的老师涨工资，一个教授涨的年薪在农村足可以办好一个小学。这样的投入导向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

陈锡文：你说的我完全同意。农村教育这个最大的开支主要让最穷困的农民承担，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所以农村税费改革必须从收支两方面做大的调整。如果只是在原有的收支结构框架内简单的减一点、加一点，“黄宗羲定律”恐难于避免，几轮变动之后农民的实际税负还会加上去。

农业问题

“总的看，中国农业在入世后不至于那么令人担心，汽车厂的老板恐怕应该比农民的忧虑大一些。”

“平心而论，WTO框架就农业而言确实有利于新大陆国家而不利于传统国家。”

“要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涉及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要真正发挥国内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让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多搞一些我们有优势的出口农产品，同时要切实抓好品种、质量和安全标准的管理体系建设，以符合国际市场的需要。”

“现在大家主要还在讨论过渡期内会怎样，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过渡期后。如果大量的体制问题不能在过渡期内解决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五年之后就会真的很困难。”

“我们至少要做好两点：一是既然我加入了，就要调整、适应这种情况；二是要扬长避短，承认有亏有赚，争取少亏多赚。”

“我觉得类似欧洲和日本的道路我们走不了，代价太大，没有这么大的国力。”

“加入WTO最大的好处是迫使你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包括外贸体制的改革、国有粮食系统的改革，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入世后中国的粮食安全程度会提高，但是到底进口比例多大，这不光是粮食的供求问题能决定的，更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农民问题。”

“只有农产品有较大的出口，进口较多的粮食才不至于影响安全问题，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

赵 晓：对于农业，现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WTO对农业的冲击。在不少人看来，加入WTO是以牺牲中国农业为代价的，中国农业有可能在开放后全军覆没。对此你有何看法？

陈锡文：总的看，中国农业在入世后不至于那么令人担心，汽车厂的老板恐怕应该比农民的忧虑更大一些。

应该说在WTO的法律框架中，农业是非常特殊的部分。事实上，农业在WTO框架中存在着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就是传统国家与新大陆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多数开发较早的传统国家，一般都是人多地少，中国是这样，亚洲大陆其他国家以及欧共体各国大致也是这样。这些国家相对于北美、南美的新大陆国家以及澳洲而言，人均土地资源没有办法比，所以纳入WTO的框架来统一处理国际农产品贸易问题，天然存在着资源禀赋不均等的矛盾。平心而论，WTO框架就农业而言确实有利于新大陆国家而不利于传统国家。

所有的传统国家，只要入世均会对本国农业带来压力。不仅中国、欧洲、日本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人们对WTO在这方面的条款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日本前年在西雅图提出一个方案，去年在瑞士又提，就是关于农业中的非贸易性因素、农业的多功能性问题。对于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人少地多的国家来说，农业主要就是产品生产问题、贸易问题；对于其他一些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农业还关系到社会发展问题，例如村落，在传统国家是自古就有的，入世后是振兴还是衰落，传统文化是丢掉还是保存，等等。这些问题不可贸易的，所以你的制度有可能直接影响我的生存方式。

因为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引起的矛盾试图通过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决必然带来许多事实上的不平等。美国人说你既然承诺了，就必须改您的体制，就必须让我的农产品进来。那么，全球的粮食进口国能不能倒过来要求美国无论丰年歉年都要出口那么多数量的粮食呢？事实上他也不敢承诺。

问题是这个框架已经形成，你要加入，别无选择。农业的压力，欧共体、日本都有，对我们来说当然也一样，但我们的地关系比它们更紧张，压力更大。

以上判断是从最一般的逻辑推演出来的，至于中国的情况还不能这么简单的分析。拿WTO中我们已经承诺了的条款来说，如“市场准入”中的“关税减让”部分，我个人觉得，对农业的冲击不能说是最大的，机电产品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中国农业的平均关税现在是21%，承诺降到17%，某些特定产品要降到14%。但大宗

农产品，如谷物的进口关税降低到底有多大影响，就要先了解目前谷物进口的实际关税到底如何。1994年以前，中国粮食进口是零关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是象征性的3%，所以关税减让对谷物进口基本没有影响。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的谷物进口是计划安排的，需要时才进口。对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当然不会征高税。但像小轿车，现在的关税是80%—100%，入世后要逐步降到25%以下，到时所受的冲击要比谷物大得多。

第二是过渡期内的关税配额。很多人对于我们承诺到过渡期末给予2380万吨谷物市场准入的关税配额感到担忧。其实我认为这至少在过渡期内没有什么大问题。1995年我们进口过2080万吨粮食，如果2001年加入WTO，到2006年底，假如承诺的关税配额都能进来，也只比1995年的实际进口数量多出300万吨。从1995年到2006年，时间过去11年了，增加300万吨进口量不能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吧！1996年国家发表粮食问题白皮书，就提出要保持粮食95%的自给率。按现在的消费量计算，进口5%的粮食便是2500万吨，比承诺的市场准入的数量还大，可见在过渡期内粮食问题并不会受多大的冲击。

还有很多人对当前中国多数大宗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感到忧虑。这个判断也值得进一步分析。问题是拿什么价格作比较？应该说目前我们大宗农产品的批发价是高于国际价，但生产者的价格，就是农民的出售价并不高于国际价。所以价格高是因为流通费用太高。如果今后对现有的主要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价格不见得比国际市场高出多少。同时还要看到，目前国际上的大宗农产品如粮食，价格也是处于低谷，我就不信它再不涨了。

另外，有一定幅度的价差在实际上也不见得一定导致大规模进口。比如欧洲市场的谷物就长期比美国每吨高出10美元上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进口美国粮食的情形。这是因为，粮食漂洋过海的交易费用很高，只有10美元的价差这生意没法做。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粮食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高10~20美元，未必导致粮食大规模地涌进。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么大的忧虑，不必有全军覆没的担心。

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除了价格外还有质量、品种的问题。因此，我们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改善品种和质量，提高中国的竞争力。

从比较优势上讲，入世后我们的大宗农产品会有一定压力，但有竞争力的农产品也可能会增加出口。有些人不了解，这些年对中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其实一直是顺差，是创汇的，是有竞争力的。当然要区分产品，像部分畜产品、水产品、园艺类产品，以及瓜果蔬菜、鲜花盆景等等，凡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都是有竞争力的。

要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涉及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要真正发挥国内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让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多搞一些我们有优势的出口农产品，同时要切实抓好品种、质量和安全标准的管理体系建设，以符合国际市场的需要。

二是要适应WTO体制的规则，转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方式。目前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许多经费都用在价格补贴上，而且一般都经过流通环节去补，流失很大。应该把价格补贴更多地转化成对农村生产、市场设施的投资，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也要通过改善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条件来相对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另外，考虑到加入WTO后对国内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效应，这块补贴应当更多地转向内地，沿海地区应当鼓励其尽可能地闯出去。

现在大家主要还在讨论过渡期内会怎样，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过渡期后。如果大量的体制问题不能在过渡期内解决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五年之后就会真的很困难。

赵 晓：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能否归纳为四点：一我们将面对更大的国际国内相融合的市场；二是入世后机遇和挑战并存；三是不同的地区将面临不同的机会与挑战；四是必须加快农业领域的制度变革，如粮食流通体制，向体制变革要效率。

陈锡文：我同意你的看法。前面我们谈过，WTO的农业条款对于所有人口多地少的国家天生不利。因此加入了，就要认识到农业将受很大的压力，为此我们至少要做好两点：一是既然加入了，就要调整、适应这种情况；二是要扬长避短，承认有亏有赚，争取少亏多赚。

赵 晓：据说前一段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主要卡在农业问题上，是这样吗？为什么？

陈锡文：是这样。

在入世的谈判上，原则性的谈判基本都过了，然后进入每一个具体方面，每一个部门的具体细节、条款的谈判。前一段谈的是农业问题，有些问题争执较大，现在已经解决了。不过，农业问题之后其他领域还会不会有问题，仍不好确定。

卡在农业问题上事出有因。这里涉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问题。我们已经表示愿意遵循WTO的条款，但美国却节外生枝地提出中国在农业补贴问题上不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WTO的条款规定，发

赵 晓 VS. 陈锡文

展中国家对农业的补贴（“黄箱”部分）可以占到农业产值的 10%。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这本来不是个讨论的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硬说中国不能享受发展国家的待遇很没有道理，这里面涉及原则问题。当然，也有灵活性的问题，就是列入“黄箱”补贴的这一部分，按 WTO 的规则规定，发达国家的补贴不能超过农业产值的 5%，因此我享受的补贴如果超过 5%，就意味着我不是发达国家。有了这个灵活性，就存在着继续谈的可能性。

赵 晓：美国为什么要在 WTO 规则之外对我们提额外要求，有没有什么大的背景在里面？

陈锡文：我不认为存在更大的背景，关键是实际利益问题，因为它是农产品的出口大国。

关于农业补贴问题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协定中，有一个问题是存在明显矛盾的：规定发达国家只能补 5%，发展中国家可以补贴 10%。其实越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比重越大，财力相对越弱，怎么可能补到农业产值的 10% 呢！因此真要能实现这个格局才是不可思议。但中国的情况特殊，中国虽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但国家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农产品全补到 10% 中国补不起，但补几个特殊的品种还是有可能的。美国寄希望于它的大宗农产品能够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当然担心我们将来有朝一日可能对他所谓的“特定产品”如玉米、小麦、大豆等补到 10%。这样，它的优势产品就难以进入中国市场。所以，美国从它的自身利益出发必然要压低我们对农业补贴的总体水平，这样也就压低了对“特定产品”的补贴水平。

赵 晓：中国争取较高补贴，不过是基于原则。但国外却误以为，你坚持 10% 是想走“农业保护”的道路。其实从历史看，我们从来没有像样的农业保护，经常是负保护。从更长的时间来看，未来中国农业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完全开放的市场化道路，还是类似于欧洲和日本的保护主义道路？

陈锡文：关于农业保护，历来要考虑实际能力。我觉得类似欧洲和日本的道路我们走不了，代价太大，没有这么大的国力。日本的农业政策在它自身的社会中一直争议很大，毕竟代价太大了。欧洲我估计也撑不了多久，因为已经出现了因为长期过度保护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中国今后会对农业采取保护措施，但做不到日本和欧洲的水平。

入世之后，把别人的货挡在国门外是一种策略，坚持打出去又是一种策略。无论从哪方面看，由于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劳动生产率低，今后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都会加大。但补贴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会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因为有一条是明确的，入世之后任何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都不允许，这意味着主要搞价格补贴是不行的，补贴要转到别的方面去。所以会出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现在一些能出口的农产品将来可能出不去，而现在没出口或出口量很少的农产品将来也许会有较大的出口。至于通过农业补贴方式的转变来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从以往着眼于数量到着眼于提高综合竞争力应该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赵 晓：加入WTO后，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如何发挥比较优势？

陈锡文：凡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我们都可能具有比较优势。最近东南沿海的农业结构调整就与尽可能发挥这种优势有关。具体说我们的优势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二是技术性农业劳动力的直接输出。

为发挥好优势，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做好三件事：一要把握好全球农产品和农业劳务市场的状况，了解清楚这些国家的国内法，不要刚出口一点就被人诉倾销了；二是我们的产品出口对象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或比较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对食品的健康性、安全性要求比较高，因此要制定好质量检验标准、完善检验手段，保证产品能够进入国际市场；三是要想办法尽快发展、完善我们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打通国外的营销渠道。目前的出口基本上通过国外进口商作中介，好处的大头自己拿不到，要设法改变这种状况。

赵 晓：这就必然涉及市场化改革。国营外贸公司和目前粮食购销系统，显然不适应WTO的要求。

陈锡文：是这样。加入WTO最大的好处是迫使你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包括外贸体制的改革、国有粮食系统的改革，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如果营销搞得好，农产品的利润会明显提高，我们农业的积累和投入水平也会大幅度上升，而现在这里的流失太多。

赵 晓：那么，中国现在比较欠缺的那些东西，比如配套服务的体

赵 晓 VS. 陈锡文

系，农业产业化这些会不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陈锡文：首先，农民怎么进入市场，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采用产业化经营的途径。这种方式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对农户搞财产“归大堆”，农民易于接受。而龙头企业可以把单个农民的竞争力通过公司整合后体现于整个公司的竞争力上，在开拓市场和提高技术能力等方面都比较容易做好。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特征是“公司+农户”，这是小规模经营的农户数量庞大的国情所决定的。“公司+农户”，公司做的是产前、产后的事情，直接的农业生产过程仍然是由农户来进行的。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偏重于考虑效率，提出发展农业企业化经营的概念。如果是要求农户像工商企业那样加强经营管理，那当然好。问题是这里提出的“企业化经营”，实际是希望大企业进入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来替代农户。大企业经营农业，因为实现了大规模的生产，效率上升，但代价是农民的就业机会减少。对此显然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考虑。日本自二战后实行土改一直到1961年，在长达15的时间中法律不仅严格禁止法人进入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还规定非农生产者不得拥有农地，规定农户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3公顷，超过的部分必须由政府强制收购，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小规模农户的基本利益，其实质是不允许在农业人口大批转移就业之前出现以大资本排挤小农户和土地兼并的现象。当这方面的法律有所修改时，日本的农业人口已从1946年的占50%降到了1961年的只占27%。即便如此，日本的法律至今仍对公司进入农业直接生产领域有着一系列严格的附加条件。而在以农场规模大而著称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的9个州，至今也还定有“禁止非家庭性的公司拥有农地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法律。以大资本排挤小农户，追求农业的效率，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学者说农民把土地租给公司可以得到租金，比他自己种粮食还划算，而且农民还能被公司雇回来做工，再得一份工资。我自己也确实看到过这样的好事情，但问题在于普遍性如何？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有73万多个，举出100个、1000个类似的好典型并不难，但这在总量中才有多大的比例？而公共政策必须考虑有没有普遍意义，政策制定必须关注基本面的情况。如果只看到那不足1%的新鲜事物，冷静与客观思考不足，误以为可以普遍推广，非出大问题不可。我以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户和农户的承包地，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非常值得人们深思。至少有两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是大

企业进入农业直接生产领域后，规模大，市场风险也大，一旦企业抗不住市场风险，农民怎么办？二是既能给农民付高地租、又能将农民雇回来打工的农业企业确实有，但不可能是种粮的企业，然而全国的地都不种粮行吗？对于有条件的地方，我不反对大企业可以进入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问题在于研究这种现象的学者要清醒。一个事物好不好，放在那里就看得见，而研究它的目的，主要是搞清楚它发生、发展的条件，不讲条件，好心往往办不成好事。

赵 晓：入世以后我们的“粮食安全”会变得更严峻还是缓和？

陈锡文：应该是更加安全。理由很简单，多一个市场总比少一个安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粮食进出口问题上的考虑比较狭隘，只看到了我们能利用国际市场调节自身供求的一面。其实，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转变一下观念，如果把我们自身融入国际粮食市场，那就不是安全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可能影响国际粮食市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讨论入世后会进口多少粮食其实不是问题的实质，下决心进入国际市场才是最重要的。

入世后中国的粮食安全程度会提高，但是到底进口比例多大，这不光是粮食的供求问题能决定的，更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农民问题。中国农业现在有什么问题？生产出来的粮食吃不完，价格又低，所以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包括农民就业怎么办，收入怎么办等等成了主要问题。只要这些解决好了，为了优化农业的结构、提高农业的效率，多进一点、少进一点粮食问题都不大。

赵 晓：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出口大量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蔬菜、鲜花，同时大量进口粮食，我们反而更安全了？

陈锡文：我认为总的趋势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美国各州对养殖业的限制非常严格，不许再扩大。欧洲的疯牛病、口蹄疫也沉重打击了那里的畜牧业。如果我们的畜禽防疫工作做得好，养殖产业完全有可能大发展，产品也可能扩大出口，为此将增加进口粮食，变成饲料，再变成畜产品出口；或者一部分沿海地区发展出口的园艺类农产品，与此同时进口部分口粮，这样以出养进、粮食进口的格局可能就会有较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食品不可能主要依赖进口。你想进口人家也供不起你，况且还有数量

赵 晓 VS. 陈锡文

如此之大的农民，他们要就业，要生产，必须注意到对他们的冲击。因此，只有农产品有较大的出口，进口较多的粮食才不至于影响安全问题，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

赵 晓：你觉得现在粮价在去年减少 9% 的背景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波动？

从目前的情况看，去年的粮食减产没有引起现期供求问题。今年的趋势还会减产。但中国由于地域太广，粮食储备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均衡，再加上吞吐调节的操作手段等问题，往往会发生并不太大的供给减少却引发过度的社会反应的情况，对此应有足够估计。

粮价的变化有突发性。我认为即使今年秋粮再减产，现期的供求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粮价会不会突然上涨却很难说。库存量在应对社会预期时意义很大，但真要用时却不能指望它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其中潜伏着太多的质量、品种问题。1993 年底粮价暴涨后，抛售了大量的库存，然而粮价没有平抑下去，主要就是品种、质量不适应需求。现在的消费者一不要品质差的粮、二不要库存时间长的陈粮，因此不是库里有粮就一定能平抑价格。我认为目前的减产还不至于影响到粮食供求中的数量问题，但是有可能影响到价格问题。

农 村

“农民收入上不去的核心问题是就业不足。农民可支配的资源太少，这是农民就业不足的根源所在。”

“因此推进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必须协调发展，这样才能更快地解决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定居的问题。”

“农村问题的出路首先是城镇化，同时也要考虑农村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如何避免衰落。”

“如果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还是计划经济方式，要靠国家安排资金，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都要政府出面解决，而财力就这么点，进程就必然很慢。”

“我觉得不少大城市的建设都有超前现象，其日新月异的程度

度与总体国力、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似乎很不相称。实际上如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将财富集中于大城市，可能会有更均衡的发展，会生长出很多功能比较齐全的中小城市，能解决更多的农民转移就业问题。”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劳动力作为要素自由流动是最必要的条件之一，而加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减少要素流动中的阻滞和成本，否则这种管理就会异化为寻租行为。”

“我们有的时候是管理出了问题，却怀疑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农民进城就是这样。你可以举出许多农民进城带来的问题，其实主要是管理跟不上，我们却怀疑该不该让农民进来。”

“我认为现在土地政策设计的核心内容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不仅不许你去剥夺他，也不许他自己失去土地。这里考虑更多的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问题，因为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目前除了土地再没有别的生活保障。”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覆盖农民，因此以公平优先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多数地方也就不应该改变。”

“再次强调，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民有权承包本集体的土地。因此‘股田制’也罢，‘反租倒包’也罢，都必须以农民自愿为基础。在探讨土地制度创新的思路时，有一点必须首先明确，即土地是农民的，我们其实是在讨论别人的财产问题，就像讨论别人家的钱应该怎么花一样。这虽然绝非不可以，但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基本权益，是所有讨论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立场，否则就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中国当前的法律和政策一直强调的都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长期稳定，奇怪的是，在新闻媒体和理论刊物上见到的却经常是大讲要如何变。”

赵 晓：如何通过城市化、城镇化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赵 晓 VS. 陈锡文

陈锡文：农村问题要考虑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农村经济越来越繁荣，这关系到资源分配的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的核心问题是就业不足。农民可支配的资源太少，这是农民就业不足的根源所在。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是确实提高农民致富的办法，但是这要先解决农民的转移就业问题。把几个农户的地集中给一个农户种，先要考虑那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我说规模经营实际上是一件功夫在外的事：有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规模经营才能水到渠成。所以从根本上讲，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继续从事农业的人富裕的最重要途径。这实际上是个资源分配问题，也是城镇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贡献。

有人不愿提城镇化，主张提城市化，因为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讲发展大中城市更好。这个分析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关键是看你着眼于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还是着眼于加快农民的转移。我觉得中国的模式是大中城市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让他积累资本，但进城打工的农民很难在大中城市落户，因为这里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要求他承受不起，最后只能往回走。发展小城镇就是从这里提起的。很多往回走的农民并不是回农村，而是利用他在大中城市打工的积累到小城镇去安居乐业。因此推进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必须协调发展，这样才能更快地解决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定居的问题。

非农就业的不充分造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比如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999年不到1800元，比东部地区低了900元左右。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反而是高于东部地区的。这说明，西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低，其实是非农就业更不充分。非农就业的收入在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中的比例不到20%，而在东部接近50%。所以西部农民要想富，必须扩大家庭经营以外的非农就业机会，这也必须靠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才能解决。

农村问题的出路首先是城镇化，同时也要考虑农村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如何避免衰落。不少发达国家也很难避免农村的衰落，中国对这个问题要有个大判断，就是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究竟是让农村社区继续保持繁荣还是任其衰落下去。因为中国的8亿多农民再怎么加快向城镇转移，在相当长似的时期内留在农村的还会是多数。因此，农村必然有个社会发展问题，农业要发展，农村社区要繁荣，二者不能偏废。

赵 晓：目前阻碍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因素有哪些？

陈锡文：问题很多。首先是城市建设管理和体制的问题。如果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还是计划经济方式，要靠国家安排资金，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都要政府出面解决，而财力就这么多，进程就必然很慢。

第二是对国民收入分配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认识问题。我觉得不少大城市的建设都有超前现象，其日新月异的程度与总体国力、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似乎很不相称。实际上如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将财富集中于大城市，可能会有更均衡的发展，会生长出很多功能比较齐全的中小城市，能解决更多的农民转移就业问题。

第三是发展小城镇要解决的很多政策问题。有的现在正在解决，比如户籍政策。但土地政策过于单一。农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非农地是国有的，农地要转成非农用地就必须由国家征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既然农地是农民集体所有，那么在农地向非农地转变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农民的利益。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征用农地时所付的补偿费，能不能抵得上对农民来说的这两个“基本”呢？如果抵不上，农民今后的生计怎么解决？这是城镇发展中的两难问题。也就是说，对农民的征地付高额资金，政府拿不起，就会阻碍城镇化的进程；但只付给农民很低的补偿费，不仅不公平，而且威胁农民今后的生计。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办法，否则这个两难问题就会永远难解。

不过，办法还是有的，比如，一是在农地转非农地时严格区分社会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两种地应当有不同的征地价格，公益用地可以让农民作些贡献，而商业用地也要农民作贡献就没有道理。以后者的高价补前者的低价，农民失去土地的经济补偿总体上就可以有较大的提高。二是征地时政府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补偿农民，可不可以考虑发些债券？等以后土地开始有收益后再分期兑付。其实以债券赎买土地的办法，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土改中就用过，我觉得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三是在农地被征用转为非农地后，可不可以设法使农民保留一定的收益权？如果可以的话，农民今后的生计就有保障了，也为他们离开土地、参与城镇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总之，计划经济时代是通过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让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资金，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水平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城乡差距还很大，不应当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再以低地价来为

城市发展作贡献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补偿以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他就既当不了农民也成不了市民，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认为，用地制度非改不可，不改难以推进城镇化。

第四，农民即使想到小城镇定居也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对大多数内地农民来说这个积累要靠到大城市去打工才能完成。问题是现在各大城市自己制定的政策都是在限制他们进城。例如有的城市规定今年开始进城的打工者必须具有高中学历，这是不是太难为农民？试想，内地农村有多少农家子弟上得起高中？再有就是规定进城的农民必须办各种各样的证。办证可以，但为什么要收费？这对农民来说相当于增加了他的进城成本，从而降低了他进城打工积累的能力。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劳动力作为要素自由流动是最必要的条件之一，而加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减少要素流动中的阻滞和成本，否则这种管理就会异化为寻租行为。

我们有的时候是管理出了问题，却怀疑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农民进城就是这样。你可以举出许多农民进城带来的问题，其实主要是管理跟不上，我们却怀疑该不该让农民进来。

赵 晓：有人考虑，一块地的使用权给了农民，农民把它卖了，再加上打工的钱，这样就可以到城里买房、开店。城镇化进程是否会因此而加快？

陈锡文：问题是要搞清楚目前土地政策的前提。我认为现在土地政策设计的核心内容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不仅不许你去剥夺他，也不许他自己失去土地。这里考虑更多的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问题，因为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目前除了土地再没有别的生活保障。

有些人说农民收入上不去与小规模、分散的土地家庭承包政策有关。我搞不懂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如果说农民的收入是靠土地，那么只有在土地产品的价格下降时他的收入才上不去，而这显然是农产品的市场问题，不是土地政策问题。第二，如果说农民的收入已经不依赖于土地，那么即使土地政策有问题也不应当影响农民的收入。第三，如果说只有使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才能让继续种地的农民扩大规模、增加收入，那么前提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必然能够找到其他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但这是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提供就业转移的问题。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转租出去后有三个结果，或者是出去发财了再也不回来，或者一贫如洗再回来，再就

是虽赚了点钱但外面的就业机会没有了还是得回来。如果出现后面两种情形，显然农民只有把租出去的土地使用权再收回米才能生存。我认为目前的土地政策是在公平优先的基础上考虑效率。

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发达地区可以例外。如福建晋江有的农民以每亩地 100 元的价格让渡了使用权。他们说，收入已经不依赖于土地了，因此也不在乎租金的多少，但必须付，因为付了租金才能表明了这土地的承包权的的确确是他的。富裕地区的农民对于属于他的土地权益尚且看得这么重，何况内地的农民呢。农民的考虑也是受制度影响的，因为也许暂时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在经济上对我是有好处，但将来怎样不知道，原因是当他没有别的生活保障，而转移就业、进入城镇等等都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障碍。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覆盖农民，因此以公平优先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多数地方也就不应该改变。

有些人认为土地使用权流通难，是因为政策和法律规定农户的承包期 30 年不变，因此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障碍。这不对！你只要看一下关于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文书，那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在承包期内，只要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方向，允许农民自愿、有偿依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因此 30 年不变的是农户的承包权，30 年内农户自主转让承包地的使用权是得到政策和法律的允许的。想动“30 年不变”，实际就是要根本上刨除农户稳定的承包权，要“突破”的就是不让农民失去土地的制度。

土地是生产要素，当然应该可以流通，但流转过程中有三点必须明确：

一是不管是搞“股份制”还是“反租倒包”，或是别的什么形式的使用权流转，农民的自愿最为重要。这实际上是要明确到底是谁要流转？是农民、干部还是想进入农业的公司？

二是要明确流转的仅仅是农户承包期内的使用权。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 30 年”这是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借使用权的流转而剥夺农户的合法承包权。

三是土地使用权流转、集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对转入、转出者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双方都必须明确自身的权力和义务，自担风险并承担各自的相关法律责任。

关于土地的流转和集中是否具有合理性，至少可以有三条检验的具体标准：

一是土地流转、集中后，要看当地农村是不是稳定，农民是不是

赵 晓 VS. 陈锡文

能安居乐业，如果是，则可以说明这确实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的。

二是要看土地集中后是不是确实提高了使用效率。目前，对“大户”的经营不能只算产出，不计投入，因为有些地方对“大户”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和优惠，“大户”实际的收益并不见得有那么高。另外，也不能只计使用土地者的效益，更关键是要看转出土地者是否增收。

三是要看土地集中使用后最终收益在各当事人之间分配是不是合理。转出者、转入者以及作为中介的乡村组织，到底是谁在土地收益的分配中得大头？

再次强调，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民有权承包本集体的土地。因此“股田制”也罢，“反租倒包”也罢，都必须以农民自愿为基础。在探讨土地制度创新的思路时，有一点必须首先明确，即土地是农民的，我们其实是在讨论别人的财产问题，就像讨论别人家的钱应该怎么花一样。这虽然绝非不可以，但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基本权益，是所有讨论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立场，否则就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赵 晓：我想，从路径依赖的经济学道理讲，想不承认现有土地制度很难，否则制度变革的成本会高得吓人。

110

陈锡文：我以为是这样。我们可以提建议，可以提供示范，但最后怎么办应该由农民自己决定。如果不是这样，就要修改法律和政策，否则你怎么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另外，任何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比如大企业进入农业直接生产领域后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坦率地说，农业家庭经营从来都是古今中外农民的基本生存方式。因此，改变农业的家庭经营，就是要改变农民的生存方式。它所引起的变化，绝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你可以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只能讲竞争和效率，不要什么田园牧歌。但放眼世界，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农业不是搞的家庭经营的呢？

废除农业的家庭经营，我们自己也曾尝试过。人民公社不就是要铲除家庭经营吗？结果怎么样？人民公社的弊端，就连毛主席自己也发现了。他在1961年就讲：“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但毛主席不能容忍家庭经营，因此他主持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到1962年才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由此消除了他自己所讲的

第一个平均主义的矛盾。他当时还特别强调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要 30 年不变，并写入了党的文件，这才使“文革”中“四人帮”鼓吹搞“穷过渡”的企图没能得逞，否则我们大概早就只能吃“社会主义的草”了。但是，毛主席讲的第二个平均主义问题，只是到了改革以后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才真正得以解决？舍此难道还能找得到别的什么途径？

中国当前的法律和政策一直强调的都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长期稳定，奇怪的是，在新闻媒体和理论刊物上见到的却经常是大讲要如何变。更有甚者，有些党政机关在表彰农业方面的先进、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等时，往往总是专挑不实行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典型。这样一来，搞得人们很困惑，至少是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实行现有的法律、政策其实又能怎么样！

我认为在理论界内部讨论法律、政策的修改、完善是必要的、有益的，也应当承认，由于各种特殊原因有些不实行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地方确实也搞得很好，但作为社会的舆论、社会典型的树立，应当有社会责任感。你至少应当让人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要把大家往哪里引。因为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脱离法律和政策的框架。我想没有什么人会再主张恢复人民公社的体制，但不赞成家庭经营的人是有的、那就是主张将土地交给大企业去经营。显然，这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因为这关系到 8 亿多人的生存方式。要改变这么多人的生存方式，就不能不考虑它的前提、条件和后果。要探讨，主要也应当探讨这些。

前面说过有时候出现了短期的、周期性的问题，有些人却往往直接去怀疑基本制度。土地问题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半个世纪中，我们动了多少次了？土地是社会最基本的资产，是财富之母，如果在制度上总是变来变去，农民怎么可能有积累？所以我认为一定要认真分析：目前的农民增收困难，结构调整不尽人意，以及加入 WTO 后面临的挑战、压力等等，到底是周期问题、农业和农村的外部环境变化问题，还是基本制度问题？基本制度总是和基本国情相联系的，比如，大多数地方的土地之所以在现阶段只能是小规模的、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那是因为目前的基本国情是还有 64% 的人口在农村。因此，你想改变小规模的分散经营，你就应该先设法去改变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这个基本国情。

赵 晓：你以前谈到过“土地资本化”，又是什么含义？

赵 晓 VS. 陈锡文

陈锡文：我讲的土地资本化，主要指的是农地变为非农地时的价值实现过程。这一点从开发区以及城镇扩展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土地的价值实现了、变成资本了，但资本应当怎样分配、归谁支配？现在提出加快城镇化，就意味着土地资本化的过程也会加快，那么这块资本的增量流到哪里去？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赵 晓：你提土地资本化不否定现有制度，关注的是土地资本化后的资本归谁支配。但有些方案不是这样，显得理想化和不切实际。是这样吧？

陈锡文：如果土地资本化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都流进城里，那么城市化的过程对农民就没有任何好处可言，农业和农村也就不可能有发展。现在有些人讲的“土地资本化”不是指这个过程，而是指大企业进入农业以后出现的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让农民转让出土地的使用权，被转让者付给农民租金。可是，农民拿到土地使用权的租金就算是“土地资本化”吗？要是这样理解，那自从有了地主出租土地的现象后，土地不是早就已经资本化了吗？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变成“股权”，然后村里将土地集中起来租给大企业经营，村里再将收到的租金分一部分给农户，说这样农民得到的就是“股金分红”，因此农民的土地就“资本化”了。我觉得很奇怪！既然如此，何必搞什么家庭承包，村里把土地租出去再给各户分配租金不是更简单吗？因此，我认为有些人所谓的“土地资本化”，其实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赎买（公不公道不得而知），农民得到的不是地价，而仍然是使用权的租金，但失去的却是承包期内他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是独力的经营主体的地位。我不赞成把这样的过程称作土地的“资本化”。

赵 晓：农村工业或者说乡镇企业和城镇化有什么可结合的？

陈锡文：农村工业化问题很早就被人研究。它是传统国家特有的发展过程，因为传统国家自古就有农村社区，因此除了农业的发展外还有一个农村社区的发展问题。

当前我们讲的农村工业化主要是指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众多贡献中，最重要的贡献是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现在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阶段，确实有很多困难，增长速度减缓了，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了。有人把乡镇企业直接说成中小型企业，因而提出不必考虑什么乡镇企业的特殊性。可以说大多数乡镇企业确实

具有中小企业的特点，但还是要看到它与一般的中小企业的区别。最主要的差别，是城市中小企业对于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村社区的发展做不了直接的贡献。所以乡镇企业是中小企业里很特殊的一部分，它对于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村社区的发展有普通中小企业的不可替代之处。基于这个原因，政府还是应该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当然乡镇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经营管理也要搞好。有人说，农村的工业化要让位于城市工业化，我觉得这话可能说得早了一些，因为尽管对农民的转移就业应当提倡“离土又离乡”，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离土不离乡”的毕竟是大多数。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乡镇企业发展到这一步，结构、布局等总体上是有很多问题。应该逐步引导农民再建新的乡镇企业时要往小城镇集中。现在很多人在发展小城镇的认识问题上有误区，他不清楚到底是在发展城镇还是在搞居民住宅小区建设。小区最大特点是除了物业外很少有别的产业，居民在这里居住、消费但不在这里谋生。而小城镇则首先必须让人们在这里就业、挣钱，因此就必须发展产业，这样才能把人吸引进来。引导新建的乡镇企业进小城镇，实际也是引导农民参与城镇的产业发展。

今后应该逐步抬高在乡里、村里办企业的标准，降低在镇上办企业的标准。不必指望已经办在农村的企业有多少会搬到城镇来，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还会发展，但进入小城镇的乡镇企业一定会逐步增加。所以农村工业化的命题还远未过时。

赵 晓：家庭承包经营搞了 20 年了，今后的前景如何？

陈锡文：我认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和农村人口的逐步转移，农业的经营规模、生产手段等都可能会有变化，但农业以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为主是不会变的。现在需要明确的是被改变的将是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不是家庭经营本身，就算种田“大户”也得这样做。农业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农业的劳动对象和生产环境特殊。农业的劳动对象都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经营者必须随时随地关注它们，才能理解和满足它们的需求；而农业的生产环境就是大自然，自然环境是变幻莫测的，经营者只有随时关注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才能将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这就需要农业的直接生产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个人，才能做到随时在生产现场决策。二是农业经营管理的特殊性。农业生产的环节和工序极多，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关系到最终的产量，

但在农业的经营管理中，不仅很难折算不同工序之间所付出的不同劳动量，而且也很难评价每道工序对最终产量的具体贡献。要真正解决这种核算上的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作核算。而不作核算但又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就只有在家庭这种组织内才可能实现。有的国家把农业的家庭经营管理叫做“和睦式的管理”，道理也在这里。三是农业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相分离的特殊性。只有对劳动力的支配达到最充分的自主性，才能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时间最充分地加以利用。而这也只有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才能真正做得到。这些道理，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都讲很清楚。经营的具体方式总要和产业的特殊性相适应，除了个别情况，如工厂化、无土栽培的农作物等，可以像车间里的流水线那样操作，绝大多数情况下，农业以家庭经营为主是轻易改变不了的。

总的来看，农业的家庭经营在规模、生产手段上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变化，而这种变化越大，就越是要改善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如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占劳动力总数的不足3%，但为农业提供服务（当然也是经营性的）的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的从业人员却占劳动力总数的17%。因此，农业越发展，就要求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越发达和完善，但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取向是不会改变的。

114

赵 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农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又是什么？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提供市场信息、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及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标准管理问题。

农民的产品生产出来要卖出去，卖好价钱，就必须按市场的需求来生产，这是告别了短缺之后的农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建立完整、及时、有权威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系统，已经是刻不容缓。没有市场信息的引导，农民在结构调整中就难以避免盲目性，个别在引导农民调整结构时就难免瞎指挥。现在的结构调整，必须优化农产品的品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的效益。但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市场信息、资金、技术，恰恰是当前农民所最缺乏的，没有这些，农民只能陷于苦无出路的彷徨和无奈之中，结构调整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农产品中大多是食品，食品的营养和安全性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建立健全食品的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手段，也是引导农民生产出受市场欢迎的农产品的迫切要求。现在的情况是，大量

的降低食品质量甚至危及人们安全的各种有害的投入品被用于农业，再不采取严厉的手段打击这些有害投入品的生产和销售者，就会极大地误导农民：以为这样可以更快地增加收入，且不知这样的农产品总有一天会完全失去市场，那么农民也就会因此而倾家荡产。应该说，这三件事都应该而且必须由政府来做。这也是衡量农业是不是真放在了国民经济首位、政府是不是真转变了它的职能的重要标准。

(本文写于2000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中最头疼、最引人关注的“三农问题”。陈锡文是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全球经济前景与 中国经济发展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正值世界经济放缓之际，人们又听到了来自美国的尖叫声。世界经济前景究竟如何，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政界、商界人士莫不需要倾听更多的声音，了解各方权威人士的看法。为此，赵晓博士对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主任迪帕克先生进行了问询。世界银行是首屈一指的全球性经济与金融组织，其对于世界经济视野开阔而信息独到。衷心希望精心策划的独家对话能对您把握变幻莫测的经济风云有所启示。

赵 晓：如果只用一句话乃至一个词来概括目前全球的经济及其前景，你怎么说？

迪帕克：放缓（slowdown）。世界经济正在放缓。

放缓期会有多长呢？我估计它会呈现V字型。

不确定性的因素主要是人们的预期，而不是实体经济。高科技作为实物经济的一部分在过去一段时期表现不佳，带动股票价格大跌，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其影响主要不是对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而是对于那些做出实际投资决策的人。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部分，而且具有自我实施和加强的效应。所以，我们看到，高科技产品的存量正在下降，因为它们很快就不再被接受。高科技产品的周期非常短，我们本没有必要为此过于担心，令人担心的是消费预期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这就是你可能看到美国人对消费有些谨慎的原因。

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势必会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给定美国经济发展对于国际经济发展前景的作用，这一事件必然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不过，我以为这一事件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当前的

局势，即使没有这一事件，短期内亦将经历一次放缓。

赵 晓：现在是“全球同此凉热”的时代，请继续纵论天下大势。

迪帕克：除美国外，欧洲也很关键。我们曾经预期欧洲经济不会下降太多，但是欧洲经济目前正在放缓。

所以，我认为亚洲很可能重要得多。我们从亚洲观察到的情况，经济尽管有所下降，资本流入速度放慢但是并没有崩溃。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尤其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中国的外资流入得益于WTO预期，同时也从IPO中得到了一点好处。不过，在解释中国资本流入问题时，我们应该谨慎，因为一直存在着一些对证券资产、权益资产以及关于资金迅速流动的争论。

即使我们不考虑中国，由于资本的流入，亚洲经济也没有经历急剧的放缓。虽然整个经济形势不是太好，例如台湾省、香港特区、新加坡都不是太好，但它们没有出现大幅放缓。出现大幅放缓的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于高科技出口或物品出口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内地的部分地区，例如广东省。但是亚洲的关键，我认为是中国。中国以每年6%至7%的速率持续增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地区贸易的稳定。

此外是日本，日本经济在最近10年一直处于不太好的状态，现在仍然看不到希望。

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都很巨大。所以我不知道如何预测未来3到5年内的经济形势。也许，我们会进行结构调整，或者某个时候会进入萧条阶段。但问题是萧条的专业化定义是出现连续2个季度的下降，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专业化的定义，而是世界的产能，即重要产品是否会出现严重过剩的情形。

赵 晓：说到产能过剩，我很有兴趣。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些分析。我更想知道你对于中国产能过剩的看法。

迪帕克：在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而且大量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再也无法获益的投资。不过，我以为，这不是最值得担心的问题。理由是，如果我们关注制造部门，这种不平衡其实是很小的。问题也许出在服务部门的计算。比如中国，其服务产业占GDP的32%或33%，农业大约占15%，余下的为制造业。但我认为这个数据大大低估了服务部门，理由是许多服务产品被当成了制造产品。例如，国有企业

大多划入制造行业，但它也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有时服务产品可以从整个产出中区分开来，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它们被直接计算在企业总产值中。如果进行调整并把这部分服务从制造业中拿出来，服务业估计占中国GDP的一半左右。而我们知道，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业是十分短缺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服务业发展已经足够，恰恰相反，是严重不足。考虑到中国居民现在的服务消费，服务业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如果收集一下中国居民的账单，最大的消费将是住房——一个巨大的服务行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是另一个巨大的服务行业，但其产品附加值很小；后勤和运输业也是中国一个庞大的服务行业。人们可能还会想到一些传统的服务行业如理发、餐饮等等，这些在中国早已存在，但是这些服务的发展也还远远达不到专业化的水平，不能满足中国人民潜在的需求。

人们需要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服务，我认为这方面中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

赵 晓：我收集了一些数据，分析住房和汽车行业可望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迈入一个新台阶。你的看法呢？

迪帕克：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将上一个新台阶。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住房需求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汽车的情况更为复杂。如果我们讨论的更深入一点，汽车消费最终将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中国的汽车行业目前还很小。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正在以每年大约6%的速度高速增长。他们不想购买自行车，而想直接买汽车。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汽车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边际成本是很高的。这便涉及公共政策的选择：你想让中国居民像美国居民那样开汽车吗？如果答案肯定，则由此带来的污染压力你必须加以考虑。你必须考虑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并不认为汽车行业将会像住房那样有力地推动需求：住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对汽车行业我不敢下此结论。

我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推动其需求以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劳动力将就职于服务部门。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正在减少，制造业劳动力有所增加但不明显，而服务业吸收劳动力潜力最大。其中，服务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中国的农业附加值为每个农业劳动力300美元，服务业为900美元，制造

业 3000 美元。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将制造业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率。

现在许多人说，中国将成为制造业的中心。是的，但是对于制造业中心的含义必须格外小心。例如，有人说广东省是制造业的中心，但其附加值却很低。我们比较上海和广东的产业结构。广东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 40%，但大部分出口产品是加工品，即进 1170 美分出口 1 美元。上海的产品附加值则要高的多。因此，要成为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必须向更高附加值、更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发展。广东的制造基地也许可以向西部转移。它过去由香港转移到广东，现在它也许应该向四川、重庆等地转移。

赵 晓：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迪帕克：我认为它首先是一种选择，目的在于保持一个低的失业率和高的城镇消费水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理性的选择。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意识到，即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当经济增长率看起来将要下降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外，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因为必须用它。

问题是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能维持多久。如果债务数额不是太大，继续此政策并不难。中国政府的债务有时完全可以维持。这为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隐性债务 (hidden debts) 以及或有债务 (contingent liability) 大量地存在着。对于隐藏负担，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我认为政府应在估计究竟能给经济带来多大推动之后才决定隐藏负担的数额。或有债务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最糟糕的就是，在某些情形下，或有债务会变成政府的债务。因此对于或有债务变成政府债务的条件必须十分小心。中国在纽约的银行向当地其他银行捐款却不能为其他银行提供贷款，那么所有纽约的银行将会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那么在什么情形下纽约或香港的银行将会无力支撑债务呢？当政府向外部发出意外支出不属于中央政府的信号，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因此，政府压缩或有债务是很重要的。

综合来看，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好的，它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赵 晓：你如何看待中国加入 WTO 的影响？

赵 晓 VS. 迪帕克

迪帕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我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更关注成果，但是动态的过程实际上更为重要。现在，成果是很明显的。据专家的可靠分析，中国加入WTO肯定会在未来5至10年内增加中国的国民收入，提高国民福利及其生活水平。因此成果是长远而且确定的。但是过程呢？相反，我们就必须谨慎了。例如，当前中国占整个世界经济的3.2%，加入WTO后由于中国的成本优势以及变化的世界需求，这个比例将达到4.1%。同时，我们预期中国的贸易将占世界的6%~7%。毫无疑问，中国的某些部门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经济，它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过渡，从资源丰富、人均寿命短的国家向资源相对缺乏、人均寿命长的国家过渡。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中国将变得与OECD国家十分类似。另外，中国也正在从一个封闭的经济向开放的经济过渡。关于这个变化，WTO的影响是很小的。这个变化是基础性的变化而WTO带来的变化是附加的变化。

我们知道最后的成果，我们也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成果。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将会更为灵活。有两个过程我很感兴趣，一个是打破垄断的过程，另一个是地区平等化的过程。加入WTO将对中国的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

所以，加入WTO为中国提供了许多许多的机会，而且会产生更有利的影响。但是为了最大化这些有利的影响，中国必须处理灵活性的问题、收入问题，以及控制和协调的问题。当经济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后，资源配置的决策不是由北京，而是由单个的农场、企业和地方政府来进行的。因此地方政府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看地方政府是否有动机进行正确的决策。目前看来还没有。地方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不高。

赵 晓：中国经济有许多令人乐观的地方，但你认为困难有哪些？

迪帕克：我认为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十分重要。有些市场存在严格的限制，例如土地，又比如对小城市发展的限制，这些都是问题的关键。

赵 晓：对不起，插一句，我们该怎样保证农民的利益呢？

迪帕克：首先要保证农产品的价格，其次要实现从低附加值的农产品

向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转移，另外要实现一部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要努力改善土地市场。

赵 晓：请继续刚才的谈话。

除市场和城市发展的障碍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问题。

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放缓，中国最好的宏观政策是微观结构的重组，因此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微观基础。由此涉及资本系统的两个方面：一是银行系统的变革——如何配置资源达到更高的效率，另一个是财政系统的改革，要使地方政府更广泛、更有力地利用财政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公共投资的质量，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是很差的。例如，中国政府的支出多于收入，超额预算大量存在，因此从这些收入检查支出，政府支出的质量是很低的。相对来说，中央政府更严格一些，但次一级的政府就不同。

另外，银行系统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并不知道资本是如何流入实体经济的。我们也不知道企业如何利用这些资本以达到最大的生产力。

赵 晓：问一个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中国有无可能发生财政危机、金融危机？

迪帕克：可能性很小。我们无法找到它发生的根源。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国内市场。中国将在银行系统、公司管理等等方面有一些重组性的变化，但不是危机。

赵 晓：但我们曾目睹邻们的危机。你认为中国能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学到些什么？

迪帕克：微观层次的改革是关键。中国的银行系统并不是真正的银行系统。要对它实行改革，还需要很长时间来进行结构重组。中央银行的政策如何对企业层次发生作用很重要，但目前这种效果很微弱。不过，还好没有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企业照样能够借款。

赵 晓：除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外，中国的中央银行应该怎样监管商业银行？

赵 晓 VS. 迪帕克

迪帕克：在中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系统早已建立起来了。问题是如何得到所需要的信息。甚至连银行的经理也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所以我认为借贷文化不是关键的因素，可以慢慢地对企业施加硬的预算约束。

治理结构和市场经济的平衡是关键。官僚主义对商业危害很大，所幸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转向了更为市场化的方向。

赵 晓：你怎样看待中国的资本市场？

迪帕克：我认为不可能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太多的改革。一般来说，资本市场可以规范企业，因为投资者的观点可以影响企业，而这样就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压力。但是，在中国，投资者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必须有一些具有高超的投资技术的投资者。他们了解这些企业，能够影响企业。我认为对企业盈利能力进行信息披露是非常重要的。

赵 晓：谢谢你的讨论。最后一个问題，你怎样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迪帕克：对人民币来说，面临的是升值的压力。中国加入WTO将给人民币的升值带来进一步的压力。但没有迹象显示人民币现在的汇价将发生变动。不过，我认为，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将是明智的。

(本文写于2001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变得特别不确定之时。)

SARS 考验中国

SARS 经济增长、 宏观政策 与公共卫生

2003年6月初，SARS冲击波未息，由北京青年报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新浪网主办的、赵晓博士首场主持的“SARS考验中国，中外经济学家网络越洋对话网上论坛”在新浪网和Ynet网上同时拉开帷幕。本次论坛是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举，是中国内地有史以来最高层次的经济学界网络对话，通过网络平台与大众传媒对接，展现中外知名经济学家对此次非典危机及其影响的各种观点，以及和全球应对SARS的智慧。出席开幕式的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先生；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新浪网CEO汪延先生；以及北京青年报社长张延平先生；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雅宾先生；北京青年报Ynet网站总经理贺帆生先生。



20:15:28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到场。稍事休息后，我们的第一场对话马上开始。出席首场对话的嘉宾是大洋彼岸的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 Jeffrey D. Sachs 先生；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先生；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先生。本场由

赵 晓 VS. Jeffrey D. Sachs、胡鞍钢

特别嘉宾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任职于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经济研究中心的赵晓博士和本报记者植万禄共同主持。

20:47:16 赵 晓：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谈论他的老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时，提出了对一个合格经济学家的要求：“一位经济学家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我想将这段话作为今天我们讨论的基调。我们请来了三位经济学家，他们居于象牙塔中，同时又在研究最热的SARS问题。

我们知道，自SARS以来，如何对付它已经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重点，也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引人关注的是SARS对中国经济究竟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众说纷纭。现在比较公认的看法是SARS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大于美伊战争，而且大于亚洲金融危机。有人因此担心，中国人口罩罩住的也许不是人们的口，而是中国的活力。它窒息的也不是一个春天，而是整个经济。SARS也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摩根斯坦利的罗奇甚至断言，SARS有可能是组织世界经济回升的一个“棺材钉”。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在判断SARS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高盛将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调低至7%，BNP百富勤则将中国经济增长调低至6.9%，而摩根士丹利则更是调低至6.5%。

国内的经济学家对SARS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所持的观点也是差异很大。有些人认为，SARS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就好像是病来如山倒，将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但也有人认为，2003年中国经济正好进入黄金增长年，现在纵然黄金没有了，保住白银还是很有可能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也将听到不同观点。

首先介绍一下三位嘉宾，三位经济学家。然后请胡鞍钢教授和海闻教授对他们最近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再开始我们进一步的讨论。

20:49:16 赵 晓：我先介绍一下海闻教授。海闻教授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拿的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另外一位嘉宾是非常著名的胡鞍钢教授。胡鞍钢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是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拿的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学者。

今天邀请的外籍嘉宾是一位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教授，他就是 Jeffrey D. Sachs。Jeffrey D. Sachs 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并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任该校国际发展中心主任。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会主任，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负责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等等。

20:54:03 胡鞍钢：刚才赵晓博士将一个经济学家所具备的条件列出来，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当然经济学家还不是处理危机的人，但是我们力图成为认识危机的能手，或者说能不能在危机的时刻，对危机的性质、发展的趋势有一些知识上的贡献。我把 SARS 危机称之为有一个生命发展周期的一个危机，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潜伏期或者是初期，大体可以从 2002 年的年底到 2003 年的 2 月份开始。第二阶段称之为迅速爆发期或者迅速蔓延期，是从 2003 年的 2 月份到 5 月份的中旬，一会儿我会把图演示一下，一共是五张图。第三阶段称之为高峰期或者高峰平台期。第四阶段叫做衰退期，它像一个产品或者产业也好，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下面我就将这五张图，将疫情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我们研究小组刚刚得出的结论。

第一张图显示的是新增病例的情况，基本是一个倒“U”字。第二张图是按照每 3 日新增病例和累计数的变化量。我们可以看出来，生命周期是比较明显的，在 4 月底 5 月初，每日新增量，按照平均每 3 日是高峰期，随着下降，我们看到积累量的数据那条曲线相应增长比较快，而后随着新增病例的下降以后，这个积累数就趋于缓和。第 3 张图很有意义，我们计算一下所谓实际病例数，实际病例数是指累计病例数减死亡的人数和出院人数，是一个静的所谓实际病例数。我们可以看第 3 张图，实际病例数是先上升后下降，大约在 5 月中旬左右达到高峰，而后现在迅速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死亡人数有所上升，但是幅度比较小。第二来看，是出院人数滞后性迅速上升，所以导致实际病例数从高峰期开始回落。第四张图是表明了我们的死亡人数。从所谓病死率来看，实际上是有缓慢上升，从原来不到 5%，现在 5 月份将近达到 6%，但是和国际相比，中国的病死率比较低，全世界的病死率大约是 9%，即使是新加坡或者其他的地方病死率都

赵 晓 VS. Jeffrey D. Sachs、胡鞍钢

比较高，都在 10% 以上。第五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医护人员感染的人数和医护人员感染比例，出现一个在 4 月份迅速上升，到 5 月份比例有所下降。

20:55:00 胡鞍钢：那么，以上这五张图，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我们目前 SARS 危机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SARS 危机目前正处在我们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过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很担心 SARS 的反复，如果向农村扩散或者向其他的领域扩散，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严格控制疫情，仍然是我们称之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所以说，到底 SARS 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或者对社会有多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的控制 SARS 疫情，使它不能够再次反复，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20:58:48 胡鞍钢：那么，如果根据目前 SARS 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个人来看，因为我们在一个月前做的预测，当时是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 SARS 有效遏制，还不能叫控制，应该在 6 月底到 7 月底，现在看来比我们预期的好一点。第二种就是所谓的 8 月底到 9 月底，第三种就是到年底。所以说，从现在的分析来看，比我们当初预期的要好。我想强调一下，因为对 SARS 的强调，像王岐山市长所说，如同赌博，当然我们不愿意赌博。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们出现了曙光，但是还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想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还是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们叫三个“意想不到”，在 4 月初的时候，我们意想不到，今年的一季度增长率如此之高，是 9.9%，并出现了我们称之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扩张期。第二个想不到就是 SARS 疫情在广东虽然有所控制，但是很快扩散到北京和华北地区，因为在 3 月 31 号的时候，北京的病例数占全国的病例数只有 1.0%，但到了 4 月底，北京及华北地区占了全国总病例数的 60%。所以说，它这种蔓延的趋势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冲击也意想不到。第三个想不到，可能就是 SARS 疫情，在这么有限的相对短的时间内遏制。我暂时就对这个问题做这么一点点分析和判断。

21:01:04 赵 晓：我们现在已经接通了 Sachs 教授。Sachs 教授，请先谈两个基本问题：公共卫生和宏观经济有什么样的关系？公共卫生危机引发宏观经济危机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Jeffrey D. Sachs: 首先感谢各位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这次研讨会。在过去的许多年来，卫生是如何影响到一国的经济问题，这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议题。事实上，我在2002年9月份的时候，参加过一个项目，当时是中国卫生部邀请我来探讨“艾滋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强调在某些时候这种传染病有可能严重地影响经济的发展，也有可能给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研究的结果就是，政府应该认识到重要性，必须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这不是私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在2002年12月份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没有进行足够的投资，使得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较不够合理。当然，我2002年12月份讲话的时候，还不知道SARS的情况，但是，当时讨论的这些问题都和SARS的问题有关联的。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SARS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影响，这个影响是很严重的，甚至有可能影响了今年第二、第三季度经济的增长。而且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或经济体，像香港，甚至影响到世界的其他地区，比如说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个疾病影响到经济，是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到经济的增长的：第一种是直接的影响，有一些是医疗方面的支出、医院方面的支出。但是，SARS还可以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影响经济的增长，这是通常见到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传染病也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的开展。比方说旅行和旅游业、消费支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所有这些，也影响到个人和国际经济体之间的联系。通常情况下，这种疾病的间接影响，甚至要几倍于它造成的直接的经济损失。

SARS这种疾病，它造成的影响，可能造成了几百个生命的损失，还有一些直接的资金的支出，但是经济方面的影响，要远远地大于这种影响。因为旅游业已经停滞了，甚至中国的一些学校也被迫关门、放假了，国际贸易也受到了影响。现在还很难预测这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当然，这主要依赖于SARS在未来的控制情况。我们非常希望它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SARS疾病带来的经济影响代价是高昂的。毫无疑问，SARS也只是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未来即将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所以，就算SARS这种疾病得到了控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放松警惕，可以松一口气。中国不能继续忽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必须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比方说艾滋病的传染，它在全世界传播，它也传到了中国，它不像SARS这种病这么有戏剧性，但是它的规模要比SARS大得多，可能有100万人带阳性。而知道这种真相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因为

赵 晓 VS. Jeffrey D. Sachs、胡鞍钢

现在的公共卫生领域不是那么合理，缺乏相应的数据知道确切的情况。中国也有其他的疾病在传染着。

美国也有一些新的传染病出现。有一种叫西尼罗河病毒，几年前美国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而现在在美国却产生了很多的病例。每年的流感也是一个例子。

所以中国必须要特别注意公共卫生领域的情况，来投入新的力量和这些疾病做斗争。所以我现在要指出的就是，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重视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涉及几年的时间，要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质量，来向全国人民提供公共卫生体系的服务，包括农村地区，还有中国的西部地区，在那些地区，医疗条件是很差的。

21:12:50 Sachs: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领导了一个研究项目，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传染病和卫生的一个研究题目。我们向各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建议他们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途径，而且我们还向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具体建议。每个国家应该认真的研究这个领域，研究如何提高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这是一个跨越10年的时间。现在我们需要在短期内就控制住SARS的传播，但是当紧急状况过去以后，我希望中国政府就能够转而关注长期的工作，制定它未来10年的计划，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我知道，中国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我非常赞赏中国所作出的努力，而我们也非常乐于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中国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水平。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也可以从SARS上得到一点教训，就是传染病可以影响全球经济。每一个单一的国家，都依赖于另外别的国家的好的健康体系。所以，如果中国有一个好的健康体系的话，这将有利于全球更快控制SARS这种传染病，这对于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如果说非洲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卫生体系，那么艾滋病的传播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控制了。所以，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体系的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地区间的合作，大量的国际间的合作。

21:14:27 Sachs: 我最后要指出的一点，看起来SARS病毒可能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身上的，可能是因为吃了野生动物所导致的。而根据这种科技的研究，它有可能是源起于广东地区。这是动物向人类传播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全世界已经多次发生了这种情况。当然，还要进行非常认真仔细的研究。

21:16:26 赵 晓：作为主持人，我想接着向 Sachs 提三个问题。第一点，你说尽快控制 SARS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如何理解“控制”的含义？是指不再有 SARS 病人，还是指发明出了治疗 SARS 的特效药，人们不再害怕 SARS，还是指 WHO 宣布中国不再为疫区。我们应该在哪一个含义上理解“控制”？第二，你指出 SARS 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可能造成严重影响，“严重”又该如何理解？我曾经问两位中国经济学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SARS 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不太严重，一位说严重。但说不严重的告诉我，SARS 对中国 GDP 的影响不到两千亿人民币；而说严重的那位说 SARS 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估计在一千亿人民币左右。所以如果没有大致的数字上的判断，我们不知道“严重”和“不严重”两个词之中究竟有没有实质的差别。第三，你还提到，中国现在的公共卫生系统投入不足，那么是不是只要提高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呢？还是说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另外，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解决公共卫生方面，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不同？谢谢。

21:16:44 Sachs：首先关于控制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三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控制住疾病的传播，我们要对病人进行隔离、进行治疗，这样使得他们不再传播其他人。第二方面就是对病人进行治疗，使得他们不会再因这种疾病而死去。目前这方面不是那么成功。第三就是开发出新的药品或者疫苗，能够有效的治疗这种疾病。

21:17:39 Sachs：所以，对控制这种疾病，有各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要关注于这几方面的情况。因为在目前短期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 SARS 的传播。目前看来，有积极的进展。但是，还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来开发疫苗或者提高制药药品，这方面的努力还要继续进行。

21:20:02 Sachs：对经济影响方面，在这点上大家都在做猜测而已，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概念。这依赖于这种疾病得到控制的快慢。一种估计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有可能下降 1%，或许这种猜测太大了。对于香港特区来说，它的 GDP 有可能下降 3%.. 这还依赖于疾病得到控制的速度，就目前公共卫生体系而言，它是不是还在继续进行传播或者说传播的速度已经下降，政府要明确知道疾

赵 晓 VS. Jeffrey D. Sachs、胡鞍钢

病的规模。第三点就是关于公共卫生体系的问题。提高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更强的透明度和信息，更快的信息报送体制，更准确的信息报送。我想中国在过去的一两个月，这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第二就是人员的培训，培训公共卫生体系的官员，让他们和疾病做有效的斗争。第三就是更多的投资，使得官员们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和疾病做斗争，来治疗病人，来控制疾病的传播。所以在这方面，有许多的工作来做，以便提高中国公共卫生体系。

21:27:43 网 友：中国近 20 年，出现了很多新的传染病，包括艾滋病，但是都没有 SARS 传染性大，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 SARS 对中国的经济冲击如此之大？

21:28:00 Sachs：首先，艾滋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足够的信息情况。SARS 让人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疾病，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如此。因此，它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好的影响，比如说消费行为、旅行行为方面，在短时间内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为大家不知道如何治疗它，对它不了解，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旦中国采取措施，来控制这个流行病，来使得人们再次到中国安全旅行，这样的话，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但是有那么多商界人士取消了中国之行，还有很多的游客他们也不来中国了。这是在短期内造成影响经济的最大原因。

21:28:16 赵 晓：请问 Sachs 教授，在公共卫生支出方面，政府是应该更多的支出在像艾滋病这种死亡人数更多的疾病上，还是像 SARS 这样在传染上具有威胁的疾病上？

21:29:32 Sachs：我想在您开始分析中国的卫生系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这方面政府确实进行了很大资源的投入，但是在过去很多年这种投入是不够的。所以，需要大量增加这方面的投资。这样的话，会使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得到加强。比如说在控制类似于 SARS 这样的流行病后，也可以更好的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即使在控制疟疾方面，在中国南方有很多这样的疾病，也可以更有成效。还可以给更多的人提供基本的卫生保障，比如说对于相对贫穷的西部地区的人就是这样。还比如，在研究控制一些新的疾病方面也会有益。这些新的疾病正在

越来越多的影响中国，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富裕，而且城市化越来越高。比如说在中国有糖尿病这种疾病，它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体重超重、过分肥胖造成的。在大城市中，人们运动不够。

所以在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确定在哪方面支出的时候，并不只是一个答案。很幸运的是，如果中国将会在公共卫生领域将增加支出的话，如果能增加到GDP的2%~3%的幅度的话，在未来的5~10年中实现这样的增幅的增加的话，在不同的领域，我们都会有更好的机会增加研究。我确实建议中国政府研究、计划在公共卫生方面作出更多的投资。

21:30:11 海闻：Jeff，你好，我是海闻……

21:30:23 Sachs：你好，海闻……

21:30:36 海闻：我有一个问题，你认为SARS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会有什么影响吗？甚至说对卫生体系以外的其他的经济方面的改革有什么影响？你认为SARS还有可能影响一些社会改革吗？

21:30:49 Sachs：我觉得SARS主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会因此要求更好的信息披露的工作。

131

21:33:01 Sachs：在控制SARS疾病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如果要控制疾病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信息披露，很高的透明度。中国政府在提供数据方面，确实要提高透明度。很多的国际上的观察员，他们对于提供有限的数据是不满意的。至少在一开始的一两个月中间是这种情况，也就是SARS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所以，我想，大家都会要求中国有更多的透明度，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想这将是会非常有益的，对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来讲都是如此。但是，我不认为SARS将在根本意义上影响中国进行的一些改革，如果SARS很成功的被控制的话。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它确实可以成功地控制的。

21:33:14 赵晓：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全球宏观经济学》这本教科书中，“公共卫生与宏观经济”的内容会不会在未来占一个比较大的比重？

21:33:30 Sachs：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赵 晓 VS. Jeffrey D. Sachs、胡鞍钢

21:33:41 赵 晓：谢谢……

21:33:57 Sachs：很多年，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我忽视了全球卫生的问题。在最近的几年中，我逐渐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些传统的经济分析没有给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在一些最穷的国家，这种情况就更加的明显。比如说非洲，非洲有大量的疾病，但是我想对所有的经济体来讲都是如此。大家都健康，整个自然环境的安全，以及传染病得到控制，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在未来的几代中，公共卫生问题肯定会更加的重要。

我感谢东道主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讨论，期待我们未来进一步进行这样的活动。祝在座的各位健康，祝中国尽快将 SARS 成功地控制起来。非常感谢！

21:34:17 赵 晓：谢谢 Jeffrey D. Sachs 教授对公共卫生与宏观经济的介绍。下面我们继续分析 SARS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请海闻教授。

21:35:31 海 闻：你刚才提到公共卫生和宏观经济的关系。我想公共卫生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传染病的控制、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这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从负面来看，如果对传染病不能很好控制的话，则任何一个传染病的爆发都会对消费、投资，甚至外贸造成很大的冲击。就像这次 SARS 一样，造成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至少使宏观经济增长放慢，这是负面影响。从正面来讲，如果公共卫生搞好了，环境搞好了，疾病减少了，尤其是穷人身体健康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这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整个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很大的。

宏观经济搞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让人们福利提高，让人们身心健康。政府可以通过搞好公共卫生，提高人们的福利和健康水平。

21:37:04 赵 晓：请进一步分析一下 SARS 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21:38:43 海 闻：我们在 4 月 20 号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影响很大，刚才网友也讲到，是因为我们的报告相比之下是最负面的，提出 SARS 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 GDP 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到目前为止，

人们认为我是最悲观的分析。随着 SARS 逐渐控制，有人提出来，你们的预测是不是不准、或者说是错了？我现在就要讲几点。

第一，我认为我们的预测仍然是正确的，其意义不是到底在于几个百分点的问题，而是第一次在方法论上和前面的许多预测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之前的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投资银行，他们的预测基本上当时都说影响比较小，甚至说没有影响，他们根据的是以前的数据，尤其是 2003 年 1~3 月份的数据来进行预测的。这个预计有一种时滞、时间上的差别。因为 SARS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 3 月份没有显示出来，在 4 月下旬才显示的。而我们当时用的数据，是现场调查的，是及时的反映了当时 SARS 对中国经济的尤其是对北京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区别。

第二，在方法上，我们不像通常人们在估计 GDP 的时候，总是从生产角度考虑。这可以说是我们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特点，老是考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生产量，有些东西可能生产出来了，但是它可能成为存货。而影响 GDP 的，在市场经济里面，最主要的是总需求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就是恰恰抓住了 SARS 对总需求的几个方面的影响，来看对 GDP 的影响。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SARS 对消费的影响，SARS 造成了人们正常活动的一种停滞或者缓慢，除了旅游以外，很多的正常的活动，都暂时停止了。那么，我们就根据北京市和全国旅游以及旅游相关产业下降的具体数字，来估计对消费的影响是多少。主要是三块，一块是境外的旅游，就是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的商务活动，这一块的影响，一直会延续到第三季度。第二块是黄金周，黄金周的取消，使得整个中国的这一段时间的餐饮业、交通等损失近 200 个亿。第三块是由此影响了今年暑假的旅游，又会有将近 300 个亿。所以，我们从实在的损失当中计算出来，旅游和旅游相关的产业，包括交通、银行、铁路等等，全国将减少 1400 个亿。消费的损失、需求的下降，它还有一个乘数效应，因为这些行业的损失，也会减少对其他产业的消费的下降。我们用非常保守的乘数 1.5 来推算，得出结论中国国内外旅游合计损失 1400 亿元，加上间接影响，对经济的影响总额为 2100 亿元。因为中国的 GDP 是 10 万亿，所以 SARS 将影响中国 GDP 少增长 1~2 个百分点。这其实不是推测，而是根据实际数字所做的分析。但是有几个前提必须讲清楚。这是一个静态分析，我们假定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也不考虑其他的情况。如果政府针对这些情况采取了其他方面的措施，那么最终的下降不一定是两个百分点。

赵 晓 VS. 海闻、胡鞍钢

21:47:57 海 闻：我们也还没有考虑到投资的影响和外贸的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的分析还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分析。这个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SARS影响GDP是一个百分点还是两个百分点，而是希望从政府到老百姓都重视SARS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要再盲目乐观。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尽可能客观地反映SARS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使政府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能对症下药，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另一个，我觉得有必要调整老百姓的预期，出了问题就是问题，经济放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整天硬对硬。当初我们也觉得SARS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恐慌。对经济的问题，与其过分乐观，不如把问题看得更多一些。很多人批评我们的预测，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来批驳，这是不对的。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和增长，我们也很有信心，但长期的健康增长，并不等于短期不会出问题。

21:48:15 赵 晓：刚才您的估算里面，没有考虑外贸的影响，如果考虑广交会以及其后的外贸损失，您的结论会进行怎样一个调整？

21:49:17 海 闻：如果要考虑外贸影响，那么负面影响会更大。因为外贸的影响不是在这两个季度反映出来，而是在第四季度，甚至到2004年的GDP反映出来。最近洛杉矶就有记者打电话采访，告诉我现在洛杉矶、加州有很多的零售商在订购圣诞消费品的时候，开始转向墨西哥，因为他们不敢保证中国到时候能不能交货。广交会是另外一个例子。有人寄希望于网上订货，但有很多的产品没有办法通过网上交流，比如说玩具，这是中国大量出口的产品，还有纺织品，玩具要看性能，还要看对孩子有没有危险性，还要对布的料子有感觉，网上谈不容易成交。目前来讲最主要的，还在于不能够保证到时候能不能把货准时运到。这不光有中国的问题，还有美国的问题，海关会不会对你进行更严格的检查？所以说，如果要把外贸这方面考虑进去的话，那么我觉得SARS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更严重。

21:50:52 海 闻：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正面的影响，比如说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影响总需求有4个方面：消费、投资、外贸和政府支出。如果政府增加1400亿的开支，我这样说当然是举一个例子，很可能就会抵消消费下降对GDP的影响。

21:51:49 赵 晓：那么，胡鞍钢教授您认为外贸对中国GDP的影响

有多大呢？

21:53:51 胡鞍钢：现在很难估计这个影响。这要取决于 SARS 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第二还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来重塑国际形象，恢复投资者信心。另外也取决于我们后面将近两个季度，半年多的时间，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刺激出口，或者是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我更感兴趣的可能还是在不同的危机阶段，可能采取的不同的目标和政策，这可能才是最主要的。如果我们假定进入到高峰平台期，那么，也很快会过渡到第四个阶段，所谓衰退期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着手考虑后 SARS 时代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一些长远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在 2002 年 12 月份，我和海闻教授也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关于公共卫生和宏观经济的研讨会。Sachs 代表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一个全球宏观经济和卫生健康的报告。他特别谈到了卫生问题、健康问题不能处理好的话，会影响全球的宏观经济。他也提出来，发达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我本人也在会上做一个主题报告，是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健康卫生的一个报告。基本思想认为，过去 2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是最快的，如果按照人均 GDP 增长率的话，达到 7% 到 8%，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但是反过来考察一些重要的健康指标，比如说人口预期、寿命，比如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相应进展还比较缓慢，就是说社会发展并没有成比例地相应的进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说明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对人口健康的投資，或者投資不足。我们引用了兰德公司 2002 年重要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对中国长期影响的有八个，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等等，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卫生健康问题。根据他们的计算和研究，如果你不能有效地控制艾滋病，或者其他传染病，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么深刻的认识，你没有对人口的健康进行投資的话，特别是农村的投资的话，你很难保持中国的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也是这次 SARS 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21:57:38 赵 晓：我们稍稍的回到技术层面。请问两位教授，如果没有 SARS，也没有政府额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你们估计 2003 年中国的 GDP 增长会是多少？由于有了 SARS，最终的增长又是多少？

赵 晓 VS. 海闻、胡鞍钢

21:58:17 胡鞍钢：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就是1978年到200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模型，是年度模型，不是季度和月度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大体认为，到2003年，可能是中国过去5到6年经济增长最高的时期。应该说是从去年的一季度经济开始持续性活跃，5个季度连续上升，估计如果没有SARS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在去年的8%的基础上，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达到9%~10%。对于SARS的影响，考虑不同的方案，是在一季度控制、三季度控制，或者年底控制，分别会对经济增长率有0.3到1.0个百分点的影响。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特别是外贸，像海闻教授谈到一些影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1.5%这样的人体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也就是说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实现7%的增长率的目标，如果弄得好的话，我们认为有可能在8%~9%。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SARS对中国经济影响增长有限，但对就业的影响要比我们估计的严重的多。2003年政府提出来新增就业岗位800万，去年是715万，如果没有SARS的话，我想新增800万岗位是有可能的。但是出现了SARS的影响，特别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四五个行业，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另外农民工从城里返回农村，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暂时没有得到，这样的话影响会很大。所以，我现在更关注的是中国就业问题。

136

21:58:30 赵 晓：我提供几个数据：河南农村出省劳务600万人，截至5月7日累计返乡89万人，其中从广东、北京、山西等主要疫区返回的占48%，江西422万出省务工农民中，截至5月8日大约25万人返乡，75万人停工；由于外出打工收入减少，至今全省农民人均收入已减少10元左右。显然，就业的影响不可低估，并且会进一步造成收入减少的影响，收入的减少会对消费造成进一步的影响，由此形成乘数效应。两位的预测有没有把这个因素估计进去？

21:58:58 海 闻：我不是搞宏观经济预测的。我没有预测2003年的GDP增长多少，我们只是估计SARS本身对GDP的影响。我们估计影响1~2个百分点。胡鞍钢教授刚才讲，SARS的负面影响可以严重到1.5%，跟我的预测是一样的。

一季度GDP增长9.9%，我认为是一个特殊情况的高。如果看这几年的宏观经济数，因为是同比，去年的第一季度在全年里面最低的，所以今年的第一季度和去年同比会显得高一些。2001年是第一

季度最高，然后第二、第四季度最低，低下来，去年是第一季度最低，然后再高上去。所以我认为，今年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全年也达不到9.9%，有不少人原来估计GDP增长8%，这倒是可能实现。出了SARS后，增长7%也是可能的。

我看到有网友讲，不应该假设。不假设怎么研究问题呢？分析问题总是要从一个面、一个面来分析，像解剖麻雀一样，这个因素造成什么影响，另外一个因素又造成什么影响。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太幼稚，有人说我没有考虑外贸因素，但在当时，SARS的影响刚刚开始，外贸因素还不明显，所以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个。我们讲，如果把外贸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情况只能比我们估计的更坏。所以考虑外贸后，SARS对经济的影响跟我们估计的方向是一致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不影响我们的基本观点。

22:03:03 赵 晓：据报道，春季的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44亿美金，而2002年春季广交会是124亿美金。人们估计如果没有SARS，成交额应该达到200亿美金才比较正常。考虑广交会期间的损失以及广交会之外的损失，我们估计二季度SARS使得外贸订单减少了200亿美金。仅此一项，就足以造成中国经济下滑1.5%左右。请问两位教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有何评论？

22:03:36 胡鞍钢：每个人的方法不大一样，模型也不一样。另外，我一般不做短期预测，我只是在特殊时期，比如说1998年，因为是大水影响，另外这一次有一些分析。做预测，第一，恐怕是和方法有关，第二，也和每个人的经验相关。最近我们也把一份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对中国的影响，在4月中下旬做了分析，给一个同行传过去。他特别讲到，对中国这种转型的国家，这么大的国家，可能有时候经验也很重要的。所以说，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不应该是一个声音，一个预测、一种看法，应该是多个声音，多个看法，这样给一个社会提供供大家来选择的看法。

但是，预测并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的目的是探讨采用什么方法下SARS影响更大，政府、企业、社会，包括公民能不能采取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正如很多人所讲到的，SARS的影响不光是经济影响，还对社会产生很多的直接影响。比如说，这半年或者这一学期，很多中小学生功课就受到很大的影响，耽误了。因此在4月24号，北京市决定要放假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让我们的孩子都在

赵 晓 VS. 海闻、胡鞍钢

家里去放假的话，是很高的机会成本。所以我建议，能不能尽快建立空中课堂。我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危机已经出现，损失是很大的，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能不能树立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看来，不仅北京建立了空中课堂，而且河北也建立了空中课堂，使一千多万中小学生受益。另外西安、沈阳、宁夏、河南等地方也建立了很多的空中课堂。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利用国家最好的师资，建立我们一直设想的空中课堂和空中学校，可以有效的整合全国的资源，来降低我们的一些损失，既包括经济损失，也包括社会损失。

22:07:28 植万禄：两位教授用不同的模型和方法，得出了一些结论，能不能请两位教授评论一下对方的方法？

22:08:37 海 闻：我觉得我们的差别在于，我们在分析短期影响，胡鞍钢分析的是长期影响。如果我们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总趋势的话，那么有很多发展潜力，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但是如果分析当年的GDP的话，我们讲的是短期影响，这两个必须要分开。第二个差别，对于短期影响，又有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因素就是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要分清主要是长期因素在起作用还是短期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们认为在今年对GDP影响主要是短期因素，而不是长期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为什么他那么乐观，而我们把问题看的比较严重，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上面提到的方法的区别。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只是最弹性的谈SARS对宏观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根据数据推算GDP的影响，做一个粗略的估计。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的方法很精确，可以精确到零点几。有的专家说0.2、0.3，我说误差还不止这些呢！我们的估计就是要让政府知道，影响总需求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而不仅仅是看到底出现了多少个GDP的增长点。在我们做分析时，整个经济学界几乎是一片赞歌，认为非典影响不了中国的经济，而我们认为4月份数据说明不了什么，5月份、七八月份可能更灵敏，或者到年底再看。对于SARS的影响，你还可以去问问司机、问问餐馆老板，问问航空公司，看他们是什么感觉。

22:13:08 赵 晓：很多人批评宏观预测，认为是数字游戏。其实，宏观预测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政策要根据

预测来确定。如果我们判断 SARS 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我们得出一套宏观政策，如果认为 SARS 对中国的经济影响非常有限，得出的会是另外一套宏观经济政策。请两位教授评论一下，你们不同的结论分别有哪些不同的政策含义？

22:15:01 胡鞍钢：我想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说是我的一个老观点，是保持它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稳健性，只做个别的灵活性的调整，在经济学上叫“相机抉择”。比如说我们原定的计划，就是 3 月份，两代会通过的 1400 亿的国债，现在还没有使用，只使用了去年的结余。在使用国债上，我觉得不要进一步扩大，只是现有的规模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就行了。比如，在 1999 年我们就向国家计委提出来，国债的投资不仅有硬件的投资，比如说大的项目，包括能源建设项目、水利项目，更重要的我们提出来要搞软件投资，所谓软件投资，就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包括饮用水、R&D 方面的投入。我们知道，国家在过去几年发行 6600 亿的投资，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我们也发现 6600 亿投资中，用于软件投资，所谓教育和卫生的投资的比例相当低。卫生方面只有 8 个亿，和 6600 亿不成比例。通过 SARS 这次冲击，在使用国债投资方面，国家要做比较大的调整，像软件投资，特别是对农村、对人的投入，这就包括一些中小学校可以更新，还有一些农村的卫生防疫站包括一些医疗设备可以进行一些更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近 50% 的人，不能饮用清洁的饮用水，那么饮水工程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过去的国债做了一些安排，我认为还不够。另外来看，公共卫生的含义还包括相当多的环境因素，根据有的科学家向我介绍的，我们很多的流行病、地方病，很大程度上还不仅仅是个人卫生、社区卫生，还包括环境明显的改善有助于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 1400 亿的投资，国债怎么用，现在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觉得宏观经济政策总的方向不要变，但可以做适当的结构调整，特别是要提高效率，使这笔钱真正的投资于人们的健康，投资于人们的教育，这是我的基本建议和想法。

22:15:45 海闻：如果确认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宏观经济就要对症下药。这次和一般的经济衰退周期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受伤害最重的是服务业、交通运输。因此，宏观政策的开支投入，就应该集中在这些行业里面，而不仅仅是像反通货紧缩时期的降低利息等手段，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做了，包括

赵 晓 VS. 海闻、胡鞍钢

通过免税，通过对受灾行业的补贴，这是和以往宏观政策的区别。除此之外，总体上还需要刺激宏观需求，增加一些开支，尤其是在公共事业方面增加开支，也会拉动其他方面的需求，如卫生、教育等等。还有就是在外贸上面的政策，也要对症下药，而不仅仅是出口退税。因为这次的外贸受到伤害，不是因为我们的价格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汇率问题，和1997年的金融危机不一样。1997年通过出口退税，降低出口成本，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是有效的，而这次出口受损是因为商业的活动的减少，人家害怕不能及时交货，是对前景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价格问题。所以，还要进一步仔细研究，才能够针对问题提出确实有效的政策来。

22:15:59 赵 晓：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已接近尾声。现在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SARS对中国经济，或者某些行业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22:17:08 海 闻：正面影响当然有。对经济的正面影响，一个是对某些行业，尤其是和卫生有关的行业，它促进了需求，也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发展。那么，还有就是对整个经济体制方面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除了政治信息方面的透明度以外，人们对经济体制方面的要求，也使得政府能够在增加透明度、信息披露方面也有所提高。

140

22:19:55 胡鞍钢：我想正面的影响主要有两点很突出。一个是危机是全面学习最好的课堂。因为大危机的时候，特别是健康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会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迫使我们必须迅速的学习，学习的效率最高。不光是政府的学习，也包括公民的学习、社会的学习、全体人民的学习。第二，重大的灾害、重大的危机，也孕育着重大的变革。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产生于重大的危机。比如说在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就源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全面的危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危机，才有了中国的改革。我想，通过这场重大的灾害、重大的危机，我们会全面重新学习，重新思考，来获取一个更大范围，或者说更大范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将推动中国发展或者说可持续的发展，一个健康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人们身体健康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GDP增长。

22:20:15 海 闻：补充一点，正面影响里面，还包括对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有所影响。那么，这次SARS以后，大家都认为政府在公

共卫生这方面重视不够，实际上引申了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当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重新认识。

22:20:29 赵 晓：根据最新的信息披露，以及刚才的热烈讨论，两位对于此前你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有没有觉得需要调整的？

22:20:41 海 闻：没有。

22:20:55 胡鞍钢：我也没有

22:21:07 网 友：海闻老师，看了您的分析报告，是不是也把 SARS 造成的精神损失计算在内？

22:21:33 海 闻：在经济学分析当中，我们还是分析有形的损失，对于精神上的损失，很难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心理影响会进而影响经济行为，但是心理损失本身没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

22:21:46 网 友：非典对经济影响的经济效益有一段时间才会显示出来，两位教授如何看待非典的滞后效益，它会持续影响到中国经济时间有多久？什么时候影响会消失？

141

22:21:57 海 闻：这个取决于 SARS 的控制程度，如果像现在这样，最多影响 2003 年的 GDP，或者是 2004 年初。但是如果 2003 年控制不好，或者 2004 年 SARS 再重来，可能还会影响 2004 年的 GDP。

22:22:16 胡鞍钢：我可能更担心的就是 SARS 这种病毒的特征，弄不好会使得有些问题长期化，就像艾滋病一样，当时不多，但是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威胁人类健康的问题。所以，无论 SARS 有效控制，或者有效控制之后，这个问题仍然是社会更关注的问题，仍然要采取有效的办法，使短期的事件不能够长期化。

22:22:29 植万禄：刚才两位教授谈到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问一下，正负影响的抵消作用会多大？

22:23:00 海 闻：我们只能分析正面有哪些影响，负面有哪些影响，抵消肯定会有，但是很难在量上分析。

22:23:53 植万禄：政府定下的 7% 的增长目标，会不会因为 SARS 而受到影响？

22:24:06 海 闻：政府定的 7% 的目标，是在没有 SARS 的情况下定的，出现 SARS 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结果仍然可能是 7%，政府定的 7%，也许没有 SARS 可能是 8.5%，但是因为 SARS 可能又回到 7%。我觉得 7% 还是很有可能，如果没有 SARS 的话，今年可能是 8% 或者 8.5%。

22:24:27 胡鞍钢：我的看法就是重申一遍，2003 年实现政府原来预定的 7% 的目标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原定新增 800 万就业岗位这个问题比较突出。

22:24:39 海 闻：失业率和 GDP 的增长是紧密相连的。

22:24:58 赵 晓：谢谢两位。我今天到我们的演播室来的时候，顺便问了一下出租车司机，他今天的营业额是多少，他告诉我说，不到 40 元。从早晨 6:30 出来，到晚上 7:00，上午拉了一个客人，下午拉了两个，我是他拉的第四个客人。我为他创造了另外的 20 元收益。

142

22:28:55 赵 晓：我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SARS 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仍然挥之不去。有人说“观一叶而知秋”，但是做宏观经济的人对这个话比较怀疑，你怎么知道你所看到的一片树叶能够代表整个秋天，而且你怎么知道你的观察不是错误的。因此，我个人很希望，我所看到这一片树叶仅仅是很片面的一片树叶，而不代表宏观经济的整体。

--开始时，我谈到，SARS 来临的时候，好比是“病来如山倒”，所有的人都承认，它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影响。今天我们的讨论也都承认了这一点，虽然对程度的估计各有不同。不过，我们可乐观的是，SARS 来临的时候，正是中国的经济往上走，进入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时候，另外，政府还有一些政策措施，可以用来冲抵 SARS 的影响。我们希望，中国 2003 年的经济依然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增长。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纵然黄金没有了，我们还能保住白银。

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场讨论中，我们将讨论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来克服 SARS 对于中国经济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也将讨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究竟有哪些。

以及它们在 SARS 来临之后它的演变趋势，我们还将讨论在整个中国经济的肌体中还有哪些漏洞，有可能引发类似于 SARS 的危机，为此该如何做好防范。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参与我们的讨论。

SARS 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赵晓博士在首场主持后，又主持了最后两场中外学者关于 SARS 考验中国的越洋对话)

赵 晓：今天是我们的“SARS 考验中国——中外学者网络越洋对话”讨论的最后两场。第一场是“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将在上半场讨论这个话题！第二场是“两岸三地共话抗萨启示”。上半场邀请到了林毅夫教授以及连线嘉宾刘遵义先生，Albert Ma 先生以及 Warwick McKibbin 先生。关于几位嘉宾的简介可以在网上找到。开门见山，首先问一下林毅夫教授，我们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它的标准是什么？

林毅夫：现在在国际上有一个共识，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一代人的生活的增加、福利的增加和物质的增加，同时也保证下一代人至少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

赵 晓：可持续发展除了经济方面，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林毅夫：包括我们的环境和可用的各种自然资源。

赵 晓：我们现在的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吗？

林毅夫：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内，经济的增长非常快，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的灾难的发生也是频繁的。除了这次 SARS 的冲击以外，20世纪 90 年代我们国内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次我们都说是百年一遇的，北京的去年和前年都发生了沙尘暴，这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从物质的增加来讲是确实可观的，但是和我们共处的环境，确实有很多不太完善的地方，而且似乎有不少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不仅要重视我们的数字，不仅重视我们的速度，而且要有质量。这

赵 晓 VS. 林毅夫、刘遵义

个质量包括生活的质量、环境的质量。我们的未来要有更多的生活空间。

这些自然灾害，这几年我们处理得不错，这跟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实力的提高有关。但是药再好，固然能够治病，也不如身体好。因此，这次 SARS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审视和反思一下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让我们在未来的更好的发展。

赵 晓：SARS 暴露出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中还有哪些问题？

林毅夫：我们看到的 SARS，首先它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有点延误了。本来二三月份如果能把它控制在广东的话，可能影响就会小多了，但是当时我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不充分。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 SARS 是新的病毒，大家都不知道，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一个冠状病毒，当时不知道怎么控制。但是，从这次的经验中，可以有一些反思，一个反思就是很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系统，当出现一个新的疾病的时候，能够很快诊断、能够运用国内和国际的资源确定病因而采取获得措施。第二个，我们有比较好的应急系统。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加，人员流动的增加，各种疾病出现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不仅是传染病的出现，还可能包括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国外的冲击也可能发生在中国。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准备，我们很有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应急系统。这个应急的系统，应该是有权威的，有统一指挥的，而且是有财力保障的。当出现危机的时候，马上启动这样的应急系统。这次我们主要依靠行政，有点就事论事的方式。

赵 晓：行政方式是现在，现代化的应急系统是未来？

林毅夫：可以这么说。当前搞行政方式为不得已。整个的状况，必须有中央的最高决策，中央的决策在前，因为应急系统不完全。如果我们有正常的保障程序，在必须的时候就会好多了。第三，必须加强我们的行政的有效性。如果有正常的保障程序，出了问题就会好多了。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应急系统，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把危机控制住，有时还必须全国动员，就是说全国的行政系统的有效性就很重要。这一点上，我们国家是一个强项，这个强项我们应该继续保持，甚至更加效益化。最后就是全体的，整个社会的经济的质量的提高。

植万禄：我想请问刘遵义教授，这次 SARS 的发生，有没有使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基本面受到影响，如果有的话，如何修整？

赵 晓：刘教授回答以前，我先问一下，刘教授的可持续发展观是否和林教授一样？

刘遵义：SARS 这次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教训，这里面会和可持续发展有关，一会儿我会提到。

林毅夫刚才提到，信息的及时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次 SARS 出来，确实就是林毅夫讲的，反应稍微延迟。从长期来看，要有多个独立的渠道信息系统，现在是依靠单一的渠道来讲，风险太大。其实，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把每一个省的 GDP 成长率加权平均，比他自己本身要高 200 个基本点。因此，必须要有多渠道的信息。还要有及时的多渠道信息。这次为什么稳定不下来，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单一的渠道，这样不太可靠。

再就是信息的分享交换。比如说广东和香港，能够交换一下他们的经验的话，可能香港的医护人员的感染就会减少很多。在中国医护人员的保护很好，这个经验应该早点分享。

第二点就是危机处理的问题，我想也很重要，一定要有准备。这一次，中央政府处理得很好，处理得成功。SARS 就中国来讲，在北京，目前也算很低了。但是，意外很多方面都有，可能是大水、可能是采矿的事故等等。一定要有一个常备的应急处理的队伍，比如说医护队，有什么事情发生以后，可以派他们去，这样就很快能够解决，比如说这次隔离的任务。像北京这么大的地方，整体隔离不需要，但是一些地方怎么隔离，需要有应急的措施，要早一点做。

第三，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系的，主要的病源的传染是外部效应，就是说假如我感染了，我传染的几率就会增高，别人的感染率也增高了。外部效应不能经过市场来解决，一定要通过计划来解决。在这之中教育是不可免的，大家应该提早知道，知道怎样避免非典，这样传染就会慢下来，可以说越早教育越早知道就越有效。这和持续发展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很小心，不随地吐痰，把基本的卫生习惯能够改变，自然自己的感染的几率减少，自己的几率减少，大家感染的几率就都减少了。所以，需要一种教育、一种信息，让大家很快的知道，大家要有一种功德心，要多为他人着想。比如说隔离的时候就应该隔离，我知道我曾跟感染的人接触就要接受隔离，这比强迫隔离有效，但是最后还是要政府进来才会隔离。我想 SARS 之后可持

赵 晓 VS. 林毅夫、刘遵义

续发展，很重要的在于外部效应，就是说市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政府来紧急处理。

赵 晓：好。下面我们来请问 Warwick McKibbin，您对 SARS 带来的后果，包括对中国的经济所带来的后果怎么看？您是否同意我们应处理和应付好公共危机，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想法与建议？

Warwick McKibbin：我确实非常赞同刚才刘教授所说的一些观点。SARS 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种大的程度可能超出了大家的预计。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人被感染，而且有很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第一条，对一个经济体来讲，疾病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不光是一些医疗的成本，比如说照顾病人的成本，然后再乘以你必须要照顾的病人的数量，就可以得出你的整个的成本的费用，疾病还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以及对于整个经济体的信息的影响，都会受到打击。有很多疾病都会影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SARS 和艾滋病相比，是一个更小的威胁。疟疾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也是非常严重，比 SARS 要严重得多。即使每年从中国南北来的一些流感的感染都会带来一些巨大的问题。所以，有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首先，中国需要在公共卫生体系上作出大量的投资，所有发展中国家也都面临这样相应的问题。除此之外，工业国家也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疾病威胁方面作出大量的投资。所以呢，需要重新审视政府所扮演的作用。在开发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世界面临着一个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光是疾病的爆发，是全球经济体中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作出反应。在面临 SARS 这样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时候，有效的风险管理一般来说就意味着要收集信息、透明度和开放的态度，以及发展出一些措施来具体应对。

中国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上各国越来越彼此依靠，国家之间确实需要进行合作，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WHO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象征着应该进行的这种国际上的合作。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要花几百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因受各式各样的疾病的影响而丧失生命。所以不应该等待。我们需要国家之间更好地进行合作，现在就开始这样做，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

赵 晓：我们把问题转向 Albert Ma，您对刚才几位教授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Albert Ma：我觉得，刚才教授的发言都是非常有见地、非常有用的。基本上来讲，长期看来，SARS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促进中国和其他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考虑医疗保险、公共健康、公共数据的收集等一些非常基本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政府的作用在制定政策和发展政策中都是非常重要的。SARS 也证明了外部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是任何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疾病是在人体之间进行传播，尽管大家同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疾病在传播。这种外部的影响也会逐渐极大地传播给其他的人、其他的国家，政府的干预是必须要有的。

讲到有关的政策，比如说信息收集，看起来是引起了人们最多的关注。我们大家都赞成，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政府在收集发散数据方面，执行政策的时候要非常谨慎。

SARS 的影响，还主要因为人们的心理上的恐惧、担心以及它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确信，早期的政府干预是非常必须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处境就会好得多。但是，我们在 6 个月、8 个月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来猜一下医疗卫生工作者他们的头脑中想的是什么事情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数据，我们就更好地可以为未来做准备。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免所有的错误，就是一点错误都不犯。尽管我们在数据的收集和散发方面，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努力，但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政府需要收集的信息必须是可靠和正确的。不同的政府，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来收集数据，但是，必须要确保收集数据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可靠的。我想，各国政府的目标都是要实现这一点，就长远来看，在任何公共卫生体系中，都要有一些必须的基础的构架。

尽管我此前一直在呼吁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市场的因素，如果市场被允许进行发展的话，它可能能够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我们都应该知道，市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随着收入的增加，公众就会自然要求健康保证。所以，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增加的因素也会做出自己的反映。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各区政府的这种交合作，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来补充一个完全的纯粹的市场卫生体系。

我现在来总结一下，我想，SARS 证明了政府的干预是非常重要

赵 晓 VS. 林毅夫、刘遵义

的，它同样也证明了正确、高质量的信息的重要性，它也向我们显示，应该考虑公共卫生的政策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要把公共卫生的政策放在一个广泛的角度来思考，谢谢。

赵 晓：刚才几位教授都同意在对付 SARS 这样的危机中，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我想把它归结为政府的一种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不是只意味着政府管理？民众和市场在这里面能起哪些作用？

林毅夫：我想因为危机发生的时候，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全社会采取一个统一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是只有政府有这个权威。因此政府管理必须起到主导的作用。但是危机管理要有效果的话，还是必须整个社会的群体能够有一个共识，能够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做出必要的调试，所以我想这是两方面的互动，而不是只有政府。

赵 晓：请问 Warwick McKibbin，听说您做了一个关于 SARS 影响中国的经济的报告，主要结论是什么？

Warwick McKibbin：我们研究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因为在估计这种影响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希望能够将 SARS 的冲击的性质进行不同的分类，来分析一下它们对于消费行为、对全球公民的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在供应成本增加方面的影响，一些特定的高风险行业的成本的增加的影响，比如说对旅游业的影响、酒店业等等的影响，最后我会看一下 SARS 对一个国家的风险溢价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不确定性的影响，看看这个国家如何对 SARS 进行反馈。我们一般的估计就是对中国来讲，中国的 GDP 增长今年会下调。我们认为要下调 2.4 个百分点，差不多会是这样的数字。如果这个疾病不能快速地得到解决，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更悲观的情况，带来更大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这个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对这个疾病的认知也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有人会想，SARS 到底是一个疾病的爆发，还是说意味着未来可能会有几种疾病的发生。谢谢。

林毅夫：我对这个问题也发表点意见。刚才 Warwick McKibbin 教授说，按照他的某些分析，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 2.4 个百分点，如果控制的时间延长的话，可能更悲观。我想这相比于中国国内的普遍认识是高估了一点，国内普遍的认为 SARS 是短期的影响，当然对餐饮业和旅

游业大一点，同时我们看到 SARS 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被控制，而且下降的速度比世界其他的地区下降速度还快，也没有蔓延到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很快会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比较统一的认识是，SARS 的影响是一个百分点之内。

我也回答一下主持人植万禄先生问的，SARS 对中国的基本面有没有影响？就是说从长期发展来说没有影响，从这方面来看，SARS 是一个疾病，是突发性的，比较大的影响是心理。SARS 感染的人数非常少，所以一旦控制住，对我们的物质生产力，不管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没有影响，同时对我们的生产组织也没有影响。所以至少从生产方面来讲，基本面不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一些心理性的，在国际上对中国的形象上面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谅解，后来我们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作出决定以后，包括我们的胡主席和温总理，做了很多非常有效的工作，我想在国际上形象有相当大的挽回。

Warwick McKibbin：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 SARS 疫苗还没有研究出来之前，SARS 可能和我们长期相处。SARS 还可能和气候有关，明年春季的时候，会不会爆发局部性的 SARS，局部爆发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必须要有估计。尤其是国际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地方，对公共卫生体系方面，还不是特别的有信心。我们知道，北京 2008 年主办奥运会，如果说我们对 SARS 的病情，明年如果再复发，后年再复发，没有很好的控制，那么对我们的国际形象的影响可能会大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方面我们要对可能重新爆发 SARS 有心理准备，能够很快地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在国际上改善我们的形象，这包括我们政府做一些工作，社会各界做一些工作，包括我们请一些国际上有经验的在危机之后重建形象方面有贡献的公司的帮助。

刘遵义：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林教授讲的，第一我觉得 Warwick McKibbin 教授太悲观，我自己测算出来的结果，就是 SARS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 2003 年应当在 0.5% 到 1% 左右，不会超过 1%。所以，2003 年中国的增长率，应该还可以达到 7%，或者 6.5% 到 7% 左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 SARS 会不会再来，再来怎么办？这方面有两点，第一，现在大家都有很多的经验，即使它再来，也有应变能力，能够很妥当的处理，知道怎么样隔离和保护医护人员，怎么样治疗等等，这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建立了一个机制，大家对个人卫生和公

赵 晓 VS. 林毅夫、刘遵义

共卫生很小心。这个应该继续鼓励，不管是 SARS 也好、流行性感冒也好，大家对个人的卫生，将会是很注意的。

赵 晓：按您的估计，SARS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如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大？

刘遵义：对。因为 SARS 的影响，可以说是短期的、是一个很短期的，没有一个永远的影响，应该会比金融危机的影响要低很多。

赵 晓：不仅如此，如果我们通过 SARS，在公共卫生方面建立一套机制，而且在应急方面建立一套机制，今后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好处。

刘遵义：对。Warwick McKibbin 也讲了，危机里面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的话，对以后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大家有信心，会很妥当的处理。

赵 晓：我们把两分钟的时间给 Warwick McKibbin 做回应。

Warwick McKibbin：我同意刚才关于对于 GDP 的增长速度的影响是 1% 左右的观点，在我的研究中，我把我的研究和中国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短期的影响集中在对于国际资本的流动上，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如果一定要把它明确的量化出来可能是 1.4% 左右。但是这种预测还是一个非常初步的预测。关于中国是否能够应对未来的这种疾病爆发的问题，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也得到了很多的教训，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来有可能出现各式各样其他的疾病，政府在进行监管方面必须非常的警惕。

赵 晓：我再问一个问题，全球化对危机、以及危机的管理、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林毅夫：我想全球化代表各个经济之间结合的很紧密，人员的来往、物质的来往、资金的来往更紧密，在一个地区发生了危机，很容易传播出去。而且全球化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活动量增加，这本身也是增加危机的产生。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带来的好处，也必须对它的危险有所准备。一方面是国内外

己，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应急体系，另外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很多方面需要国际的合作。

赵 晓：关于国际方面，我们请教一下 Albert Ma 先生，发达国家对付像 SARS 这样的危机，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

Albert Ma：与 GDP 增长速度不同，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关于公共卫生的问题已经被提上来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不是一两年能够完成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很多财政方面的支持，采取一些预防药物的研究、开发这些产品、药品、医院以及其他各种非常复杂的因素。在我看来，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来说是不合适的。在建设这样一个体系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在未来别的传染病发生，我非常担心这个处理 SARS 的危机的经验是否能够马上被用来处理另外一个别的危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因素，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公共卫生体系，最重要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交接面的处理问题。非常感谢。

赵 晓：关于危机的管理，我听到这么一个比方，好比说有一个杯子在桌上，最好的办法就不要让杯子掉下来；第二种就是当它掉下来的时候，尚未接触到地面之前，把它托起来；第三，就是杯子在地上已经摔碎了，但是我能够拿出另外一个杯子来。我想问一下，我们对危机的管理，应该是怎么样的—种方式最好？中国目前在应付危机方面，各位认为，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

林毅夫：我想我们在应付危机上面，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是危机意识不够。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国内在经济不发展的时候，各个地区的来往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碰到象 SARS 这样的新的危机。再比如说国外的金融危机经常发生，而我们不是这样。这样，社会上对危机的意识不够。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就是过去的准备还是不够的。所以我想，这次在 SARS 当中应该吸取教训，在现代化的社会当中，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危机，如果我们的意识很好，能够做一些准备，“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将来危机处理就会很好。

赵 晓 VS. 林毅夫、刘遵义

赵 晓：请四位教授对未来中国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做一点预测？

林毅夫：当然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卫生方面，而我个人关心的是金融的问题。

刘遵义：我其实觉得，大家都觉得最大的危机是金融方面，是银行的坏账。不过我倒是觉得，那种危机是能够处理的、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我想，最大的危机是在政治方面。两岸关系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是最大的危机。

Warwick McKibbin：在这方面，有一些危机可能发生，我们可以想像比如说北朝鲜的危机，关于台湾海峡的一些危机，甚至一些气候方面的，由于全球变暖而产生的危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危机。我们在预测下一个危机的同时，我认为更有效的是建立市场和政府互动的良好机制来应对危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从澳大利亚的经历得到的教训。

Albert Ma：我认为最严重的危机可能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当 SARS 出现的时候，大家受到很大的影响，政府和人们都作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在某些领域，这些灾难是在重复发生的。很多情况下，危机发生的几率太多。如果大家都没有医疗保险，这种危机还会重新出现。这是危机最为可怕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我们建立一个体系就比预测将来的危机更有用了。

网 友：在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时，如何考虑应对突发状况，在执行可持续发展规划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与规划相左时，该怎么办？请林教授回答一下？

林毅夫：我想规划是长期的，危机是短期的，当然危机出现的时候，处理短期的危机是优先的。如果这种情况下，平常我们有危机处理的准备，就会比较好。处理原则是比较明确的。

赵 晓：关于“SARS 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这方面的讨论，现在到此为止，我希望我们所讨论到的危机，尤其是四位教授所预测的危机，不会真的在中国爆发，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网友在我们的

讨论中提了很多的问题，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在另一场的讨论中提问，谢谢。

两岸三地共话抗萨启示

赵晓：现在我们进入下一回合的讨论。在上一场的讨论中我们谈到，对付 SARS 这样的危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国际性的合作。首先，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是两岸三地的合作。我们先请林毅夫教授谈一下他的观点。

林毅夫：这也是 SARS 对我们的启发。两岸三地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往来、渊源的往来、物质的往来是非常多，两岸三地是一个越来越紧密关系。SARS 开始的时候首先是在广东，很快就传播到中国香港地区、广东，确实对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个影响过程中，我们发现怎么样面对这种危机。三方面在经验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中国内地有它的优点，香港特区有它的优点，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它的优点，很多事情可以互相地帮助。我希望 SARS 危机发生过后，彼此的合作能更加加强。

赵晓：人类从亚洲到达美洲，不知道花了多少年，但是今天的人类要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坐飞机一天之内就可以。我们生活的地球已经变成小小的“地球村”，两岸三地更是如此。雷先生，你怎么看两岸三地的合作？

雷鼎鸣：我觉得互相合作非常的重要。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危机，在不同的地方，像洲从 1376 年开始发生黑死病。为什么会发生，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当时交通已经发达了。据很多的历史学家考证，黑死病当时的源头大概在中国的云南一带，因为蒙古人的马跑得比较快，他们跑到云南以后，他们有可能把这个病带出去，当时不光是影响欧洲，也影响中国。所以这个问题的影响千万不要小看。SARS 开始是从广东开始，但是香港闹得很厉害。而且香港是交通的中心，所以通过香港，也通过航班传染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在两岸三地，在合作方面，我觉得，第一大家要互相的通气，大家可早点提高警惕，互相的传染的机会就会比较减少一些。

赵 晓 VS. 林毅夫、雷鼎鸣、周济

赵 晓：请周教授介绍一下台湾省最新的 SARS 情况。

周 济：台湾地区的 SARS 疫情现在下来了。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还算好，大概有 1 个月的时间平稳，件数不过是三十几件。但是到 4 月下旬以后，因为和平医院爆发院内的感染，所以一下子看起来比较严重。这种情形，一个原因可能是上层当局跟下层当局在协调上不是很顺利。另一个是医院对 SARS 的病患短时间内他们没有看待正确，所以引起了比较大的感染。第三方面，就是民间，一般的老百姓对是不是感冒，有没有病患，自己也不晓得，也不知道怎么处置。所以，在这三方面，台湾地区开始比较乱。但是这个问题到 5 月下旬就下来了。最坏的情况可能过去了。

赵 晓：SARS 危机对中国台湾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周 济：对台湾地区的影响，最主要是服务业，目前我们看对服务业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种东西对服务业的影响，如百货公司、旅行、航运等等影响都非常大。所以，在第二季，我们民间的消费可能会减少两百亿新台币，这个数字将相当大，第二季的民间消费是负增长，但是 GDP 仍会有一定的增长。

154

赵 晓：下面有请 Deepak，他是两岸三地之外的独立的第四方，请他对两岸三地的 SARS 的情况，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的表现，简单地做一下评论？

Deepak：非常感谢。关于 SARS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们之间的互动的关系，SARS 对于人际往来非常重要的行业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这就提高了人们之间的焦虑的程度。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SARS 并没有导致生产方面的下降，而是导致了消费的下降，我们必须认清这种现象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在危机过后情况会好转，更何况现在即使人不出去也可以在家里决定是不是买房子。服务业、酒店以及旅游业受到影响，这样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因为他只是公民短暂的采取的一些措施。

在合作方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合作，我指的是两种办法应对这方面的危机，一个是一些现存的多边合作的框架，这些都是一些长期的干预，都是一些现存的机制在促进合作。在 SARS 方面，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方面，或者说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在这方面的合作

并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可以使我们重新开始来应对这些危机。对这些问题，可以由政府和医疗工作者来合作，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了解 SARS，你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危机可能会很快的散播，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国际社会需要了解信息，国际小组需要有一些要求，要求每个国家来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希望要有最好的专家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之间要合作，为什么会有超越国家之间多边合作。目前这种合作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但是我相信，很快在内地、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之间会建立这样的网络，来增强大家的意识，减少应对危机的时间。

雷鼎鸣：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很多的好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流必须增加，来充分的避险。我们也不应该有一个瘟疫，就把全球经济一体化排斥。刚才 Deepak 博士提出一点，我也很同意，就是 SARS 对经济的影响还是暂时性的。不过，如果我们将对瘟疫冲击做得不好，影响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对经济的打击相对来说是很大的。我们在香港地区，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二季度，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在第一季度，香港的 GDP 只上升了 1.5%，这还算不错的。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消费者，他们都不太愿意去消费。对这方面，长期来说，中期和长期来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不去消费的话，时间长了自然还会出来消费。但是对旅游业的打击，要很长时间才会恢复过来。

赵 晓：两岸三地在抗击 SARS 方面，各有什么方面值得学习？

周 济：这次 SARS 的疫情一来，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和过去的想法有一些不一样，就是说像 SARS 这样的一个病，到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地医治。从流行病医学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个病毒隔离，这是短时间有效的防治的办法，但是隔离也不能造成不能合作，只是对患区的隔离。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学到，第一，因为要把这些患病的人隔离，所以需要有充分的资讯，这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些病人隔离，给予很好的治疗，康复的机会会增加，其他的人就能避免受传染。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毒，逐步缩小范围。这样的一种概念，可能是我们从这次 SARS 对我们的冲击可以学到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就是说资讯的交流是最重要的一点。

赵 晓 VS. 林毅夫、雷鼎鸣、周济

赵 晓：您认为中国内地可以从台湾地区学到哪些好的做法？

周 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SARS 一来，台湾地区一开始做得不错，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问题，到最近也都把它解决了。有一点，可能和中国内地或者香港特区比较不一样，它目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问题一来，大家的意见就相当多，怎么样去整合花了一些时间。但是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以后，做起来效率也不会太差。

赵 晓：雷教授，您认为中国内地从香港方面可学到些什么？

雷鼎鸣：中国内地从香港特区学一些东西，香港特区也从中国内地学一些东西。香港特区表现出来的优点，资讯比较发达，因为它报道的 SARS 的情况非常多，毕竟它也比较流通。总的来说，SARS 发生的时候，传媒有很好的通信。中国内地在这方面也有经验，在某些方面比香港特区好。在开始的时候，在北京 SARS 的情况，有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可能也是隐瞒，但是中央政府真正地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做得就很快，而且非常地果断，反之，香港特区政府就做的比较慢，所以在危机管理方面，其实我觉得反而应该从中国内地学到不少的东西。

156

赵 晓：一个强大的政府在中国经常是处于受批评的地位，但是我也碰到过印度的学者，他们非常羡慕中国的强有力的政治。我想问一下林教授，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我赞同雷鼎鸣教授的说法。当内地政府对一个事件采取措施的时候，行动效率非常高。同时这一次非典危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动员能力也非常地强，不仅是政府，而且是从城市到乡村到农户家都非常强。内地在这一次处理非典危机方面，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如果说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尤其是考虑到未来，那么随着全球化以后，可能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更多，更重要的是制度化的东西、法律化的东西。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出在什么地方，我们马上知道地方政府有什么问题，及早的把危机消灭在第一时间，可以让它对社会的危害，对两岸三地，或者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危害小一点。

赵 晓：请教 Deepak，抗击 SARS 这样的危机，其中有没有一个经

济问题，有没有用最小的成本来抗击危机的问题？

Deepak：我想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和内地，都会有重要的经验教训来告诉我们如何在经济层面考虑应对 SARS 的危机。SARS 发生的时候，在商业周期三地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内地第一季度增长非常快，政府的收入也增加的非常的迅速。这样的话，在融资应对 SARS 方面比较容易。但是在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他们的 SARS 发生的时候，局面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经济本身就不是很景气，所以在资金方面比较有限制。但是所有的这三个经济体，必须把这个疾病看做暂时性的问题来解决。比如说在中国内地，SARS 可能会扩散并存在一段时间，开始永久的影响中国内地的经济，这是长远的估计，但是短期来讲，我们现在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该确保 SARS 不会对中国的政府支出带来一系列巨大的增长，政府的决定必须是暂时性的，因为 SARS 的影响，也应该是具有当地性质，政府的措施也应该是具有当地性的。比如，对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来讲，如果没有被 SARS 影响，就不应该受到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恶劣的影响。再比如说，中国的旅游业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政府作出一些特别的支持，但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必须确保不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的改革的措施。

赵 晓：林毅夫教授，对付类似于 SARS 这样的危机，您认为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经济有效的方式？

157

林毅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一次中国内地方面，是靠行政系统的动员很高效，但是行政系统产生的动员高效以后产生几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时候停止，我们从政府的激励机制来看，过去有一些隐瞒信息的行为，就是说一个地方爆发了危机以后，爆发了 SARS 疫情以后，可能会影响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可能影响这个政府官员的政绩，所以有隐瞒，但是现在这套系统动员起来，我们知道 SARS 目前还没有疫苗，所以总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如果复发的话，在目前的高度的行政动员的机制下，他们怕复发，就会把各种隐秘的措施持续的时间太长，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就会大。所以我用行政手段有高效，但是也可能有负面作用，所以我们最好是有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这样靠一定的法律依据，而不是靠行政命令，靠专家决策，而不是靠行政的判断，这样我们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会高效，付出的代价会更少一点。

赵 晓 VS. 林毅夫、雷鼎鸣、周济

赵 晓：我们对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是否有一整套综合指标，而不是光靠 GDP。

林毅夫：对。我们应更多考虑可持续发展，这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就不只是增长的速度而已，还有增长的质量。今天早上我看到网友谈到，怎么平衡这两种关系，不能为了增长牺牲环境和牺牲质量，但是也不能为了质量而牺牲增长，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动员的能力和解决危机的能力更小。所以，这方面，对官员的考核，我觉得应该采取比较全面的指标。我们谈到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里面，有增长的目标，也有环境的目标、健康的目标、收入分配的目标、也有社会和谐的目标，这些都应是一个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

赵 晓：请教一下雷教授，香港特区政府是如何考核官员的？

雷鼎鸣：香港特区政府考核官员，要看他当年的表现。对比较高级的官员来说，他们其实也受到大众传媒的监督，就是说，假如某些官员做的政策不受欢迎，受到批评的话，他们将来的前景，他们的升级也会有一定影响。当然，SARS 发生以后，也有不少的官员受到一些批评，甚至特区政府过去的表现也受到批评，不过整个特区政府对处理 SARS 的过程是一个延长的过程，结果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158

网 友：全球化是否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风险的增加？

赵 晓：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全球化一方面带来了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收益，那么，最终的结果，比如把收益和风险相比较，是风险增加了，还是收益增加了？

林毅夫：肯定很明显，一定是收益增加了。其实在这次的 SARS 危机当中，在短短的 1 个月里面，就把非典病毒是什么病毒确认出来。不仅确认出来，连整个的 DNA 的排序都确定出来。这靠全世界的医疗人员，所有人员的合作。如果没有全球化体系的话，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讲，确实像前几场分析里谈到的，全球化的经济增了人员的往来，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往来和经济的发展本身都会带来危险，但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我们的物质的基础，带来了动员我们全世界的力量，来解决一个危机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化的方向我们还是必须坚持的。

网 友：危机的处理必然是突发式的，即使有一些预料，也不会是程式化的？

赵 晓：我们想要把危机制度化，可能是有一点难度。请周教授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周 济：危机到底从哪里来？怎么样，每一次都不一样，而且我们也很难知道。我们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危机，可能依赖于平时大家是不是比较有危机意识的状况。中国内地可能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快。刚才林教授也提到了，在行政方面内地做得到雷厉风行，但是如果长期来看，可能法制化还是比较重要。我们以美国的例子来看，他们9·11事件的发生，造成了很大的损伤，但是他们能够马上产生共识，这样在处理上也比较快。所以有一套合理的机制，可能是我们以不变应万变的可行的办法。

网 友：如果中国没有加入WTO，这次危机的打击会不会更严重？

周 济：中国有没有加入WTO，对SARS的影响不大。刚才林教授提到的观点我同意，其实SARS发生以后，有一阶段，我每天都看国际上的一些医疗资料，某一个地方有一些新的医疗方法或者一些新疾病发生以后，差不多1小时以内，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所以全球一体化，我觉得增加了大家互相研究、互相交流的机会。现在信息发达，对于疾病也可以解决的更快。所以我不太担心，中国加入WTO也好，全球一体化也好，不会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网 友：请问林教授，政府在处理或者管理危机的过程中，它的权限的边界在哪里，是不是因为出现了突发性危机，政府就应该加强其权力？

林毅夫：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法制的环境，就是说要有法律根据，在法律的根据之内，政府依法行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SARS危机之后，政府快速的通过几个行政立法机构，我想政府也认识到，必须往这个方向来走。

网 友：Deepak先生，在SARS之后，您怎么看亚洲经济的前景？

Deepak: 我觉得，亚洲经济的未来主要是依靠于中国。因为中国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是这么的强大，从中国今年的增长数字来看，亚洲将会继续复苏，步伐可能会放缓，但是它会继续的复苏。亚洲其他地区的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内部的重组，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种强大的表现，就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这种亚洲经济的前景。

赵 晓：关于两岸三地的合作，我们再问一下周教授，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周 济：我想两岸三地的合作在经济中，尤其是经贸的往来方面很重要，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内地这边成长的很快，吸引了很多的外资，市场也很大，所以，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都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这样的合作基础相当的好。但是如果能够互相体谅对方的处境，这样的话，我们的合作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将来。

赵 晓：除了现在已有的经贸往来，包括公共卫生方面，将来还可以从哪方面开展合作？

周 济：公共卫生方面，比如说内地过去有所谓的赤脚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地方的一些制度，也是这次能够让 SARS 不会散开的一个因素，这些都是内地的一个好处。再有就是卫生环境方面，可能也是这次 SARS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反省，有关环境、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论点，在这方面，两岸三地可以说都还有努力的空间。包括香港特区的禽流感，包括这次 SARS，人和动物过于接近的问题。两岸三地的往来非常的密切，不管香港特区、内地有什么动静，台湾地区都会受到影响。

赵 晓：请介绍一下台湾地区与 SARS 并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周 济：在台湾地区，很多的生物、病理学家，他们认为 SARS 可能类似天花、艾滋病这样一些病，可能我们要把它消灭或者可能一下子不见很难，对它的遏制不代表它会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可能也会再回来。所以我们如何跟 SARS 这种病毒共存，这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共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它的性质和传染管道，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避免受感染。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做法。

赵 晓：林教授，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当前的 SARS 危机，两岸三地在共同合作方面，还有哪些问题，将来还有哪些改进？

林毅夫：我觉得两岸三地，当然首先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合作是一个机遇，也是两岸三地在 21 世纪能够让中华文化复兴，让我们快速的进入现代化的一个机遇，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有能力来应对各种危机。当然，两岸三地，就像周教授讲的，我们来往这么紧密，在资金和产业链的合作非常的紧密，我们需要更有效的对话机制，来解决现在存在着的一些分歧。把分歧解决以后，大家的发展会更好。

赵 晓：请问雷教授，您认为两岸三地当前应该着力探讨的将来可能要对付的问题有哪些？

雷鼎鸣：在经济合作方面，加强合作是不应该改变的。但是，因为将来大家的来往会继续增加的，每一个地区都应该有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我举一个例子，在香港过去的禽流感，不光是影响香港特区，如果不是当时控制住，也可以传染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来往增加了。所以，香港特区一产生病毒的话，就有更大的传播。南方人爱吃野生动物，从负责任的角度讲，要改变一下。

161

赵 晓：问个轻松一点的问题，雷先生你也是南方人，你吃野生动物吗？

雷鼎鸣：我对野生动物很害怕，许多杀的，我不敢吃。

赵 晓：周教授吃过野生动物吗？

周 济：几乎没有。在台湾地区，有所谓的“生菜”，就是指野生动物。过去有，但是现在越来越少。我觉得经济越发达，大家的认知越多，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以后，对吃方面，也会比以前更讲究，但是不见得吃野生动物。

林毅夫：我肯定是要吃的，因为我吃的海鱼也是野生的，但是我不吃珍禽。

赵 晓 VS. 林毅夫、雷鼎鸣、周济

Deepak：我只吃一些不食肉的动物还有一些走起来很慢的动物。

赵 晓：一手抗 SARS，一手抓经济。关于两岸三地抗击 SARS 这方面的话，我们还有相应的话题，如何继续维护和发展两岸三地的经贸合作。请林老师讲一下。

林毅夫：大家首先了解机遇，两岸三地共同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确实来之不易。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才有今天的成果。我想这个成果，从目前来讲，已经有很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未来。台湾地区目前人均收入是 12000 美元，什么时候达到 36000 美元，达到美国的水平；内地现在的人均收入是 1000 美元，什么时候达到 12000 美元。达到这样的目标，很重要的就是两岸三地的人，一起珍惜我们现在的机会。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想台湾地区的发展，确实对内地来讲，是一个机遇，那么内地的发展，对台湾地区来讲也是一个机遇，香港的发展，对两岸三地来讲都是一个机遇，我们只要有这个共识，不管有什么问题，我们两岸三地的人都会解决的。

雷鼎鸣：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绝对不是一方发展，而是大家都应该互相合作。发展主要的是信息交流，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不去解决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的面对各种问题，我们不应该被 SARS 影响到，我们应该在大的环境中考虑问题。经济要发展，这个是大方向。

赵 晓：SARS 对两岸三地，大中华地区经济的合作，更多的是挑战还是一种机会？

Deepak：我觉得考虑全球化的背景，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挑战。在应对风险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参考大中国做法，有三个部分：第一点，你不应该只有一个单一的政府或当局、单一决策者回答所有的问题，所以三个地方应该携起手来，创造更好的环境，进行信息共享，进行对话，进行信息的分享，所以你可以通过全球化来更快的找到一些方案。第二部分，这三个地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都要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就意味着劳工市场要灵活、资本流动要灵活、投资规章更简单，比如大中国地区，如果有更多的发展性和灵活性，在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之间，就会帮助三个经济体应对挑战。第三，积极的采取行动，就是说这些经济体面临危机的时

候，如何走到一起共同应对危机。当然，全球化的影响是更大的，并且帮助我们有更大程度的活动。它并不是一个单一政府或当局的责任，因为政府或当局的能力总是有限的，确实有必要在社区以及各个集团之间进行集体的活动，比如说北京如何来统一管理医疗工作人员、如何管理各个居民小区的行动，北京和台湾地区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如果携起手来，我们可以在三个地区建立好更好的机制解决问题。

赵 晓：请问周教授，内地和台湾地区当前的经贸现状如何？

周 济：经贸来讲，现在比较好，这是目前大家看得到的。但是我们也希望，两岸的领导或者能够以诚来处理事情，这样可能会更好。台湾地区来讲，明年我们是（所谓的：出版注）“总统”选举，两岸的议题就提出来。我们也看到一个情形，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是一个方向，只要方向正确，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波浪，那可能是一些小事情。

赵 晓：您觉得中国内地的人均收入，有一天有没有可能赶上台湾地区的水平？

周 济：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虽然现在还没有赶上，但内地已经是相当繁荣的地方。因为内地这么大，人这么多，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上海、北京人均收入也已经比台湾地区要高了。

163

赵 晓：您是指内地有一些地方可能能够赶超台湾地区？

周 济：对。内地太大了，整个地方的人均收入还不如台湾地区一样高的时候，那已经代表有些地方，人均收入已经比台湾地区还要高。

赵 晓：你认为在这些地方，比如你提到了上海，台湾的资金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周 济：目前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资金，在内地占了40%以上。这当然是开始启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将来的话，我想内地自己也会成长起来。内地的经济成长以后，我想这是一个共存的情形，不能说我们还像现在这样起这么大的作用。

赵 晓 VS. 林毅夫、雷鼎鸣、周济

林毅夫：我非常同意刚刚周济教授的判断，因为确实台资和港资，以及其他外资，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从总量来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在中国内地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5%，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15%左右，主要的资金还是内地自身，不过我觉得，它的影响不但是从资金的比例来讲，它的影响也包括带来了技术、管理以及海外的市场，对内地的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在资金上的影响。不过，我想内地这么大的市场和基地，在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经济的快速繁荣和发展当中，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赵 晓：我们的讨论快到尾声了，请Deepak评价一下两岸三地在对抗SARS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效果。

Deepak：我觉得，在认清SARS和采取行动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三个地区，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密集度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所有的这三个地区，内地很显然拥有最大限度的工具来使用来获得相关的信息，香港特区能够更快的动员资源，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台湾地区正在学习。现在这种症状有所缓解，台湾地区的情况在好转。我认为，在这三个地区，问题会被限制在当地，一个短期性的，病毒会和我们共存，和其他的病毒一样，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足够的警惕来合理地分配资源，在这三个地方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成为什么太大的长期的问题。

周 济：我想SARS对两岸三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这毕竟是一个短暂的冲击，只是从冲击中间，我们也认知了，两岸三地的合作，不光是在经济，还有在抗SARS方面都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现在全球化和两岸三地是这么接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合作是非常的重要。

雷鼎鸣：我觉得这次SARS充分体现出大家互相的沟通，体现了互相沟通的重要性。假如将来处理的好，大家共同合作的话，SARS的影响应该也不会太大。

赵 晓：林教授，在把SARS危机变成发展的契机方面，请您再给我们谈一些？

林毅夫：这次我们通过网络的方式集合两岸三地，还有我们的外国朋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也希望将来，大家两岸三地所有对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将来对某些重要的问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交流，增加大家的了解，有这种共识，这本身就是推动两岸三地的合作，通过两岸三地进步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我希望这个起点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

赵 晓：在 6 月 2 号，我主持本次中外学者越洋首场讨论的时候，我问过出租车司机一天拉了多少钱，他说 40 元，今天我问了同样的问题，出租车司机说拉了 300 块左右，已接近恢复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三。我想中国内地在抗击 SARS 方面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成功，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当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让我们共同祝愿两岸三地抗击 SARS 这场战役能够取得胜利，大家的经济都能够继续保持繁荣和发展。我们也要谢谢各位网友参加了我们的讨论。谢谢大家。

（本文写于 2003，SARS 冲击中国、全球关注中国之际。）

大学的改革

半年以来，有关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热闹非凡，众多新闻媒介给予特别关注，甚至许多海外华人也参与讨论。但讨论过于关注细枝末节，尚需进入更深层次。

中国伟大的改革进程正向纵深推进。继竞争性经济产业领域的改革之后，改革正向垄断性产业领域、事业（社会）领域乃至公共领域方面延伸。大学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正成为当务之急。



龙希成：自今年5月北京大学推出《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的争论很激烈，到后来似乎批评的声音更多一些。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大学的官本位问题，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的问题，行政改革与教师体制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学术自由的问题，评价教员的学术标准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引入校外评鉴甚至国际评鉴的问题），中国的文史哲与国际学术在评鉴标准上可不可比的问题，中国大学应不应该引进外国好的大学管理模式的问题，要不要留本校毕业生的问题，方案对中青年教师是否公平的问题，方案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大学应该如何对教员管理的问题，要不要有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问题，等等；甚至大家还讨论到这次推进改革的方式，是要采取邓小平式的“不争论”还是采取目前这种公开讨论的“商议式民主”。

张教授，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次北大教师制度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你虽然有一个关于《方案》的近三万字的《说明》，但在经过这么多讨论——有些包含着对《方案》和《说明》本身的误读之后，社会上仍然很关心你对于所有这些有关大学改革问题的思考。你如何看待这场讨论？特别是，有一种批评认为，你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您认为这种批评有道理吗？

张维迎：对改革方案有不同意见，这很自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对改革方案的完善都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有关大学体制更深层的问题。但有些误解还是有必要澄清。在我看来，北大这次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

也许由于我的学术背景，加上我在《说明》中有时把大学与企业作对比，有人误以为我们是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我很遗憾。其实，我想强调的正是大学与企业的不同，如为什么大学要有终身职位，而企业不能有。有些学科的教员对搞经济学的人不以为然，我能理解。但讨论改革方案是否合理，应该就方案本身讨论，而不应该因“人”废言。事实上，参与方案起草的绝大部分不是学经济学的，而是搞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更不用说决策者了。

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是用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这涉及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但大学的这种理念不可能自动实现。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不是全部）。

我们必须承认，在总人口中，能担当起完成大学理念重任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如果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不能保证教师队伍由最优秀的学者组成，仅有学术自由是不够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这一点我们到后面详谈。北大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保证能在北大长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北大的理念。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逻辑。

我们认识到，尽管大学的理念与企业不同，但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大学与企业在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共性。比如说，无论学术界还是企业界，竞争都是选人和激励人的重要机制。我们不能因为企业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用竞争的手段，就认为大学不能引入竞争，否则就是按企业的逻辑改革大学。大学的理念必须通过学术竞争来实现（当然，大学的学术竞争与企业的市场竞争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也在后面详谈），这是学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

赵 晓：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社会上的人有些惊讶，这么大的改革方案一下子推出来，其中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大启动这次改革是因为政府给了钱让搞一流大学，是为响应一流大学号召而改革。

张维迎：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为了向政府要钱，最好不要改革，因为政府给钱并不以启动改革为条件。事实上，就财政支持而言，这次改革是要冒风险的：如果北大推出的改革政府有关方面不高兴，到手的鸭子就可能要飞了。所以，改革不是为了要钱，因为给你再多的钱，如果你本身做不出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个钱就白给了。如果仅仅是为了钱，就没有必要办大学，办一个公司就可以了。当然，北大是全中国人的大学，国家对北大的支持最多，北大校领导有一种压力和责任感，北大要有一流的教师，要做出一流的研究成就。这在情理之中。

北大的改革其实并非突然。我们知道，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由政府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与大学的功能并不相容，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大学的理念。我们通过考试制度可以招来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创造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多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希望出国，到国外去拿博士学位？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办法提供能够满足我们的学生所期望的那种教学和研究水准（和环境）。

许多人批评中国大学生“高分低能”。为什么“高分低能”？“高分低能”主要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教员素质问题。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研究能力。国外优秀大学的教员都在从事本学科最前沿问题的研究，他们能把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带进课堂，把学生引导到学科前沿，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但我们国内大学好多教师本人并不从事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根本不知道本学科的前沿是什么，上课只能用陈旧的教材（学术成果进入教材有一个滞后期），只能照本宣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走在科学前沿？怎么能有创造力？

另外，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出去的留学生滞留国外？据我所知，不少人还是想回来的。他们不回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或待遇的问题，

而是有更深的原因，就是学术环境。我们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学术争鸣的学术环境。当学术气氛不能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天才也会被扼杀。尽管自1980年代始我们就不断谈论教育体制改革，但是应该说在一些最根本的方面没有大的触动，好多改革都是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赵晓：你的意思是说，要实现大学理念，必须对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那么，大学管理体制改应包括哪些主要方面？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第一方面的问题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学过于由政府主导，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大学办学的自主权非常小，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教员编制，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部都由政府规定。

赵晓：这是一个政府高度管制的行业。

张维迎：政府高度管制、政府主导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因为政府要面对所有的大学，就只能设立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就低不就高，最后就用管三流大学的办法来管一流大学。结果是所有的大学都向三流大学收敛，根本不可能办出真正的一流大学。

教授本来是大学的职位，大学水平不同，选聘教授的标准也应该不同，不应该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博士学位也应是大学授予的学位，而不应是政府授予的学位。在现有的大学管理体制下，教授职位和博士学位是通用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有效率的竞争，缺乏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竞争。竞争都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向政府争资源、争名额、拉关系等等这样一些不健康的竞争。因为政府的资源是通过行政系统分配的，大学的资源是大学行政部门争来的，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失衡，行政人员权力过大。

当然，政府对大学过度管制的问题并非中国特有，欧洲国家也有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严重。但不论在那里，政府管制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落后。两年前，耶鲁大学法学院汉斯曼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非常好。他问：大学本身起源于欧洲，欧洲的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但为什么过去一百年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的大学把欧洲的大学远远甩在后面，成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学者，包括欧洲的学者，都往美国跑？很多人说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能提供高工资，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汉斯曼教授认为，这并非主因。主因在于，欧洲国家的政府对大学的严格的管制，导致大学之间没有竞争；而美国实行的是高度竞争的大学体制。

比如说工资制度，在英国，你是教授，不论你在牛津还是在爱丁堡，或是在很差的大学，工资都是一样的，教授就失去了上进心。在法国，当教授要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优秀的人不愿意经过这个考试，就跑到美国去了。这样的体制下，大学之间没有竞争，学术水平必然下降。而在美国，大学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个大学都必须努力吸引优秀人才，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在一流的大学找到工作，水平越高的学者得到的待遇也越高，学术水平自然就会提高。

政府管制必然导致大学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对大学提出的需求。我曾经思考：为什么欧洲最好的商学院基本上都在大学之外，而美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一定在大学之内？我的答案是：美国的大学体制高度灵活，一旦社会产生了对管理教育的需求，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大学必须满足这种需求，商学院就会从传统大学应运而生。而欧洲僵化的管理体制，使得大学根本没法根据社会的需求设置新的专业，商学院只能在传统大学之外生长出来。法国的 INSEAD 是由哈佛的一些教授创办的，已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但法国政府到现在也不承认它，因为它不满足政府规定的标准。

赵 晓：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大学体制：欧洲是政府管制型，美国是市场竞争型，中国是政府主导型？

张维迎：可以这样认为。有一点要注意，尽管欧洲有政府管制，但因为欧洲的大学有上千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大学本身对政府的管制还有一定的抗衡，而中国的大学因为缺少自治传统，所以就根本没有力量抗衡政府。

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特设机构。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斥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政府有关部门控制大学的办法之一，就是搞各种各样的评比，像重点学科评比、科研基地评比、跨世纪人才评比，等等。人人都知道这些评比劳民伤财，无聊之至，但谁也不敢不以为然，因为它们是大学获得资

源的重要渠道。越是水平差的大学越是热衷于这些评比，迫使水平好一些的大学也不得不参与竞争；因为否则的话，别人成了国家重点学科，你的脸面往哪放？校长怎么当？所以我说是一流大学跟着政府跑、一流大学跟着三流大学跑。但看看那些政府评出的所谓“国家重点学科”，有多少是真正代表中国大学最高水平的？

尽管《高教法》规定大学有设立内部机构的自主权，但实际上做不到。北大在1999年改革之时，合并了一些部门，其中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的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

政府对大学管制过多，校长和教授们就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应付主管部门身上。为了应付主管部门，大学的官也就越来越多。政府主管部门成天叫喊要建设一流大学，繁荣学术，其实阻碍学术进步的正是他们自己。中国真正要产生世界一流大学，我想必须真正地、彻底地改变政府管制大学的方式，让大学自治，否则，一流大学是没有希望的。我当然不是说大学不应该有一些统一的游戏规则，但游戏规则可以通过一些行业协会和学术组织，如大学联盟、大学教师联盟等等非政府组织去搞，而不应该由政府亲自来做。

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大学内部体制本身的问题。内部体制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是政府管制的延伸，如行政主导学术的问题。

但大学内部体制最严重的问题是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一个人一旦当了教师，无论有无创造知识的能力，不论业绩表现如何，都可以工作到退休。而新教员的主要来源是本校的毕业生，毕业以后留校，留校后当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整个大学内部形成千丝万缕的人际纽带，教师之间通常都是师徒关系、师兄弟关系，整个一个自我封闭的体制，大学完全“家族化”了。家族化的大学不仅有内部的等级体系，而且自然对外来的人有很强的排斥力，学术自由和平等的学术交流根本不可能。大家看过电视剧《刘老根》，一定明白打破家族管理是多么的困难。

在这种家族化的体制下，教师职务的晋升不可能不以论资排辈为主，就像家里娶媳妇一样，老大没有娶过，老二绝对不能娶，因为老二一娶就把老大给盖住了，老大就可能永远也要不上。提教授也是这样，先毕业的先提，然后慢慢再提后面的，反正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嘛。即使偶有杰出者，也只能“破格”提拔。这样，大家都形成一种预期，只要有耐性，退休前一定当教授。这样的激励机制，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怎么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怎么能够激励人们做出最优秀的研究成就？

大学教师等级化的一个表现是所谓的“科研梯队”，教授当学科带头人，讲师和副教授为教授当助手。教师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有了这种等级之后，处在高位置上的人什么都能说，处在低位置上的人只能听别人说，有思想也不敢顶撞，没有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气氛，大学的创造力都没有了。这样的体制，何以实现大学的理念？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大学的封闭使得中国的每个大学都变成一个学术孤岛，形不成真正的学术市场和学术规范，评价教授的优劣非常困难，评价的权力只能交给政府，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大学的管制。

赵 晓：改革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涉及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涉及大学本身的治理结构。但过去所有的改革都是修修补补，在这两个层面都没有什么突破。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有所突破？

张维迎：对！北大过去其实做了很多改革，包括引进人才，1999年的九级岗位，起了很大作用。像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新进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我们从外面引进的（包括海外和国内其他院校），我们已有好几年不留本院博士毕业生了。这样一来，学术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去年评教授，学校给光华三个名额，但光华只报了一个，因为我们的标准高，不论资排辈。

据我所知，北大的其他一些院系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但是如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东西没有突破，就是一个教员一进来之后，他就终身了。

赵 晓：大学改革涉及诸多方面，但这次改革像是单兵突进。许多人不服气：为什么单单先从教师体制入手？

张维迎：这是改革学研究的问题。社会改革与修理机器不同，只能在行进中进行，必须稳中求进，而不可能用休克疗法。如果所有的改革同时推出，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瘫痪，欲速则不达。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有人说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准能动全身的这一“发”，先牵起来，不能因为害怕动全身而不敢牵这一“发”。大家一定要把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过程分开，改革的过程只要有助于达到最后的目标，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教师体制作为突破口，我理解，第一，因为教师毕竟是大学里最重要的资源，是实现大学理念的源泉。如果教师的质量上不去，其他的如行政服务、后勤服务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可以去看企业的行政后勤都做得很好，但它不能为人类创造知识。教师体制晚改一年，就会有一些新的不合格的教师被提拔，以后改革就更为困难。所以早改比晚改好。

第二，教师体制的改革将创造对其他方面改革的强烈需求，从而会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包括学校行政和后勤体制的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博士生培养体制的改革，科研资金分配体制的改革、大学决策体制的改革，干部任命体制的改革，等等。这些我们到后面将详细讨论。这次讨论中大家提出这么多问题，恰恰证明教师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你想，如果率先推出的是行政人员的改革，而不是教师的改革，能提出这么多问题吗？能引起大家对大学理念的追问和反思吗？

至于政府对大学管制的改革，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但坦率讲，学校在这方面难有作为，只能呼吁，但不具可操作性，只能等待教育部出面来做。但我相信，北大的改革，对改革政府管理大学的方法本身提出了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总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吧！

赵 晓：改革教师体制，让教师流动起来，就要求其他大学对北大的教师开放。如果其他大学不跟进改革，北大改革就很难成功。

173

张维迎：对改革的要求每个大学都有，问题是谁先迈出这一步。我相信，其他的大学、像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等，都会进行类似的改革。试想，中国如果有十所大学开始类似的改革，那将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多大的活力！退一步讲，即使其他大学不马上跟进，按照现在的方案，北大至少有三年的时间等待。难道三年之后他们也不跟进吗？事实上，像中山大学已经开始改了，其他大学也正在展开不同程度的改革，只是没有北大彻底罢了。所以这次媒体“炒”北大改革，有些大学很不服气。教育部门不仅应该支持这个改革，而且应该就其职权范围之内，真正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把大学真正变成一个自主性的单位；像设什么样的学位、教什么课程、招多少学生等等事项，都应该是大学自主决定的事。

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一个改革。每一个大学的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他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愿意做改革的人，就没有资格担任大学的校长。对教育部门也是这样，我觉得教育部长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教育部长，不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教育部长。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期待着，通过北大这次改革的冲击，一方面从体制上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其他的大学的改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改革浪潮

赵 晓：你谈到欧洲大学的管理体制也存在许多问题，那么他们是否也在改革？

张维迎：其实，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进行改革。比如日本，这几年大学改革步伐非常快，国会已经通过议案，国立大学法人化。就是要通过改革，让大学变成一个自主性的单位，破除原来政府对大学统一的控制：预算上的控制，教员的控制，教学标准的控制等等。在教员筛选方面，日本要求你在这里做几年，不优秀就得走，并大力废除“近亲繁殖”。

同样，欧洲大学也在改。像牛津大学，最近改革的步骤就非常大。经济系新上任的系主任，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 David Hendry 上任开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其中之一，是他把两个只教书不做研究的教员“开”了。结果这两个人把他告到了法院，他就上法院应诉。最后是这两人软了下来，“私”了。

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全世界的大学都在改革。其中的关键，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充分，社会的发展也对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像欧洲大学教员那种养尊处优的地位不可能再保持下去了。

赵 晓：看来，全球化的影响的确深远。无论企业、政府还是大学或是在竞争中落伍，或是主动改革迎接挑战。全球化的竞争是否也是本次北大改革的一个背景考虑？

张维迎：全球化的确对我们、对各国的大学形成了压力。全球化浪潮来临，人才流动更容易了，信息流动更容易了，教育模式、大学的好坏慢慢出现了一个相对一致的标准。你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大学，再也

不能封闭起来自己说了算。你有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教员和优秀的学生、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跟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你是不是最优秀的？是不是学科最前沿的？这成为每个研究型大学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必须面对的问题。否则，不进则退，就只能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

“一流大学”与大学发展目标

赵晓：尽管迎接挑战，争创一流是大的趋势。不过，有些人对现在就提“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并不以为然。你怎么看？

龙希成：请允许我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大学教师创造和传授的知识，有些是没有即时的市场需求但具有长远的社会价值；有些是关乎人们的精神或心智修养的，或者干脆就是“无用之用”（THE USELESS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这就要求对大学教师的评价或课程设置的标准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大学存在的理由呢？

张维迎：北大、清华最早于1998年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鼓舞大家！有些人对“建世界一流大学”提出批评。这个我完全理解。就是说，光喊口号不解决问题，但如果能够付诸行动的话，口号还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现在的改革正是要将口号一点点地付诸行动。

另外，管理学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变革，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目标，形成一个让大家很容易记住的东西。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和提法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

我们为什么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在好多领域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做不到世界一流你就根本不必去做。比如说研究数学，某个数学定理人家早证明出来了，你再来闭门造车、重复证明一番，然后说“我填补了中国的空白”，那有什么意义！你只有成为世界一流，填补世界的空白，才有意义。

当然，人文学科有些差别，比如它可能需要根源于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进行研究，可比较性相对较低，地域性相对较深。但是必须看到，对于大量的理工科来说，它就是一个惟一国际化的标准，是无法回避“世界一流”的挑战与竞争的。

如果只是一个小国还好办一些，可以将发达国家创造的知识拿过来用就可以了。但中国是一个大国、文明古国，你不能老搭人家的便车啊！过去毛主席说，中国要为全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这在今天既是责任，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人文学科的老师时常有一种历史责任感，那就是要为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如果你的研究成果完全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显然你还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弘扬尽到完全责任。如果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做得最优秀的不是我们国内的学者，反而是人家国外的学者，中国的学者就更应该感到羞愧！

回到我们讨论的大学的逻辑这个命题。社会要大学干什么？为什么纳税人，包括学生，要养着我们这些大学？很显然的一点，社会需要大学，不是为了给一部分人创造一个“贵族式”的就业机会，而是希望在这里工作的这些人，能够给社会以回报，做出有益于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越大越好，包括培养人才、创造知识和服务社会等方面。可是，沿袭旧体制而来的中国大学目前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个要求，因此就要改革。不改革别说谈不上什么世界一流，维持都不可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大学的智慧

大学改革的理据： 发展才是硬道理

赵 晓：关于大学改革，有人问究竟有什么理据。20多年来，中国改革最大的理据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学改革是否也是这样？

张维迎：我们看一下法治的历史。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虽然任何已有的法律都是维持稳定的。但社会本身在变化，因此法律条文也要相应变化。所以，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从现有的法律条款看这个问题，那就是相对于合法性（Legality）的概念，还要有更高的一个理念，即合宪性（Legitimacy）的概念。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什么是变革？变革本身就体现为对现有不合理的经济、技术、进步的规章制度进行变革。因此，我们考察变革特别是学者讨论变革的时候，应站在更高的高度，即我们是否正在创造一个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高价值的制度，有时可能就不能简单用现有法律去看。当然，变革当中涉及具体的人的时候，你或许要按照现有的法律给他一些补偿等等。不过，这是两个问题。

如果从现有的法律去看改革，有时不会有什么意义。因为按照定义，任何变革都是不合法的。否则怎么能叫做变革呢？

法律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行动的指导，指导未来行动的总是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方案，并以此突破现状，更好地适应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现实需求，然后再通过法律的变更把变革肯定下来。所谓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其实永远是这样一种在法律稳定与改革变更之间的互动。

比如，中国很早就有了妇女缠脚的问题，后来慈禧太后废除了这个东西。但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个做法也是不合法的。因此可以说，哪怕最微小的变革，也都体现出为未来社会创造新的法律的特性。历史上还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最近 20 多年中国改革的例子，都是这样。甚至可以这样讲，按照现有的法律，共产党闹革命都是不合法的。

赵 晓：但是共产党闹革命，总体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显然是有更深层的合法性。

张维迎：其实，古代儒家强调“天命”，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顺乎自然、天命就是强调人性，强调民众的利益，以此去衡量你这个政权是不是还具有合法性。你不能说因为你的皇权是继承来的，你就有合法性。继承来的权力只有低层次上的合法性，但要是当政者不能为民众办事，就失去了合法性。所以孟子讲，君主干了坏事怎么办？规劝。劝三次他不听，就把他推翻了。这就是合宪性（Legitimacy）的概念。

赵 晓：归根结底，改革或者干脆说“变法”本身就是打破不合理的法律，创造更适合的法律，并且用更合理的法律代替不合理的法律的过程。

张维迎：是这样。学术上关于法律有所谓实证法与自然法的争议。从实证法来看，所有由国家颁布的法律都是合法的，但从自然法来看，只有符合人性的、符合公共价值的这些东西才是合法的。或者，我们说，法律其实有恶法与良法之别。像英美这种普通法体系，之所以被公认为最有效率的法律体系，就是因为它有不断适应变化的能力，一旦出现新的问题，老的法律的伸展性很大。

为什么邓小平伟大？是因为邓小平改革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是说邓小平他有这个权，他就是合法的，而是说邓小平提出的这项改革，符合人类发展的大方向，是能够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水平的伟大的改革。

所以，用现有法律去谈论大学变革，意义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价值。这好比法学家和律师的区别。律师总是受他的委托人的授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专找法律的漏洞，或者就法律对他有利的那些

东西作引证辩护。但法学家不是这样。法学家要从公共理性、从社会良知的角度去推动社会变革，革除那些不合理的法律，这是法学家的任务，法学家不是律师，如果法学家把自己变成一个律师的话，那是很悲哀的。知识分子讨论改革，也不能仅从“律师”的角度去讨论，而要从类似“法学家”的角度去讨论。

赵 晓：改革型校长跟普通意义上的校长的区别，是不是前者更像法学家，后者更像律师？另外，我注意到，对北大改革方案所谓缺少法律依据的批评应该说是极个别的。

张维迎：其实，在《高等教育法》里面，对教师的聘任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只是没有具体执行它，没有具体执行得通。可以说北大的改革完全符合整个国家改革的精神和大环境。

我已经讲过，法律依据不应该是一个大问题。说白了很简单，就像签一个合同，但不等于说合同不会更改。由于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了，原来的合同不一定是最优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办法，重新讨价还价，重新签合同，来解决问题。好比说原来的合同规定雇你 50 年，情况变化以后，不能再雇你 50 年，这从社会总体的效益来说是不好的，你应该去干其他的事情。怎么办？我仍然让你走人，但我给你补偿。当然在法律上可能有不同的补偿标准。一种情况就是，我事先说定：假如我提前解除合同，我要给你 20 万、30 万；另外一种情况，是让法院判决——如果你重新找一个工作比这个更好的话，那么法院可能判定我甚至不用赔偿你。

原则、妥协与公平： 大学改革的智慧

龙希成：具体就北大改制方案来说，为什么不把副教授都一次性地转成终身教职？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有限次申请的更复杂的方案？而且对于一些人文学科，有的长达 18 年，人的半辈子都过去了，是否给的时间太长了？

张维迎：这个问题问得好。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说，要解决大学的治理问题，特别是大学教师的招聘和晋升制度。我们讲大学的逻辑和理念，就在于大学要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服务社会，那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么什么样的体制才能保证达到这个目的？教师的聘任和晋升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因为创造知识需要一些特殊的人才，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好多人可以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干事，但可能并不具有那种智力、智商来创造知识，所以大学设计的这个体制，并不是给所有人设计的，只是给一部分、最能够实现大学功能的那一小部分人设计的，他们只占总人口的 1% – 2%。大学要按自己的逻辑运行，要最佳地创造知识，就要把最优秀的人聚集起来。这时候就有个选人的问题。你怎么能够选到最优秀的人？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大学的选人体制，但是应该说美国这种 Tenure-track（终身教授制度）明显成为主流的制度，包括欧洲、日本的大学现在都在学它。所以，我们要借鉴这样一种制度。

大学选教授要冒很大的风险。你不能说一个人看一两次，看一篇文章，就知道他达到了什么水准，而是要有一个过程。因为一个人在知识上的创造力，要有一个实际表现的过程。所以大学制度设计上要有一个试用期制度。为什么试用期是六七年，这与知识的生产特点有关。你试用一个搬运工，需要多长时间你就能确定他是合格？可能就是一两天。你试用一个保姆呢？大概一个月。试用一个秘书，可能是 3 个月。但是试用一个合格的教员，一两年的时间都太短了。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需要六七年，一个人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六七年内应该表现出他的才华，并显示出他够不够做一个合格的教员。

我想大学改革设计的这个体制，基本上，在目标模式上，主要应借鉴美国 Tenure-track 这样一个体制。为什么不学欧洲？因为欧洲模式失败了。我本人是牛津留学回来的，牛津现在的试用期是 4 年，有的 3 年，太短了。现在有些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周期最少都要两三年，这样短的时间大学没有办法看出一个人的能力，所以我们设置的一般标准是 6 – 7 年，比较适中。

在六七年内的这段时间，不等于说我不管你，到六七年后再看你行不行，不行再让你走人。事实上，3 年会有一个评估（Review），并不特别要求你已经拿出来非常好的文章，而是看你的表现。有些人认为这不对，你的体制既然学美国，你为什么要有这个 3 年的评估。其实你看美国，美国好多大学是两年一个评估（Review），不是给你 6 年拿 Tenure（终身教授），6 年之内对你没有任何约束的。当然，有些人可能两年就可能发现他不行，他没有任何研究学问的兴趣。那你就早点让他走，不必耽误人家那么长的时间。

赵 晓：也就是说，确定一个保姆行也许需要一个月，但确定不行，可能一件事、一天之内，甚至一个小时就OK了。

张维迎：是这样。所以，六七年只是大体上的时间。有人两年可能就走了，而优秀的可能三四年就拿到了终身职教授。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就是有人讲，如果我是一个讲师，我在讲师位置上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不升教授，不升副教授，干嘛你要我走呢？我做一个合格的讲师就行了嘛。

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大学选一个讲师、一个副教授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选讲师、副教授，而是要选一个优秀的学者，一个能成为最优秀教授的人。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只是整个选择过程的一个环节以及一个必要的激励机制。我找一个搬运工，就是为了找搬运工，搬运工不能升车间主任没有关系，他不用辞职。但选大学教师那是两码事。大学的目的是选最优秀的教授，其他的位置都只是作为一个试用、选择的过程，是未完成的中间过程。

赵 晓：打个比方，在大学教师的生产过程中，讲师只不过是一个中间品。就像机床的粗坯，然后是机床，然后加上电脑，成为数控机床。你不成为数控机床是不行的。学校允许你在某一阶段成长为普通机床，再过一段成为数控机床，但是不允许成为停留在中间产品状态。

张维迎：所以，讲师和副教授们不能说我是原材料、就是半成品就行了，我不当成品这样行不行？这是好多人的误解。我当初早知你只有当讲师的潜力，我根本就不会要你。一旦明确你没有潜力成为优秀的教授，就等于宣布你的失败，你就应该走人。

赵 晓：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永远做讲师，我在这个学校做完讲师之后，再到另外一个学校做讲师。可以吗？

张维迎：这很有趣。其实，北大改革就是能试图找到一种能够适应长期变化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同时又能迁就现有客观情况的改革办法。因为改革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改革是要把现有的体制进行变革，所以我们设计的多少多少年不过是一种过渡，最终目标是以后大体上六七年就能确定一个人究竟适合不适合在北大。

但在现有的体制下，你要一下子走到那一步，提高教授做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Tenure的话，副教授的标准就要大幅度提高。这不现实。所以，只能逐步地，先把Tenure定在教授这一级。然后，提副教授的标准逐步提高，好比说，博士两年之后表现不错的话，可能拿到副教授，以后就变成3年，以后就变成4年，标准越来越高。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待上十几年，那是给你一个最宽的期限，但目标不在这里。给宽限是为了照顾现实，如果不给那个宽限，现在有人已经待了好些年了，他怎么办？有些人说我讲师待6年，然后副教授待12年，加起来18年，18年之后你再不要我了，那我去哪里干活？其实，没有人想让你待18年，应该是最多六七年见分晓，不行你就应该走了。

赵 晓：就是说给一个最宽的底限，但底限不一定是平均线，更不是目标线。

张维迎：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好比盖大楼，大楼里有些是“承重墙”，这是不能动的，还有些是“非承重墙”——隔离板，这些是可以动的。我们的改革方案既有承重墙也有隔离板。什么是承重墙？就是在六七年的试用期，你最多只能申请两次晋升，不行你就走。其他的那些个过渡年代，都是隔离板，要随情况而变化。但新的制度既要实行于新招的人，又要实行于已有的人，这个矛盾比较大，所以限度现在放得比较大一些。就像吃饭，有的人可以吃5个馒头，有的人可以吃1个馒头，我们的方案定的是你可以吃1至5个馒头。

龙希成：这里有没有一个对中青年和老年人之间的不公平的问题？

张维迎：也不能说不公平吧。任何社会改革，起码的一点叫尊重既得利益，这是必须考虑的。既得利益越多，你考虑得也应该越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文化上讲，中国人讲尊老爱幼，你不能说年龄那么大的人要先让他走，这不太人道。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年轻人毕竟还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我们国家的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这样。国企改革，年龄特别大的可以让他提前退休，但不能让他下岗。要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你不能说这不公平。

我们知道，改革不是革命。革命从来都是推倒重来，改革则要靠现有的人去改。有人说，为什么不从教授起就地卧倒，全部从头再来？那马上就会有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的教授一定是Tenure（终身教职），但如果他们现在统统就地卧倒，那么谁来评谁还能拿到

Tenure 呢？显然没有人来评！那就只好请外面的教授来评了，这现实吗？

总得有一部分人来评另外一部分人，难道让副教授来评教授合格不合格就公平吗？更不公平。教授中是有一些不合格、但总体上还能控制。因此目前的选择是现实的选择，也就是合理的选择。

另外，大学选人的体制要靠现有人力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就地卧倒的做法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是所谓来“愣”的。我们总是有些人喜欢来“愣”的，来个头破血流的“休克疗法”，却不考虑可能性与效果，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想我们对任何一个改革方案的评价，都应该这样去看，它的 alternative（备择方案）是什么，是不是比现有的更好。如果不是，那么现有方案就是最优或者说次优的方案。这样的比较与批评才是负责任态度。

我想知识分子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你要指出任何一个方向的毛病都可以，但最重要的你要提出合理的备择方案。你有哪一个方案比这个更好？我们可以举几个方案，一个是现有这个方案，一个是所有人就地卧倒的方案、第三也可以说教授卧倒、讲师和副教授不卧倒的方案，无论是从人类公平的角度、人道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究竟哪一种好？我相信还是我们现有方案最好。

龙希成：有人的确希望照顾副教授的利益，把现有的所有副教授、教授都转成终身教职，以后 Tenure 就定在副教授这一级上。

183

张维迎：我在《说明》中讲过，为什么副教授不能变成终身教职？是因为北大的编制已经快满了，这是一个现实的约束条件。我们现在有 800 多个副教授，如果教授、副教授都变成终身的，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副教授、教授已经把位置都占满了，你要招新人，还有可能吗？如果北大像中山大学那样，名额大量缺编，那么这种方案是可以的。北大的某些学院像光华管理学院也可以，因为光华管理学院大量缺编，刚开始改革时候只有 40 多个人，编制是 120 个。但是整个北大不行，因为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龙希成：这个编制数量是国家定的还是北大自己定的？

张维迎：国家按照学生数量给出一个编制的计算，学校按这个去做。

就算国家没有编制限制，学校也要有编制啊，因为你的预算是有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限的。这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的书架就那么大，过时的旧书已经占满了，你要买新书，怎么办？你只能把旧书挪走。但要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屋子特别大，现有的书只占了一个书架，还有许多个书架空着，那他自然可以先不理旧书。所以，这是一个不可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问题。

所以改革要跟现实主义结合，在寻求长远的理想目标和现实可行办法之间找到结合点，而不能走极端。

我还要说的是，改革总是需要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但改革的原则是不能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这包括对既得利益的照顾，其实我们对副教授也有照顾，好比 50 岁以上的人都不动，这里面体现的也是人道主义。但最基本的原则——引入外部竞争，有限期有限次的晋升，原则上不留本校毕业生，这些原则都不能动。

大学改革与学术自主

龙希成：你强调引进海外培养的博士，而不能留本校的人，你怎么选择？有人说这涉及学术自主的问题。

张维迎：学术自主是什么意思？

184

龙希成：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不能过多地依赖留学生。

张维迎：实际上，如果真正开放以后，首先，理论上讲，选人与你从哪儿毕业的没有关系，只要达到标准都可以。只要是大家考核，认为你是优秀的就行。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在国内招人也在国外招人，国外回来的有特别优秀的、国内招的也有特别优秀的。

龙希成：是本校培养的博士吗？

张维迎：本校培养的也有特别优秀的博士，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留？我想我早已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你留下一个优秀的人，但可能带进来十个人不优秀的人。

赵 晓：这的确是目前的现状，借着留优秀人才的机会留近亲的“搭车问题”无法解决。

张维迎：是这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考虑了一些灵活性，好比对一些学科的特殊人才就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但这只是一个特例，不是通例。原则上我们不留本校学生，要留的话，那他要提出足够的理由。如果原则上就规定可以留，那他不提出理由就可以留了，就没有办法保证人才的质量了。

出去的人，其中有很优秀的，我们还可以把他再吸引回来，并不见得就造成了人才流失。比如，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从海外招来的相当一部分甚至超过一半都是本科北大毕业的。为什么要将原则上不留本校人才与人才流失相提并论呢！

通例与特例：大学改革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龙希成：通例与特例的区别还是很重要的。像科斯 50 年才被人发现他的才能，沈从文、钱穆和梁漱溟则是没有博士学位的典型的文史哲成才人物。现在一定要求有博士学位，这中间的通例和特例的关系是什么？

张维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想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社会本身在进步，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个基本趋势就是越来越要求基本的知识积累。所以，你不能因为历史上某个时代没有博士，现在也不能要求博士，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孔子大学都没上过，是不是我们干脆连大学毕业的要求都可以不要呢？这样的思维忽略了各学科的进步，已越来越形成一些规范性的东西，学位实际上意味着后来的人必须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我想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套现实。说句玩笑话，古代人连裤子都不穿，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不穿裤子呢？

龙希成：呵呵，的确是这样。美国联邦党人之一的潘恩讲过，人在小时候吃奶，难道长大以后就不能吃肉吗？

张维迎：第一，特殊人才要靠特殊手段去发现。这种特殊的手段一定要和通常的手段不太一样。但是，假如说首先没有这些通常的手段，那我们怎么去选人？每年申请到北大教书的有上万人，谁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定这些人？所以学位要求可以看作是一个初选，把范围限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定到一定的程度后，选人工作量就大大降低。至于特殊人才，他会有特殊办法冒出来，但是特殊就得要拿出特殊的东西来看。你不能说我没有博士学位也有大成就，那请拿出你的大成就来，给人去评价。一般人拿不出大成就，只是嘴上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那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肯定只能用特殊手段去选拔，但这些特殊手段也只能作为通常手段的补充而不是主流。

赵 晓：制度通常是适应于一般情况的，特殊情况需采用特殊制度。

张维迎：可以这样来思考通例与特例的问题。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区别，第一类错误就是我们可能接受一个错误的东西，第二类错误是我们可能拒绝一个正确的东西。这两者都意味着犯错误。那我们就对这两个进行权衡。我们现在的办法，包括对学位的要求，可能会拒绝一些优秀的人，但是犯这个错误的可能性，远远比没有这个要求之后，接受错误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合理的。

法律上，一种主张叫“无罪推定”。按此规则，有时候一些罪犯你没有办法证明他的罪，结果就成了漏网之鱼。但是这个制度比“有罪推定”好。因为“有罪推定”先假定你有罪，除非你证明无罪才会被释放。但你证明起来很困难，这样很多人会受冤枉。相比较而言，还是“无罪推定”的制度为优。这样的智慧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通例与特例时的智慧。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可以说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人类的智慧在于懂得去选择相对最优的制度。相比于把特例当通例的办法，北大的解决办法更优。

赵 晓：看来，大学在改革也像其他改革一样，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optimal)，只能选择次优(Second Best)。

张维迎：没有最优就选择次优。我们作选择，只能在几种备择方案中选。放弃学位要求，可能把没有学位的人选上，但是可能把很不优秀的人选得更多，代价太大。

赵 晓：讨论至此，我想我们应该能同意，单纯指责一种改革方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真的是不够，你得说出备择方案更优，才有替代已有方案的可能。

张维迎：所有制度都只能针对通常情况，因此必然有其缺陷，但我们还可以通过针对特例制定专门条文的办法减少缺陷。

比如，对于特殊人才，北大方案规定，特别优秀的人可以不受学历、年限的限制破格录用、提拔。这意味着对于无博士学位的人，方案并没有一概排除在外。方案把这个写成例外，是为了在执行起来严格要求，免得把太多不合格的人选进来。

你说你就是只有小学毕业的钱穆，那很好啊！我相信钱穆按现在的改革方案，一定能当北大教授。但是，有太多的人以为自己是钱穆了。遗憾得很，钱穆在一个小学校教书，都能做出那么大成就。我们许多人在大学那么多年都做不出像样的成就来，那你有什么资格跟钱先生攀比？

大学的理念

终身教职的设计： 选拔优秀人才 还是保障 学术自由？

赵 晓：终身教职看来是不能随便给的。实际上，它更多地应被理解为是激励机制，即形成一种竞争的压力。也就是说，你只有表现得特别优秀，才能获得这个终身教职。



张维迎：事实上，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终身教职并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理解的为了“保障学术自由”的问题。终身教职加上“末位淘汰制度”，更重要的是可使在位的人有可能去选最优秀的人，否则人人都搞“武大郎开店”，没有人愿费心去选优秀的人来。特别是当他招来的人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时，他就更不会有积极性去选比他更优秀的人。

事实上，在招聘和晋升中有发言权的一定是终身教授，不可能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人。这个话反过来说，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是终身教授，他才有积极性和有压力招来优秀的人，才能保证学校不断地新陈代谢。但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合理的大学制度安排。

赵 晓：也就是说，大学必须设计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使得在位者选人的激励和学校的目标一致起来，才能保证达到大学的目标。但你已经提到了“学术自由”，也就是终身教职可避免教师不受政治

的影响的角度。学术自由的考虑也很重要吧。

张维迎：这个也很重要。

赵 晓：选优秀人才与保障优秀人才的学术自由这两个在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张维迎：选人更重要。保证选上优秀的人才，保证选人的人不“武大郎开店”，这是最重要的。

赵 晓：那保证学术自由呢？

张维迎：学术自由很重要。但是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大学过去都是铁饭碗，甚至全社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铁饭碗，有学术自由吗？很显然没有，甚至谈不上有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很显然的一点，并非位置终身了就会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涉及的因素是非常多。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创造知识的地方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学术自由。这个道理从亚理斯多德开始大家就都明白。大家这么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不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中国人的学术自由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

很多人会很惊讶，怎么会来自自身限制呢？但事实如此。有人说这样一句话，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

你们能够想像吗？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你想想，你在婆婆面前，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会预期将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肯定不喜欢你，

极端的时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了。中国高校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一块是来自这个。

如果有些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的经历和以及我这些年的观察表明，我相信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对你的限制。尽管存在一些禁区，但仍然有太多非禁区，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经济学领域就是这样。

那么从学校来讲，我们怎样来创造一个制度保证学术自由呢？就要靠“Tenure track”的制度。当你拿到 Tenure，如果你没有明显过错，任何学校当局都不能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而解雇你，从行政方面讲，校长没有权利开除一个因为观点跟你相左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这样你才有学术自由。但这个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择最优秀的老师队伍。

龙希成：大学不能留本校毕业生，原来还有学术自由的考虑。

张维迎：对。就是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你才会有自由。所以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之后，才变得有出息的。父母在的时候孩子始终是长不大的。

看看中国人文历史，都是人才出现流动以后，学术思想创造才会出现。好比说我现在坐在这儿，我很自由，但如果在我父母身边，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过去跟一位老师在一起，这位老师很好心，经常提醒我：“维迎啊，你说话注意点，你会吃亏的。”为什么？他说你这个说话会得罪上边、因为跟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我现在感到自由，是因为这样的老师在我身边很少了。

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水平有关。你没有水平的时候，你怎么去“自由”？自由创造是需要得到别人认可的。所以，有利于提高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这是因为，学术自由不能理解成学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业都有行规，学术自由不是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美国的大学的课程编号甚至几十年不变。你要开新的课得要有一个程序，这个课要经过一个委员会(faculty)的讨论、系主任的批准，你才能开。因为你必须对得起学生，而不是自我欣赏，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学术自由也不能违反学术的基本规范。好比说，人家都讲 $1+1=2$ ，你说我要自由，非要 $1+1=3$ 。这不能叫自由。

赵 晓：总结起来就是，光讲学术自由，不讲学术规范有偏颇，实际上是对自由的滥用。

张维迎：就是说 I 有挥拳头表达言论的自由，但我不能真的打着你的鼻子。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学者他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样的“学术自由”便是伪学术自由，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

赵 晓：学术自由的目的不是因“自由”的名词好听，而是为了更好的思想与学术创造。

张维迎：这个很重要。学术自由与大学的逻辑是相一致的、是为了创造知识、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学校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该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贡献最大化。

赵 晓：归根结底，自由氛围能使学者更好地创造，与此同时还要辅之以学术规范。

张维迎：我们为什么强调教授要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自由比我们一般的行政机关要大得多。教授一般上下班都比较自由，行政官员、国家干部上下班能自由吗？那不行。给教授自由，不是因为教授学历高、知识水平高，就可以搞特殊，而是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教授自由上下班更有助于他的学术成就，也就是说，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逻辑，完成大学的理想。

赵 晓：这头让教授比行政官员更有自由，但是那头严格要求你出知识产品。这里，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因为权利须与义务相对应。教授的自由越大，其学术规范必然越严格。

张维迎：没有没有约束的自由，也没有没有自由的约束。

我想关于学术自由，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官本位与学术自由也很有关系。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中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 Hierarchy（官僚）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

学校的官本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内生的，与学术规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范有关，与学者水平有关。

在中国，因为缺乏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欣赏。这样一来，做学术的人常常会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大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官本位来比较了。

在高校，什么样的人最重视当官？什么样的人官本位的观念最强？一般来说是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创造的成就，对当官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一个系或一个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像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他才不在乎当什么官呢！再比如美国的优秀大学，担任系主任常常要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那是服务别人的事，伺候别人的事，还影响学术研究，没人愿意。而低水平的学者则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如靠行政级别来压制人。如果一个系里面大家水平都低，而社会上认为谁当了系主任“谁的水平就高”，大家就会拼命去争当系主任，这样以来更没有人搞学问了。

官本位会伤害学术研究。我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几乎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越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越低的人忙着去分配。高校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

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逻辑，必须回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授的水准，而这正是我们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这次改革对冲破官本位是非常有益的。

赵 晓：也就是说，要提高专业水平，并且建立起学术自由风气，首先要树立学界自己的专业标准，提高学者自身水平。

张维迎：我们一会儿再谈学术标准问题。我这里先说一点，学术标准是内生的。学者的学术水平不高，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专业标准。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伟大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在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建立学术标准是不可能的。但要是大学中低水平的人多了，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在学术上比高低，只有靠行政序列来分胜负，因为那毕竟还是一个序列。

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可以说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也很严

重，没有办法进行比较，自己拿不出学术规范，所以只能挂靠行政评比。什么国家级科技奖、省部级科技奖，其实都是官本位的变态表现，也是学术水平不足的反映。

谈到学术标准，这个问题是这样，评价学术成就和评价普通产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市场上产品的评价最终是消费者来评价。你不能让几个电视机厂家大家凑到一起大家评谁的电视机最好，这没有意义。但是学术的标准、学者的标准要学者自己评价，即同行评议。如果整个这个专业有 100 个教授，就由这 100 个教授说谁是最好的，才有意义。

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知识产品的特殊性。教授们在大学里产生的知识和思想尽管对人类长期发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来。许多学术研究当初并没有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价值很大。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也不能指望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是不是优秀的教授，学生只能评价老师是不是一个讲课优秀的老师，没有办法评价优秀的研究型教授，因为学生的知识也有限，他本身还在学习，所以由同行来评价才是最优的选择。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制度，让这 100 个教授有积极性说真话，真正评出大家都认同的最好的学术研究来？由此就引出学者的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问题来，这些问题对于学术评价非常重要，当然刚才讲的学术自由也很重要。

这也就是说，学术标准一定是内生的。好比说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当北大教授？只有教授本身说了算。从行政角度来讲，其所设立的管理制度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但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要求，好比规定发表几篇文章就够教授等等，这只能由教授们自己去评价。

至于必须确立公正程序，是为了防止内部人不公。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学术评价还有一个重要规范就是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三个系里的教授说了算。因为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外部的教授他怎么说你，所以引入外部评价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革到位后，今后谁能当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说了算，还要听外部同行说。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龙希成：你说今后谁能当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说了算，还要听外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部同行说，这个“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国外是不是？

张维迎：都包括。在我看来，有条件的院系应该扩大范围，多邀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评价。我再三强调，学术标准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跟做企业还不一样，做企业就是我这企业我有我的文化，而学术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认为是一个好的数学教授，结果人家外国人都不认你，那肯定不行。但是在中国，由于这么多年破坏了学术规范，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几乎完全谈不上学术规范。有人建议说中国要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院士，我看实在是不好选，因为没有一个规范、没有一个标准，你怎么选？不是说大家吵吵嚷嚷，提出一个口号就能建立的，只能是通过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准，不断引进外部评价机制才有可能建立。

有人可能不相信，认为选择好某些“科学”的指标就可以了，其实任何硬性指标规定都会导致扭曲。试想，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本身的学术水平就不高，他怎么来评高水平？还有人经常自称某某研究填补了国家空白，有什么重大创造等等。他自己能评价这个吗？不能！所以学术标准是内生的，我们只能保证程序上做到公开、透明，引入外部竞争，来保证尽量做到一个好的学术标准的树立。但不要期待一天就做到建立硬性的学术标准。

另外，每个学科的学术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理工科教授发表的文章特别多，他任何一个实验都可以写一个文章去发表。在美国，一个好的教授一年在SCI上的文章可能有几十篇，他带领一大帮人去做这个研究。但是，文科显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几篇文章够教授，什么样的杂志为够，你肯定不能硬性规定，只能靠本学科自己来定。

北大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以后按照学术水平评教授而不是按照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所规定的标准只是抽象的，你必须在本领域达到最优秀的层次，并没有规定你发表几篇论文。但接下来各个院系肯定会增加这个内容。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抽象的规定？这就又回到前面讲的，如果你没有定下具体的标准的话，操作起来会造成困难。

我常想，一流的大学是看质量，三流的大学是看数量。北大现在还不是一流，但北大想当一流，所以我们既看数量又看质量。当我们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不看数量就可以选出最好的教授的时候，我们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张五常写文章说，有人问在芝加哥大学当经济学教授要发表几篇文章？回答是“没要求”！不写文章行不行？也可以！但你要说话，让人家服气，知道你有思想，达到了那

个境界了。那就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北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此还必须从建立硬的标准，保证优秀教授的筛选入手，也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人的大学理念争执

龙希成：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理念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反对方案的人能够赢得那么多的呼声，跟民族主义情绪不无关系。有学者提出，引入外部评价标准，很大部分都是外国的东西，理工科、数学这些都可以，但是人文学科就不行了。

张维迎：北大方案并没有要求这一点。我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跟人家有差距？就是承认我们的学术规范跟人家有差距。你应该承认美国的好多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人家是做得比我们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借助别人的力量呢？知识本身就是无国界的。你可能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但不等于说你可以封闭起来，自己认为自己最好就行了。其实，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发展，好多都是靠引进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才一步步做起来的。我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中国第一部研究语法的书是《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根据的是“西文已有之规矩”；其他研究中国语法的大家像吕叔湘、王力，无不借鉴和参照了欧美语言的语法体系。20世纪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人物费孝通193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用的是从外国学到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乡村经济和生育制度，潘光旦更是留学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归来后用学到的知识“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20世纪被公认为中国最好的哲学史家冯友兰，他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后作的研究，从新的视角来整理中国的哲学。再如王国维，他是借鉴了尼采和叔本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文学。还有季羡林，真正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大唐西域记校注》，而他校注这本书主要参考了两部书，一本是日本学者的专著，一本是印度学者的著作。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如胡适，金岳霖和赵元任等人也都是这样。

赵 晓：我想，有人强调学术产品的不同，也就是人文学科的学术产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品跟自然科学的学术产品不同。但其实学术评比的规范和程序对于不同学科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张维迎：除此之外，科学还有个交流的问题。你自己搞的一个东西，你跟人家没有可比性的话，那怎么评价你有成就？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人家会学习你的方法。我想外国人也在学中国，只要你做得好，别人就会接受你，不会因为你是中国而拒绝你。华罗庚那么年轻就世界知名，足以证明并非因为你是中国人就不接受你。当然我们承认人文学科，你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感兴趣，但这仅仅说明你的研究对象可能跟人家不一样，并不见得不能使用共同的学术规范。

赵 晓：好比说，数学的评比，可以找全世界的数学家来评定，中国经济的研究可能只找一部分海外经济学家，如果是《诗经》研究，可能就全部在华人圈内找，但是评价的规范是一样的。

张维迎：其实，包括对《诗经》的研究，外国人也有很多，我们为什么不关注整个人类的学术成就，非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呢？

龙希成：学术交流，外部的人有他自己的标准，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对国际的标准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像在国际经济、科技、体育竞争的规则方面，中国人可以逐步对国际规范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维迎：我觉得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龙希成：就是怕外来的人的竞争使得他不能再得过且过。不过，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形成另外一种风尚，就是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赵 晓：我们的改革，更多借鉴的是美国成功的模式，来对已有的比较落后的治理结构、机制等等进行改革，但是如果我们将来真正是一流的大学，那么我们整个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的确不仅有借鉴的一部分，还要有创新的一部分，如有人提议将来要建立对中国文献的引用，等等。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像自然科学中国大概有六十几种杂志，都被国际 SCI 作为引用杂志。说明人家也是承认的。

如何使得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责任。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更多的还是要涉及英文。好比说在北大当教授我们要求应该能用一门外语授课，其实强调的是你要有一种语言能力，与另外一种语言沟通，并非说非要你用英文去讲课。

可以想象，就算你研究的是纯中国问题，但你总得参加国际交流会议吧。你要代表中国人的形象，你要使得你优秀的研究成果能让外国人接受，怎么能不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我想，至少北大的教授应该有这个责任。我自己有这个经历，我在牛津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去做报告，说他不懂英文吧他也懂几句，说他懂吧他又说不圆，所以这个报告就很糟糕，对中国人的形象破坏就很厉害。如果北大一个教授在国际会议上，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学术语言跟别人交流，别人怎么看我们？这难道是北大应有的水平吗？

但是，有些人过分把这个东西夸大，然后扭曲，然后就去批评。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龙希成：但是，在中国高校中是不是确有“英语至上”的倾向？

张维迎：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这样说，我们都希望中国早点走向世界，中文早点变成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这是我们大家都巴不得的事情。我本人写的大量的东西都是中文的，这对我也很有益处。但是，仅仅有这种感情是不够的，因为英语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和学术语言，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现实的选择就是，你要变得伟大，你必须先学人家的东西，然后才能把人家比下去，而不是回避这个东西。

像法国人，尽管那么不喜欢英语，但法国最优秀的学者还是用英语去发表文章。这对于全世界人类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它毕竟节约了我们的交易成本。想一想，全世界有几千个民族，每个民族如果只用自己的语言，不学别人的语言，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矛盾一定会更多，人和人、国和国之间更加没法沟通，战争也会更多，这是人类的灾难。大家有一种共同语言至少给大家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交流多了人们就可以互相理解，不同民族的人也能互相理解，大家矛盾就少了，就更容易和平共处。文化的交流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龙希成：但是如果把这一点推至极端，全世界那么多种语言，包括中国语言都毁灭的话，交易成本不是更低了吗？可是我们中国毕竟是一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一个文化大国、古国，我们的文化价值不应该被毁灭！

张维迎：当然不能推至极端，也不可能推至极端！我们希望保留并且提高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提高中文的国际地位的方法之一是要学好英文。举个例子，当我写了好比说 20 篇文章，其中有 2—3 篇是用英文写的，人家觉得很好，就会更有兴趣来看我的中文文章。这就好比“路演”，你先要给人家表现出来，才会有更多人来学中文。

龙希成：换言之，即使你不懂英文，你也需要别的懂英文的人把你的作品翻译出来，人家才能识别你的价值，这样你才能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张维迎：这就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价值。我们现在学英文，并非因为英文比中文好或者美，而是因为我们学了英文以后从中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并且传播我们的文化。反过来，如果人家觉得读了中文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人家也会学中文。现在世界上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相信，中文永远是世界上的大语言之一。如何在大学改革中，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保持我们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这是需要我们学者去考虑的问题。

从我自己来讲，我从陕北老家来，一开始我的普通话说不标准，至今仍有浓重的家乡口音。如果按照狭隘的逻辑推下去，那我连普通话都不应该说，我应该只说我家乡的语言。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

赵 晓：为什么我们总把中国文化看得那么神秘，那么不可比较？“中国制造”凭什么能让国外重视？如果只用中文，所有的说明书都是中文，中国的出口肯定完蛋。我们的产品越要走向世界，越要用英文的说明书。为什么单单学术产品就变得如此特殊了呢？！

张维迎：事实上，中国产品在国外销售，起的名字和商标还是能让外国人容易发音的，只有能够适应当地文化的，你才能很好地推广产品。

体育也是这样。我们国家队不出去，说不跟别人比赛，没有比赛，怎么会赢？

说到学术界，我知道包括人文学科在内，中国有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外国人不知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像北大有些文史哲类的教授，他们的成果要能变成英文的话，我想对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

位一定非常有好处，对于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也一定很有好处。

重要的是任何事都不要走极端。北大的教授应该有这个历史使命感，中国的人文科学的教授也应该有这个使命感，运用良好的交流工具，为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龙希成：有人不断强调我们的人文方面，包括中国人的信念、理念、价值等等具有独特的本土性，好像是只允许保护，不允许竞争，并且只有本土化，不能谈国际化的。

张维迎：本土化是什么概念？本土化就是你要用全人类通用的方法，人类知识共同积累的那些方法去研究本身自己的问题，然后还要走向世界。如果每一个民族都只讲狭隘的本土化，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本土化，每个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本土化，那根本就不会有统一的中国文化了。所以，本土化的问题既不可能回避国际化的问题，也和国际化不发生矛盾。

赵晓：其实，中国文化走向国际化的时候，是最能显示我们本土文化的价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走极端。本土化、国际化，自由化与规范化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张维迎：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能用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丰富的制度，国际社会肯定会承认的……

赵晓：而我们很难说这种研究是本土化的还是国际化的……

张维迎：我在商学院讲过，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我觉得所有学术发展都是这样，都是本土化和国际化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你毕竟在中国，但是你又要在世界上争得你的学术地位。

大学的治理

也谈“中国建设 一流大学”

赵 晓：请谈谈你对“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理解。有人认为，光学习是永远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譬如，在使用英语方面，国内永远比不上国外，那么干脆就跟别人学好了。国际上有两种竞争，一种是普通产品的竞争，另外一种是竞争规则的竞争。当你承认别人在竞争规则制定上的领导权，并且不能在规则上跟人竞争的话，那么你已经输给了别人，永远不会是一流的。

张维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些规则，有些东西，你知道你去竞争的话肯定要失败，因而是没法竞争的，你就只能接受。科学的规则犹如科学的方法，它本身是一种工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理解和发展人类本身。如果人家已经创造出一个好的方法，你为什么非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种别人没法接受的方法、制度呢？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2 \times 5 = 10$ ，你为什么要整天去研究 $2 + 2 + 2 + 2 + 2 = 10$ 呢？如果已经知道人家的某个规则和制度是最有效的，为什么你不去学习呢？我想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偏见。

赵 晓：假如北大办一份刊物叫《光华管理评论》，并要求用中文写



作，而且最激励最好的管理学论文发表在这上面，然后迫使那些以前用英文写作的人都到这里来投稿，外国人想要了解并且进入这个刊物的话，就必须学中文……

张维迎：关键要看刊物本身办得怎么样。这个东西不是一厢情愿，你可以搞这个刊物，但好文章没有人愿意往这发。

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上的一些杂志，它也是竞争出来的，行内人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好比说经济学，谁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那平均来讲就是最高水平的。这样的标准，我想大部分人就会认可。当然，真正最高水平的，不一定就是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有一些差的杂志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可能比它还高，但平均来讲，从概率上来讲，大抵如此。

其实，学术文章的等级也是根据引证数量评出来的，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标准，尤其“匿名审稿”制度。一篇文章要经过好几个评议人的批评挑战，过五关斩六将。这个过五关斩六将，也可能把一些最优秀的文章给砍掉了，但它基本上能够保证差的文章进不来，平均起来还是能保证最好的文章在上面发表。

赵晓：但如果你强调是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才能评教授，在《光华管理评论》上发表的就不行……

201

张维迎：这完全是误解！至少北大改制方案并没有说我们就只承认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但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理工科来说英文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并没有涉及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我个人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是用中文，比用英文多得多。为什么？因为中文本身有它的价值。但是你不能由于这个就否定你用英文发表的东西，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规则而言，我们必须看到，有好多东西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东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好比说我们搞体育比赛、足球比赛，人家已经有规则，你要做到提升我们的地位，你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打败他，拿冠亚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不是说不行，因为是你制定的规则，我们要参加一定输，所以我们不参加。我们成天讲要修改规则，也许每个民族也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游戏，但是只要你进入国际竞争，你就会发现规则有个“先动优势”，也就是说它一旦变成规则以后，要改变起来是很难的，相比之下，接受的成本反而更低。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要比较一下，我是成天争着改变规则、不遵守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人家的规则好呢，还是接受人家的规则，做出优秀成果，再逐渐参与到新规则制订中去好呢？我想是后者。乒乓球比赛就是这样，我们先参加，并且取得了好成绩，然后再参与规则制定。中国加入WTO其实也是这样，这有什么不好？

龙希成：但有人担心，在经济、科技和体育领域或许都可以这么比，然而说到文化理念，从周到秦到汉、唐、宋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理念和规则，如果我们丢掉这套理念和规则，我们可能会沦为二、三流，难以实现“世界一流”。

张维迎：我并不主张像这些东西都按同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大学改革本身会刺激人们对中国文化更好的研究。我们没有任何要求说你没有用英文发表的东西就是不优秀的，我经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北大的文史的一些教授，他们发表的都是中文文章，但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

龙希成：无论引入外部的评鉴标准还是奖惩规则，北大方案现在来看，都还是承认标准或规则的主流是在外国。

赵 晓：我以为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理工科和人文学科之间的不同，以及在改革方案中如何体现这种不同。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确具有许多独有的文化、价值、理念，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不同，所以我们的大学改革理念也会和他们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如何体现在改革方案里面？其核心仍然是我们前边讨论的那些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大学？如何理解一流大学？如何理解中国的一流大学？

张维迎：学科的不同特点，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也存在。数学是跟国际最接轨的，接下来的顺序是理科、工科、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排在最后，整个有一个差序结构。

在目前的改革方案的规则制定方面，已经尽量考虑到了这些特点。比如，对理工科普升教授的年限的要求、规定就和人文社会学科不一样，主要是考虑到，人文社会学科做成就需要的时间更长的特点。至于其他的学术规则，在这里面本身并没有限制，就是说收缩性空间非常大。再比如，方案规定原则上不留本院系博士生，但同时规定特殊的仍然可以留下来，这些“特殊”很可能会集中在文史哲院系，留给它的收缩余地可以说非常大。极端情况下，某个专业也许全

中国、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学校有，那你只能留。当然，这样的专业可能有个值不值得搞的问题，这就另议了。

另外，国际化我觉得永远不可能抹杀一个民族的一些特点，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古国，你不要担心它会被别的国家完全同化，没有谁有这个本事。从中国历史看，情况是非常乐观的，就是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非常之强。可以说，越是走向国际化，中国文化就越是有可能兴盛。

当我们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以后，绝对没有否认中国本身的特点，并非外国人研究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我们只是说，你要按照国际一流大学的要求，你在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能被别人承认你是最优秀的。这在理工科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也得有相当成就走向国际，人文学科也并非完全例外。西方社会研究中国哲学时引用的书，最多的还是冯友兰。当然，我们研究的一些问题，国际上可能完全无兴趣，但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而我们要从学校整体学科组合的角度考虑，不能拿出单独的一个特殊学科来理解整个大学的改革、来理解整个一流大学的发展。

赵 晓：你怎么理解“一流大学”？中国将来的一流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

张维迎：我理解一流大学，第一至少你在游戏规则里面，第二你所做的研究的成就得到世界认可，至少相当一部分得到世界认可。如果达不到这两点，很难叫一流大学。你说你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能得到人家认可？就是你对人类知识本身做出创造性、原创性的研究来。

赵 晓：一流大学是否必须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张维迎：对，这是一个前提。我们说一流大学就是指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非教学性大学。我们可以这样讲，有些领域可能的确没有办法跟国际比较，也就无所谓一流不一流了。一流二流必然都是可比的领域而言。我们可以设想，即使我们撇开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全世界只考虑中国一家，我们仍然要办成中国最好的大学，而且不是讲平均水平，而是讲你的历史学教授、法学教授、中文教授都是中国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点我觉得不能叫一流。不可比的领域就无所谓一流。有人说北大的文史哲研究已经是世界一流了，那你就自己关起门来姑且叫“世界一流”吧。

赵 晓：将来中国的一流大学跟国际上的一流大学相比，有些方面会相同，有些方面会不同吗？

张维迎：对。但是，北大如果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拿出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国际水准的东西，并被世界认可。

大学配套改革及中国 大学集体崛起问题

赵 晓：现有改革方案主要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而外部层面，也就是国家、社会、大学这些关系的理顺上，好像基本上还没有触及。如此大学的改革会成功吗？

张维迎：这方面当然只能呼吁政府。我本人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好比说光华管理学院创办EMBA，就是一个创新，但最后国家承认了。这跟安徽小岗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一样，一开始正式制度并不接受，但最后政府方面就接受，并且推开了。所以，我的理念就是，你干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相信你最终是会被接受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中国目前各个大学都得有改革精神，你不能等着上边让你改你再改。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要你校长干什么！

赵 晓：你尖锐地批评过国有企业，认为产权不清的国有企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北大改革有无“产权”方面的困扰？

张维迎：北大这次改革只是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迈出的一步，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必须彻底地变革，仅仅靠我们自己做这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做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做了。我们当然同时还期待着下一步的改革，特别是通过内部改革促使上边改革。

前面提到，改革不存在“一步到位”。中国改革突破点的选择，往往都是改革后会引起新的矛盾、提出新的问题、带来新的改革的地方。比如，国企改革先改了企业自主权，结果很快发现价格制度不改不行，这就迫使我们改价格制度，价格放开以后又出现恶性竞争的问题，然后我们逐步改产权。我想大学的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理想的目标，或者看到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就梦想一步

到位。我们这次讨论北大改革的时候，主要就考虑它是否有助于其他方面的改革，而我们认为答案是明确无误的。

我曾经公开提出三个命题，并提出任何人能证明这三个命题，那北大这次改革就不要搞了。第一就是这次改革会阻碍大学行政制度的改革；第二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降低学术自由；第三个就是这次改革会降低教授的权力。

任何人要能证明这三个命题，那这次改革就不应该进行；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三个命题，那我觉得所有批评意见都够不上真正反对改革的理由。

这次改革之后，势必触及一连串的改革。许多改革都涉及配套，大学改革也不例外。大学的配套改革涉及社会的协调问题(coordinate)，如果没有这些协调，仅仅北大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可以说，如果仅仅是北大改革，其他大学都不动的话，真的不会成功。但是我相信一点，北大改革以后，其他大学会跟着改革。一旦形成竞争以后，你要办成一个优秀的学校，靠老体制是撑不住的，一定要改革。而这次改革以后，我自己从作为一个教授的角度讲，绝对不是想使得北大继续鹤立鸡群。中国有1000多所大学，北大、清华如果总像目前这样鹤立鸡群，其实是悲剧而不是喜剧，在这1000多所大学中间，将来跟北大、清华不相上下的至少应该达到十几二十所，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市场和学术规范，才会构建起中国一流大学的根基。

赵 晓：就好比是产业集群，一个企业胜出是建立在同产业一堆企业基础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学集群。如果没有众多的二流大学，以及十几二十几所接近国际一流的大学，北大、清华绝不会成为一流大学。

张维迎：就是！北大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它是驻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你一定要有大量的不相上下的大学之间进行竞争，中国才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就像体育比赛要有大量一流选手的竞技才能赛出国际记录来一样。而我们过去的体制恰恰是自我循环，从而上演“马太效应”，强者益强，弱者益弱。北大清华，每年高考最好的学生都往这儿跑，其他大学只能录取北大清华之后的学生，国家的经费也分开差距，维持、支撑这两所名牌大学，这使得北大清华事实上有点像温室里的花朵。而我们讲，一枝独秀不叫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通过大学改革，中国大学应该迎来一个“春色满园”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的新的时代。

赵 晓：你的政策含义是，在外部治理上，要明确反对国家对北大、清华这种过度的倾斜和保护，转而鼓励大学之间平等竞争。

张维迎：应鼓励公平竞争。现在政府办学的想法，是认为有钱就能办出一流大学。这是完全错误的。办一流大学，钱固然重要，但机制更重要，否则再多的钱都会浪费掉。这其实是我们下决心改革的关键所在：我们改革以后，其他大学跟上，北大的博士到其他大学教书，其他的博士也到北大教书，学术交流和学术规范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赵 晓：顺便插一句，国际上一流大学中间，有没有国立大学的……

张维迎：当然也有。在美国就有许多州立大学，但它的管理体制和我们不一样。

我接着谈大学体制配套的问题。现在北大、清华好多人说一旦离开了就没出路。哈佛大学一年新招的教员淘汰 90% 都有出路，为什么北大要淘汰 20%—30% 都没有出路？就是因为其他大学相比北大，大家都认为条件差距太大，都不愿去。在美国就是，如果哈佛大学打 10 分，其他大学就打 9.8 分，9.5 分 9 分，8 分，这样才形成一个市场，但中国现在不是这样。

谈到政府对大学的管制，我想说，也与学术规范有关。美国的大学从 100 年前，就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真正形成学术团体 (professional society)、学术社团，还有杂志，这些对于一流大学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但在中国，成立学术社团是不自由的。像中国经济学界，至今没有办法成立一个专业社团，你成立社团要经民政部门审批，而真正得到批准很难。另外你看我们好多学科都缺乏像样的学术杂志，因为办一个杂志同样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如办理刊号等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我们想评选一个营销学的教授，但中文刊物中没有一本真正的营销学杂志，要办这个杂志又办不起来，你拿不到刊号和批号，真是急死人。相比之下，社会上乱七八糟的杂志反倒得到刊号，非学术的杂志容易得到刊号。为什么？他们能赚钱，所以就有人去搞关系搞公关。教授们呢，比较清高，谁也不愿去干这事，结果刊物就老也办不起来。我想我们国家的许许多多的管制对学术的发展的确有很大的制约。

所以我们呼吁要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如果不能自由地创办法学学术杂志，不能自由地创立学术社团，那么中国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就有很大的问题。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我想刚才强调的这两点很重要。就是自由办刊和学术竞争。政府现在太注重怎么样从企业的角度来考虑怎么办好大学，而没有考虑怎么样从机制、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办好大学。我强调，一流的大学一定是一个自由的环境下竞争出来的。

我想通过这次改革会促使政府进一步的改革。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教师制度改革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这样一个改革“突破口”。

我想补充一下的是，外部环境也与学者水平高低有关，也具有内生性。学者学术上站不起来，他就老想着用其他办法来打倒、超过别人。他写文章写不过你，就专找你文章中有“政治错误”的地方，写报告给上头，上头一批评你，就把你给扼杀、封杀了，而他就显得有地位了。有这么一种人，是因为批别人出的名，而这个批又不是学术性的批判，而是政治性的批评。所以学者水平低的现状会内生性地造成学术不自由，引发低水平的、非学术性的竞争。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改变这个现状。

赵晓：我非常同意维迎的话。政府要真心想让中国出世界一流大学的话，关键不是给钱，而是给政策，特别是要通过改革，致力于创造一个大学发展的外部与内部的良好制度。但是，改革也是要成本，要花钱的啊，这怎么理解？

张维迎：有人说我要改革得有钱，没有钱怎么改革。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要说，正因为没钱才要改革，“穷则思变”。如果我们的教育经费多得不得了，那就可以广种薄收，就像美国，土地丰富，种子一撒下去，然后机械化操作就完了。正因为我们中国钱少，怎么使得这个有限的钱发挥更大的效益才成了大问题，改革才显得尤为迫切。

龙希成：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希望教育部对于这次改革提供什么支持？

张维迎：我个人当然希望教育部大力支持，能够推动这个改革。但是，任何一个大学校长，不能因为上边没有命令，就不去改革，这是失职。在目前来讲，任何一个大学校长，不去改革，就是失职。当年万里讲过一句话：“可以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

赵 晓：有人说，改革的方向是教授治校，是这样吗？究竟如何理解教授在学校的权力问题？

张维迎：首先，我们要看到，大学是创造知识、教书育人的地方，因此它和企业在好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企业有一个所有者（owner）的问题，但是大学不能有所有者，最优秀的大学一定是非盈利性的，而不能是盈利性的。大学的理念决定它追求的是更长远的一种价值，以及对全社会的价值，而不是短期的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变现的价值。当然大学里有不同的学科，有些学科的情况有所不同。好比商学院，我叫它为垂直一体化的组织，上面有博士，那你就要给他大量的奖学金养活他搞研究，而下游则有短期的培训、MBA，你可以收费。但是总体来讲，大学是非盈利的组织。那么大学，究竟该由谁说了算？是教授还是行政人员，是学生还是校友，还是政府？

我觉得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有问题。理想的大学的基本治理结构，理论上可以叫做“利益相关者（state-holder）治理结构”。在这个团体当中，教授应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作为一个组织，又不应该是我们简单讲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什么概念？现在并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在国外，大学有的已经叫做（multi-versity）而不是叫 university 了，即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组成。你说“教授治校”，可是不同学科的教授的想法大不一样，你听哪个教授的？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上大学的趋势并不是教授治校，而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 leader（校长）。

赵 晓：大学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但是这个校长应该如何产生呢？

张维迎：我马上就说这个问题。我先说大学其实是好多人的大学，社会对它也有影响。大学怎么治理？不可能是教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听听社会对你的需求，你要听听你的校友和学生对你的要求，当然也得听教授的意见。但是大学最终作为一个组织，有自己的逻辑，它要有效率，又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来 lead（领导）。校长对大学的成功很重要。

我再来谈如何选大学校长的问题。美国的大学校长是通过它的校

董会 (board of tee) 来遴选的，校董会在遴选过程中间有遴选委员，吸收一些教授和校友甚至学生参加，但是最终的决策权是校董会。校董会决定校长，校长一旦任命以后，他就有足够的行政权。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比美国的要小得多。其实，一个优秀的大学，很重要的是要选好一个校长，校长一定要有足够大的权力，再让校长选好的院长、系主任，然后他们建立一些规则，吸引院系负责教授的招聘等等。我们现在离这个要求还相差太远。我想，以后校长的任免体制应该改革。在中国，像北大的校长，我觉得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来遴选。

大学校长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职业市场 (the professional market)。我印象中，最近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或者是一个院长正竞争纽约大学的校长，据说很可能成功。大学管理必须职业化，不能业余化。对照之下，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双肩挑”，就是你作为一个教授，要继续搞你的研究，同时又要来管这个大学，管行政。这是搞不好大学的。大学校长必须职业化。你原来可能是个优秀的学者，但一旦当了校长以后，衡量你的惟一标准，其实不应该是学术，惟一的标准是你这个学校搞得好坏，关键不是说你当了校长以后还发了几篇文章，而是说你的学校一年发了多少篇文章。作为校长的你可能一篇文章都没有发，但没关系，只要全校发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上去了就是你的贡献。甚至你根本就不应该再去发论文，你全身心的工作就是搞好这个学校，你应该是职业化的校长。所以强调校长“双肩挑”是不符合主流趋势的。最近我们见了香港科技大学创办校长吴家麟，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学者，但他当校长以后，10 年中惟一的工作就是怎么把这个学校搞好，我认为这样的校长是值得钦佩的。

赵 晓：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评价教授是学术标准，评价校长是管理者的标准。

张维迎：对，对校长的评价标准和对教授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

作为大学职业管理者的校长非常重要，他的选拔也就非常重要。当然一般大学的校长都是从各个学科选上来的，但也有从外部聘任的。这里面还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学科背景的人当校长更合适。应该说不会有统一的答案，更多的应该看本人的素质。但中国目前大学校长可能太多来自理工科，来自社科人文方面的不足。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赵 晓：有一种意见认为，大学改革先改教师而行政人员不改是错的。第二个意见就是校长凭什么他有权力赶人走。

张维迎：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钻牛角尖的说法。任何一个变革，总得有人去推动。邓小平推动改革，有人要怀疑邓小平，你怎么上去的，这就没有办法说了。欧洲好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是国王推动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国王的权力基础，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赵 晓：但是，像国有企业的改革，一般都是先改厂长，先选一个好的厂长，选一个能人来当厂长，然后由他来进行改革。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尖锐。我只能说，一个企业的厂长的重要程度，应该远远的大于一个大学校长的重要程度。而且事实上国有企业也不是先改厂长，国有企业先开始是让职工流动啊，奖金制度改革啊等等。现在的国有大企业的厂长，也还不是竞争来的，仍然是组织部门任命的。

我这里不评价国有企业改革对不对，只指出对校长改革合法性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

蔡元培被公认为是“北大精神之父”。他是谁任命的？是民国政府任命的。你能不能认为蔡元培是民国政府任命的，就说蔡元培的改革都没有意义？说大学的校长任免制度需要改革，不等于说现在已经在校长位置上的人推进的改革就没有合法性。

我要略微展开一点谈的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思考社会变革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思考。我想首先他得对得起历史，10年20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你当时说的话究竟是不是出于公共理性，而不是掺杂了个人利益或情绪。对于知识分子，我们通常强调他对社会的批判性，这是对的，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但往往为中国人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知识分子发言时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历史与社会的责任感。你批判不能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完成历史与社会目标。你批判一个东西不行当然可以，但你一定要负责任，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

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历史与社会责任感在面对重大改革时更是重要。这是因为，批评现有制度，你可以不提出建设性的的东西来，你批判的目的就是促其改革；但你批评一个改革措施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的校长制度不是没有问题。美国一个校长再加一两个副校长

长，管学术的和管行政的就够了，下面大量的事情让院长、系主任去做。牛津大学是一个校长加五个院长，重大决策全都做出来了。我们现在这种大学的体制，运行起来太难，管理是非职业化的。

我们谈到职业校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职业校长不应该以上当官为目标。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人当校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理学校，而是为了下一步再提副省长。这其实是毁大学。我想，有关部门应该有一个明确规定，政府不从大学校长里面提拔行政官员，要断他的路。大学校长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官员，当校长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当好你的校长。

另外就是大学校长的任期，也是个问题。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太短。哈佛三百几十年的历史，现在大约 30 任校长，北大 105 年的历史，已经是第 28 任还是第 30 任校长了。一个大学校长没有 10 年的任期是不行的，校长要从熟悉情况到制定和战略实施，没有十年很难。

从校长的遴选制度到他的任命的期限，还有校长的职业化。我想这些将来在中国都应该形成一种文化，特别是在教授当中应该形成一个文化，谁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什么样的标准是做一个好校长的标准，这些应该在教授们之间形成共识。

谈“教授治校”在这个层次理解，我觉得是可以的：学校有关教员晋升的标准，学科的设置，教授要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学校重要制度的变革，教授应该有发言权。但即使这样，最后谁说了算？还应该是校长说得算，至少校长要保留否决权。

教授如果过多地参与行政性的管理，不一定是好事。有一项在美国几百所大学资料基础上做的研究。这项研究把这个学校教授参与的程度画了个等级，做了一个序列，然后根据科学发表的论文，还有美国报纸对大学的评比，再做一个序列，对两个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教授参与程度越高的大学，performance（业绩）越糟。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个研究，我觉得结果可能更加可信，就是把教授的参与分成两类，一个是学术性（academic）的参与，包括课程设置、专业设置、评定教授的标准的参与等等，另外是资金分配等行政性的事务的参与，结果发现：教授如果只是参与学术性的管理，那么参与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好，而教授对于行政性管理的参与则相反，参与越多，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差。这是在 2001 年发表的研究文章，非常值得重视。

赵 晓：看来，大学校长像职业经理人，而教授的参与最好局限于学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术管理的参与，尤其不能搞得像工会。

张维迎：不一定是福利型的工会。大学这个组织比较特殊，好比说，企业有一个所有者，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其他人都承担过失责任、有限责任。但是，大学每个人不必要都承担责任，大学教授就应该像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对一些重大制度的变化进行决策，而学科建设、学术性事务的参与教授应该基本说话算数，校长保留否决权。对于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教授不宜参与。教授治校如果意味着什么事都是教授说得算，一定是没有效率的。有人提到什么一个财务处长权力比教授大多了，其实那是当然。试想，如果每个教授都去搞财务工作，那学校还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刚才所说是以后的理想状态，在过渡时期，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校长，应该给他更大的权力。国外是这样，像哈佛大学校长 Lawrence Summers，他要改革，就要求有足够的权力，那他才能去改革。我们的情况更是这样。

为什么说校长的权力在过渡时期应该大一点。这是因为，在过渡期间，大多数的院系还不行，他本身教授水平不行，系主任水平不行，你给他权力大了，他就会“武大郎开店”，继续近亲繁殖、拉帮结派。所以你这个权力不能马上放给他，要有一个过程。而随着教授质量的提高，各个院系、教授自治的权力就应该越来越大。这涉及我们通常讲的信任问题。我对你没有信任，当然给你权力小一点，我对你越信任，给你的授权就越大。我信不信任你，完全看你的表现，包括你的水准。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们一开始招人的话，每一个人都是我去谈话，现在有几个系建的很强，我基本上也就不管了，全交给他们。

当然，行政系统也是要改的。行政系统改革的方向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市场化、职业化（professional），整个大学的行政管理都必须朝这一方向走。

大学改革的方向

大学改革：先改教授还是先改行政人员？

赵 晓：有人说北大现有的行政人员与教职员比例太高，真的吗？

张维迎：关于北大行政人员与教职员的比例，好多人有误解，大体上是各占一半，多不多呢？我知道在美国大学所有的雇员里面，包括副教授在内的教授，就是 faculty 的人数，他们的比例与行政勤杂人员的比例达 1:3 至 1:5。斯坦福大学，所有的雇员里面，教授研究员占的比例才 16% 多，更少。

其实，一个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是需要庞大的行政性服务的。这个与谁重要不重要，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正因为教授重要，才需要很多人为他服务。现在中国大学的行政人员，根本上不是数量上多了，而是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从效率的角度，三个教授至少要有一个秘书。我们决不能形成一种片面的理解，说大学教授少，所以应该减少行政人员，那问题就来了。医院是医生重要，是不是把护士都取消了呢。一个总统出国带几百人，你说总统不重要？正因为总统重要，他才需要那么多人。这是基本的管理需要。其实，一个大学里面，究竟谁占主导地位，不能以这个人数而论。

中国的大学，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大家把焦点弄错了。焦点并不在行政人员的数量，而在他的质量和服务，行政人员是不是真正为教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授、为学生在服务这个问题上。

这一点又与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有关。国家管制大学，国家给你拨钱、给你分项目，这些都要靠行政人员去争去抢，教授有谁愿去争的？所以自然就造成了有些行政人员的权力大。这就像企业，在企业里面，搞销售人员说话的权力是比生产人员大，因为钱是从他手里拿来的，你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框架还是可以改变的。大学的行政将来主要是服务。而要改为服务、体制就要改。干不好的人，你就得走人。这个跟教授还不一样，行政人员是永远都不会设终身职的。

赵 晓：教授治校，什么事情都做，实际上不专业，而缺乏良好的服务，教授的专业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张维迎：教授的心思也不应该在行政，因为衡量教授的标准是学术标准。

有人举蔡元培教授治校的例子，但可能误解了蔡元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蔡元培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换教员！试想，不换教员，蔡元培请来的那些优秀的教员能有学术自由吗？要知道，原来的教员都是老爷，学生也是老爷，毕业后是要去当官的，教授们哪里有什么学术水准，哪里谈得上学术自由？你让他去治校，那不是开玩笑！

赵 晓：有人提出“学术民主”，你怎么看？

张维迎：有人提出“学术民主”，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学术哪能“民主”？对于中国的大学，大家喊民主，但是不懂民主。好多该民主的地方他不民主，不该民主的地方他乱民主，那是不行的。像哈佛，各个院系独立性很大，耶鲁大学各个院系的独立性就很小。各个学校的传统、文化不太一样，你要什么样的民主？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大学发展不能搞极端民主化。李远哲在台湾大学的改革搞得一塌糊涂。他什么都是选举。一选举之后教授们不得不加入一个个党派，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台湾大学每个系都分成民进党、国民党、新党，都变成几派，把政治引入大学，这是破坏大学的举措，而不是建设大学的举措。李远哲在台湾搞的大学改革是失败的。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美国大学的教育体系。

龙希成：行政勤杂人员没有服好务，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职业化的标准和规则来做事。现在我们先改革教员聘任制度，是不是同时也要配套推进行政勤杂人员的规范化？

张维迎：任何改革，如果你同时推动好多种改革，只会引起功能紊乱。就像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病，既要切除腿，又要切除阑尾炎，但他只能先选择一个。你不能说一半医生给他锯腿，另一半医生给他切阑尾炎，那他死定了。你只能一个一个来解决，我们选择的依据是第一个问题解决后有助于第二个问题解决，至少不阻碍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这样就可以逐步推进。

原因在于，教员水平高了，一是他对行政人员服务水平的要求当然就会多，二是人家也会更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院系里面行政人员态度不好，但是对不同的教授态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大家对高水平教授的态度都比较好，而对差的教授他就敢横。这也是内生的关系。

如果说北大校方宣布行政系统不改，那反对是可以的。但我们可以先选那一个改的问题，而不是“改与不改”的问题。有人批评说先改教员不好，那么先动行政人员，是不是更有说服力呢？我想是更没有说服力。

赵 晓：外界普遍传闻这次北大改革是要裁员，现在看来原来是北大要选人，而不是裁员，因而也就谈不上裁行政人员。

215

张维迎：对！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3年之后如果大家都认为行，3年之后这些人可以都留下来了，无需走人。

另外，行政改革，从人情的角度来讲，任何改革都不能不警告，就像法律公布以后，并不是说今天公布今天就开始执行，可能是自公布之日起几个月后或明年开始执行，你总得给人以改变的预期。现在教员的改革，实际上给了教员们3年的预期！3年之内没有任何人要求你走，除非你自己要走。3年之后才有一些变动。行政人员要动，那是说动就动，立竿见影，不存在3年试用期的问题，更没有终身制的问题。

赵 晓：这一点认识很重要！很多人的确认为北大是在裁员，且提出要裁员应从裁保姆和保安开始，而不是先裁主人，看来纯粹是误解。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张维迎：行政和教学是两个系列，对人的素质要求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行政人员，你不能要求，说他没当上讲师就怎么样，他只要做好秘书就合格了，就像打字员做好打字就可以了。但是讲师不一样，提不了教授，你当一个好讲师也不行！这是完全不同的。

大学教授的制度，我再重复一下，她只是为人类人口当中1% - 2% 的人设置的，不是谁都有资格。在大学里面当教授是一种特权（privilege），而不是一种权利（right），不是我有劳动的权利，我就有当教授的资格。行政人员的改革方向则是更加市场化。

赵 晓：换句话说，你如果可以在北大当一辈子讲师，那么这个制度就不是为1% - 2% 的人设计的，而是变成了为10% - 20% 的人设计的制度。

张维迎：是这样。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些教学型的岗位就是专为讲师的，那就是讲师水平，但这不是我们教授的主体。北大作为研究型大学，教授的主体就是创造知识。

赵 晓：谈到教授主体，在英国，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教员都是教授。北大今后教授比例是不是上升趋势？

张维迎：在北大也可能。北大有约教授800人，副教授约800人，讲师约400人，教授占40%，还有50岁以上的副教授也是终身，算下来也是百分之五六十了。

不过，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比例。北大改革的目标是吸引最好的教员，留住最好的教员。任何一个优秀的教员，我相信北大校长一定不会让他因为没有名额提不了教授让他走的。现在有名额控制，是因为不控制不行，但是以后逐步会变化。在北大，将来你只要合格就能当教授，而不是说我3个人都合格，但只有一个名额，两个人评不上教授，而是3个人都合格3个人都当教授。岗位是对所有教员的岗位，而不是对教授的岗位。好比说北大，我就2000个教员，如果这2000人真正都达到了全国最好的、最优秀的，这2000人都可以当教授。当然这里有选择和淘汰机制，动态来讲不可能那样。比如说有退休的人，新招的人马上提教授，这不太可能，因为有试用的问题。有一些院系，像历史系，教授的比例可能很高。以后北大再想当教授，我理解，不是说3个副教授中谁好谁不好，而是说3个副教授要整个跟社会竞争，跟其他大学竞争，而我们自己内部并不存在竞争，我们是整

体跟社会竞争。

这样的话，我们3个人可能合作写论文，如果我们3个人都表现得很优秀，3个人都当教授，我们就胜过了外部的竞争。但是目前要一下子取消名额限制还很难，这涉及院系本身的管理、自我约束。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 公共理性问题

赵 晓：我们这次改革，从公共选择的程序上看，我们采取的是大讨论的方式，其中改革方案一稿、二稿都上了网，大家都在讨论，不仅利益相关者，甚至全世界都可以参加这个讨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张维迎：这个是“歪打正着”，没有什么目的。本来一开始只是想内部讨论，但这是信息时代，有人放到了网上，就发展成了社会讨论。

龙希成：但是其他好些大学不是这样，像南京大学就搞得很好，但没有引起大的讨论。

张维迎：北大可能跟其他的大学不一样，自由讨论的空气比较强，也比较容易受人关注。清华大学做好多事，都能静悄悄地做。但北大不行，北大一点小事就会满城风雨。

龙希成：你怎么评价这种大讨论式的推进改革的方式？

张维迎：现在还不好评价。有好的地方，就是“商议性民主”。先寻求大家理解，广泛讨论，达到共识，即使没有达到全部共识，大部分人达到共识也可以。因此讨论起来比较费劲，但执行起来会顺利得多。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领导把握不好的话，他会把少数的反对声音当做多数的声音。因为在任何一个公共性的改革当中，拥护的人一般不说话，反对的人才去说话，但容易让人误以为反对的声音多。

龙希成：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负面的效应，社会上不管反对声音和支持声音的大小，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乱糟糟，容易走形。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张维迎：我很赞成邓小平不争论的做法。如果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全民大讨论，那准完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一开始确实只有少数人能够认识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领导者。任何一个组织在变革的时代，这个组织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那就不能叫变革了。

龙希成：这同样需要校长要有特别的判断力，能择善而从，不被舆论左右。

张维迎：这个在中国与国外也不一样。在国外，校长要推进改革，他是坚定不移的，根本不在乎你反对的声音，我可以听你的意见，可能有些地方要做些修补，但该推的还是要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大家可以自由表达的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因为某一个改革措施有人反对就不去做，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达到全民一致。国外有国外的机制，比如说全民公决。但即使全民公决也规定，51%的人同意就行了，另外49%的人再反对，照样往前走。要100%的人同意，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我们这次改革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但是要照顾每一个人的利益，要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包括你说的每句话让每一个人都满意，那不可能。

218

龙希成：这次讨论中，似乎文史领域的人反对的声音比较多。

张维迎：我想这也许跟学科的特点有关。北大的理工科、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和国际的接轨比较近一些；而人文学科较逊色，这可能是个原因。但我相信，有些批评者过分夸大了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人文学科必须要有科学基础。我坦率地讲，有些反对的声音，我有时候真不好回答。因为我们讨论问题总得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如果你不承认这些共识，你从这儿抓一句话，从那儿抓一句话，然后批评，那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必须承认 $1+1=2$ ，才能开始讨论数学，但你非要说 $1+1=2$ 不对， $1+1=3$ ，以此来讨论你这个等于三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

龙希成：如果北大主要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会怎么样？比如设立“北大高等研究院”；像光华管理学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似乎都是增量改革成功的经验，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改革以来的成功经验。

张维迎：其实我们这次引入竞争也是增量改革。你看所有的教授都不动，这本来就是增量的问题，但是我讲过，完全的增量改革，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回旋的余地。完全的增长改革达不到改革的目的，20年北大都改不过来。

赵 晓：是因为前面说的“坑”都占满了。

张维迎：是这样。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尽量推进增量改革，包括学校采取好多的措施，让不适合当教授的人转岗。所以我说这次改革根本谈不上是“休克疗法”，只是小跑步小修补。没有哪个改革比这个更温和的了，除非你不改革。如果你要达到目的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是最温和的一个改革。我知道反倒有一些学校搞了“就地卧倒”啊，那可是激烈的改革了。

龙希成：这次改革引入竞争规则，是用企业的逻辑、用市场竞争的办法来办大学吗？

张维迎：我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大概因为我是经济学家，更习惯用企业的一些概念来说事。而一个数学家来考虑这个问题时，他可能会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历史学家则会用历史学的语言来说。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用“企业的逻辑”来改大学，我想我们用的是学术的逻辑、大学的逻辑来改大学。如果按企业的逻辑的话，总经理干不好3年就要赶下去，他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而我们的教授可以稳定地做下去，这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们更多地在这里考虑到的是大学和企业不一样，才设计这样一个体制。

赵 晓：大学的逻辑与企业的逻辑，究竟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哪些不相同的地方？

张维迎：不同的地方很多，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理念不一样、产品不一样、生产队伍不一样、目标不一样、管理方式也不一样。

好比说生产知识和生产一般的产品不一样，因此试用一个教授和招一个工人不一样。大学每一个产品包括着透明性，好比说这个教授写的文章，他一署名大家都知道，但是企业卖的电视机，究竟是哪个工人生产的，没人能看出来。这里面就有许多的不同。

但是，有两点是所有组织，无论是大学、政府、企业还是宗教组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织都具有的共性。第一是选人，你必须选出能够实现你这个组织目标的人；第二你怎么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这两个问题对所有组织都一样。

我刚才讲，企业需要的人才和大学需要的人才是不一样的。企业可能只需要一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就行，但是大学需要的是能够创造知识的人，两者选择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企业选人并不见得需要博士，好多企业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并不妨碍企业发展。但是，大学不能说像企业那样，因为大学有大学的逻辑。大学要实现大学的目标，要按照大学的标准招人。我们一再强调，大学光招一个“讲师”还不行，除非这个讲师能当教授，否则就得出局，即英文讲的“up or-out”。而企业不是这样，企业要求你只要做好这件事就行了，招秘书就是为了要一个秘书。由此看出，大学设计的选人制度跟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是激励人。怎么让人有积极性去做工作。企业员工如果有铁饭碗，可能就没有积极性去工作了。但是大学的教授，当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时，他好多的偏好是内生的，是自我的冲动，靠自律就行了，即使他拿到铁饭碗，他仍会不断地做研究。当然我们也得给他有点压力，但是这跟企业还是不一样。企业不敢说任何一个保证可以让人工到终身，企业连自己能存在多少年都不敢保证。而大学一般不会倒闭，大学的保证相对是长久的保证，只要你有水平拿到终身教职就可以了。

我感觉这两个问题一样，但因为性质、目标不一样，企业对自由的限制就比大学多得多。因为大家的理念不一样，大学要让人创造知识就一定要让人能自由地思想，所以我们才用学校来保证他的自由。不过，我们现在说的 Tenure 制度和铁饭碗是两个概念。铁饭碗是不用经过竞争就能得到的，而 Tenure 制度是经过充分的竞争来选人的一个制度，所以这两个制度是不一样的。

赵 晓：企业生产的是标准化产品，所以不能让员工自由发挥，大学生产的是非标准化、创新型的产品，所以必须让人自由发挥，是这样吗？

张维迎：有这个因素。许多企业，包括上班穿的服装都是有要求的。大学则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说北大是用“企业的逻辑”来改大学是很不恰当的。如果分析一下，我们真正用的是大学的逻辑来改大学，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大学的理念。

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北大建设最好的教师队伍，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保证学术自由，破除官本位并提高教授在学校决策当中的权力。我们的目的都是往这上面靠。我看不出任何改革与这些目标相悖并损害这些目标的。

事实上，北大很多人的讲话都很让我感动。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个讲师说：“假使3年之后、6年之后，我必须离开，我也认为值得。因为这是我来北大的目的，因为只有北大保证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在北大待得住，这才是我想去的地方。如果最后证明我不优秀，我宁可自己离开。我不愿意去一个不尊重学术地位，拉帮结派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给我正教授地位，我也不去。”这样的话你感动不感动？

赵 晓：感动。不过，要拿到 Tenure 这个“铁饭碗”要付出很多，可不是随便给你的。

张维迎：没错，那是你争来的，是你做得优秀的回报。而那个时候那你的腰杆就硬了，当一个人真正在这个体制下成为北大教授以后，那他说话的胆量就会大得多了。而现在好多情况下，他的位置要靠拉关系，或者靠找人照顾才得到，那他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

龙希成：面对这次大的讨论，你是否感觉到压力，或者会不会屈从于舆论压力而在方案中做一些折中？

张维迎：没有。

赵 晓：但似乎方案二和方案一相比，还是有很大的改动。

张维迎：没有很重要的改动。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我们讲，学术标准我们只能靠程序，比如说招人，要公开招聘、公开面试、教授投票，等等。那些不优秀的人要混过这些关就很难了。过去的话，两个人，系主任或者院长说行就把他弄进来了，别人没有发言权。现在要增加教授的权力，我希望以后教授的权力还能增加。

但是，我刚才强调，不要说什么事都是教授说了算。哪个教授说了算？那么多的教授。行政一定要讲效率，管理一个组织不能用那个大民主的办法，包括校长的任命啊，都是这样。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赵 晓：能不能估计一下，北大这次改革，实行下去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是受损者？

张维迎：首先，整个中国社会是受益的，国家是受益的，学生是受益的，优秀人才是受益的。受损的人有没有？有，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也许在其他的地方找到更好的岗位。

我总讲，大学是为少数人准备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场所，不是养老院。谁要进来，首先要看自己够不够这个资格。

好比说现在很多人谈到高考。高考有没有弊病？当然弊病很多，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谁能找出比高考更有效率的一种办法？我看找不出来。

有些人批评时爱走极端。这又回到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原则和立场。西方社会为什么进步？像英国，他从12世纪开始，就发展起一种公民的基本文化和共识，就是当我们讨论任何一种公共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去讨论。你看英国所有有关税法、各种变革的争论，大家都是建立在这个平台上批评它、支持它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缺陷，就一举打倒，除非我们找到更好的替代办法。

对于改革的措施也是这样。要建设性地讨论问题，你一定要有建设性的意见。你的替代办法是什么？我批评政府很多，但是我提建设性意见，好比我说政府不审批的话，市场自然会建立它的信誉，就是建议由市场竞争来替代政府管制。

政府和学校这一块，我想以后要建立一流大学，大学要靠他自己的品牌。对自己信誉、声誉的关注来维护它的质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行政的办法去维护它的质量。

中国大学改革之前景

龙希成：你对中国的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前景怎么估计？现在似乎有很多的大学都在积极改革。河南省要求所有省属高校都实行聘用制，校长要公开招聘。

张维迎：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能停下来的。其实好多学校都在改革。只是改革步骤有快有慢、措施有大有小、力度有强有弱、方式也不太一样。

北大改革的优势在于，我们有一个系统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我们明确了一个着眼于长期的、持续的提高北大学术地位的取向，并稳步推进改革。像有一些学校硬要来“愣”的，比如说所有教授都聘3年、3年后再谈，那样的做法我认为实行不下去，只能变成一个口号，最后不了了之。

想改革的人很多，但是找到真正可行的、能持之以恒的有效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北大可以给大家起一个先驱和示范作用，好多学校都可以参考北大的思路改革。当然有些学校人数少，改革空间更大，现有的人都保护下来也是可以的。但北大做不到这一点。还有的学校人比北大还拥挤，那他可能连教授都要减。这都是可能的。但是基本的模式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样。

我相信竞争的力量。某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改革的话，最后很难成功，会在大学的竞争中败下来的。我在光华改了几年后，现在其他大学的管理学院都跟着光华的办法做，光华管理学院在全国商学院的教育当中可以说在好多方面都创立了规则。别人遵守我们的规则是因为竞争的压力。好比说，我的教授水平提高了，我培养的博士生的水平提高了。我不招你的博士，我就自我循环。你的质量上不去，每次评比你都名落孙山，好学生愿意来你这儿吗？不来。那就收一些差的学生，差学生交费也交不起，你就越来越差，不改革不就完蛋了吗。所以竞争的压力就迫使大家都必须改革。

另外，所有的改革必须有危机感。这个危机感要从学校领导传输到每一个院系领导，再从每一个院系的领导传输给每一个教员。没有危机感不可能有改革，有危机感人才有变革的冲动。中国大学太需要危机感了。北大改革以后相信会给其他大学增加危机感。北大改革以后，北大对优秀人才会更有吸引力。在这方面，我们有些院校已经开始了，看到某个大学的教授优秀，就动手挖他。各高校这才有危机感，有危机感他就会改革。所以，你要我预测，我相信只要北大坚定不移，有关部门予以支持，中国大学改革一定会轰轰烈烈的进行下去。

10年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相信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体制就完全不一样了。政府权力不那么大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合作变得更合理了，各方面的工作都会上新的台阶。

好比说，高校自发合作可能会增加。我们招博士是在全国最好的研究生里面招最好的学生，然后我们这些博士毕业以后，他又到其他好的大学找到工作。学校之间的合作，主要靠学者之间的合作；学者之间要合作，首先要有共同的兴趣。现在体制下，你学校之间怎么合

赵 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作？没有办法合作！到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基金，他们说这个项目你们两家合作，但实际上大家不可能合作，因此只能分钱，各自做各自的，做好以后再并到一块，作为合作成果上报。中间没有思想的交流，关键是因为没有人员的交流。我想，改革以后，中国的大学真正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学者之间、大学之间交流、合作的趋势。

顺便我再谈校长的任免问题。校长应实行公开遴选，但副校长应该由校长提名，上边最后有个审批程序就行了，不见得要公开招聘。现在听说有关部门提出，校长任命，而副校长实行公开竞选。那校长还怎么领导副校长？副校长是公开竞选上来的，校长是上边任命的，校长哪里有权利领导副校长？

龙希成：关于大学改革，现在很多人都发表了批评意见，10年20年再回过头来看看，相信会很清楚哪些是有益的意见，哪些有失偏颇。

张维迎：应该讲，有些批评是有道理、有建设性的。学校有关方面都会考虑。但有些批评，确实太过于走极端。学者要有一种境界、一种理念。有人说我们是照抄美国，其实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就要分析美国的大学为什么有竞争力，为什么欧洲、日本的大学制度都开始向美国大学靠拢，并从中吸取经验。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有了国际化的标准比较之后，最有效的制度会显示出来。

我希望，10年之后，北大的一些院系包括理工科院系，当然不是所有的，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水准，能够达到美国优秀大学的水平。那时候，我们就不必担心北大都是“出国留学预备班”了。为什么是“出国留学预备班”？并不是因为我们学习别人的规则，而是因为达不到人家的水平，人才市场不认可你，学生也不认可你。

赵 晓：表面上所谓“预备班”，是跟着英语的规则走，其实关键的问题是你培养不了跟人家相同的产品，学术研究的和学生的。

张维迎：是这样。同样一个学生在国内做不出东西来，但到了国外就能做出来，为什么？因为人家的导师一下子就能把他带到学术最前沿。我们的导师连前沿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掌握最现代研究方法，让学生就跟着他，根本就是瞎子领路，当然就做不出好东西来。

北大改革以后，对优秀学生和教员会更有吸引力。我再强调一句话，改革也是为了提高教授的尊严，但是教授只要当你有水平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得到社会的尊重，才会有尊严。我们现在教授的尊严

不够，社会对教授的尊重度不够，主要原因是教授的水平太低。或者说因为一部分低水平的教授的存在损害了高水平教授的利益。如果以后北大的每一位教授都是顶呱呱的，社会对你的尊重一定会大大上升。

当然北大改革还有好多制度包括研究生制度都在改。这个大体制今后只对越优秀的人才越有吸引力，而且使一个人真正正在学术上有偏好。如果一个大学教授干的并不是自己想干的，而只是由于这个工作稳定，就来当教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优秀的，也不应是这个大体制所欢迎的。但我们过去确实有这个问题。

过去有人搞“一家两制”，夫妻两个一个在私营或者外资企业，另一个是在政府或者大学。通常是丈夫在企业工作，多赚钱，老婆就想办法留在学校吧，那儿稳定，孩子能上幼儿园，上附小，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今后大学教授的“一家两制”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最优秀的、最适合搞学问的待在大学，收入稍微低一点，但是他的丈夫（老婆）说你去赚钱养活我。

（本文写于2003年，北大改革风起云涌，
同时争论纷纭之际，龙希成为
《21世纪经济报道》
评论部主任...）

